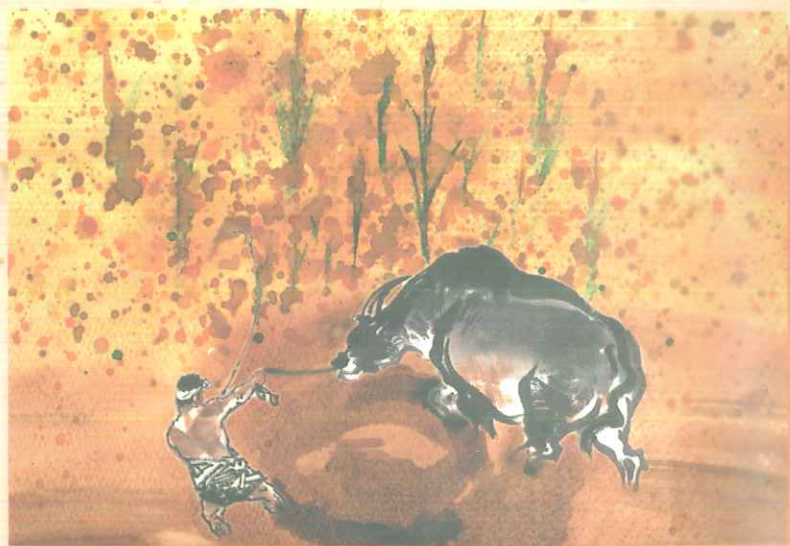


梁發

中國最早的宣教師

麥沾恩 著
朱心然 譯



朱心然，本書主編、譯者，台灣出生，新加坡成長，美國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專研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思想及基督教)、歐洲中古教會歷史及美國教會史。英文著作有《吳雷川：民國時期的儒家基督徒》。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中國基督教歷史、西方文明史。

梁發
中國最早的宣教師

麥沾恩
著

IV
427
L44
322c
1998

梁發，兩個世紀以前的人物，他的真正面貌卻要待至兩百年後的今天，才得以重現讀者眼前，箇中曲折好比梁發傳奇一生。這位「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中國人」，究竟如何由最平凡的雕版工人，繼而成為基督教植根在中國的重要人物？本書不僅巨細無遺地描繪出這位忠僕一生感人的事蹟，更側寫了十九世紀基督教在中國萌芽的歷史，是今日每個華人信徒必讀的珍貴著作。

ISBN 962-294-431-0



9 789622 944312

Cat. No. 1645.1



梁 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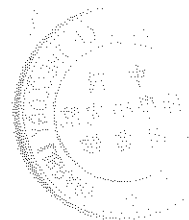
中國最早的宣教師

麥沾恩 著
朱心然 譯





梁發 (1789-1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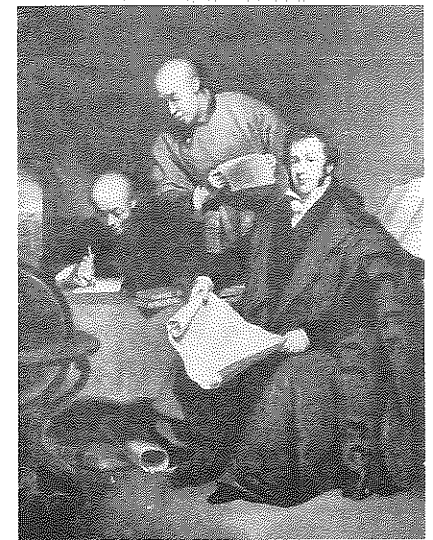
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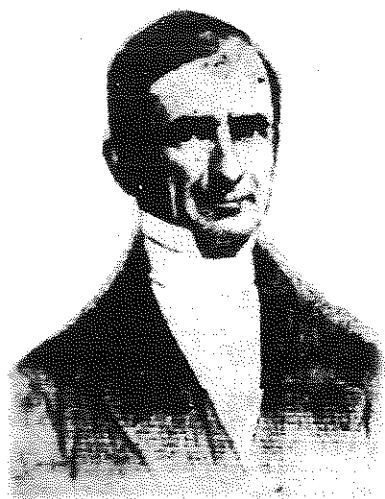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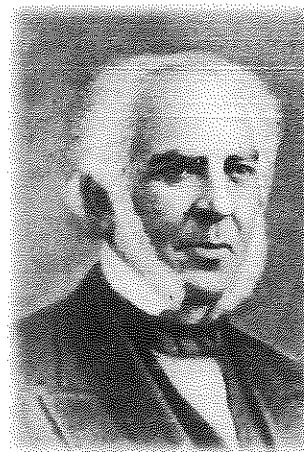
麥沾恩(George Hunter McNeur, 1874-1953)



馬禮遜及其華人助手將聖經翻譯成中文。
這幅為程耐里(George Chinnery, 1774-1832)的作品。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



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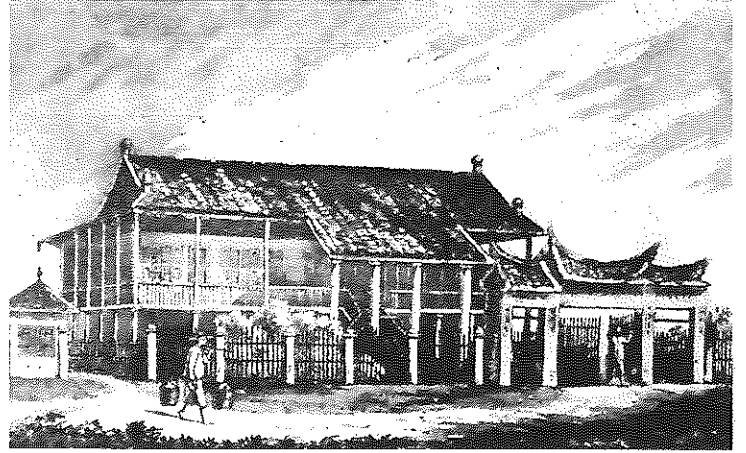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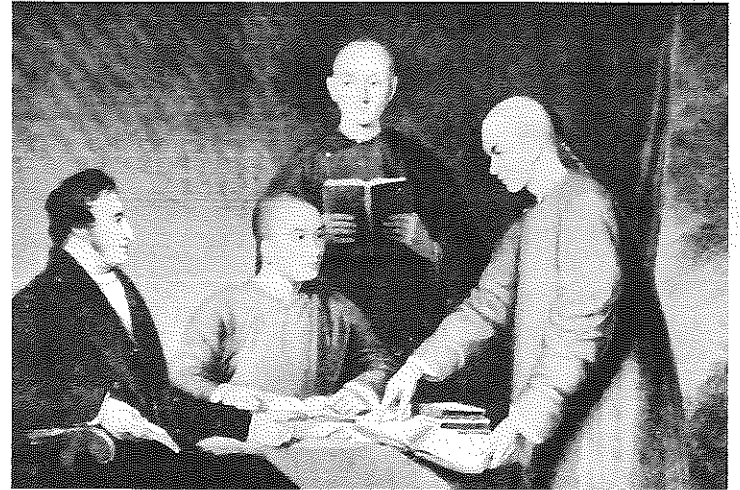
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四美(George Smith, 1815-1871)



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及其三名華人學生

二十日 在積德會早飯畢，即搭船過洋遠入那龍。

二十一日 午後船到那龍，即上船入歇店居住。

禮拜
二十二日 早講以齊書五十六章，乃勸昂曰：「神天令人嚴守安息之日，故我們今在路
上，亦要守之。後來回到家，中更要固守，及要恒道神天賦命而行。」

二十三日 在那龍起行，走到午後，乃至恩平縣地方，即入店歇息。算明車夫工錢，打發了
車夫去了，即尋船搭面長沙，偶遇船便，即下船開行。

二十四日 早晨到了長沙，在長沙搭船到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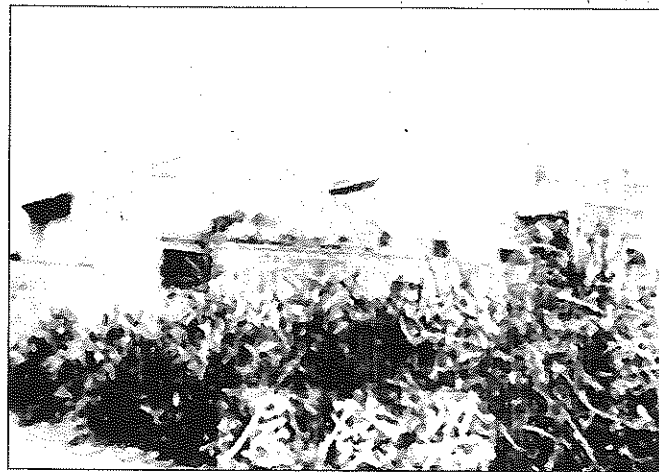
二十五日 午後到了省城，入林家館居住。夜晚上讀書拜神，叩謝神天在路上保
佑平安，未受險害之思。

十
二十六日 在林館居住，朝夕讀書拜神。林某偶見我們拜神，即問余曰：「真為如此，跪在他面，是
拜甚麼樣神耶？」余曰：「我們叩拜之神，係原始造化天地神人萬物之主，管理天地萬國，人
物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活神。故凡有人誠心拜求之者，神必應准之。」
林某曰：「如此甚足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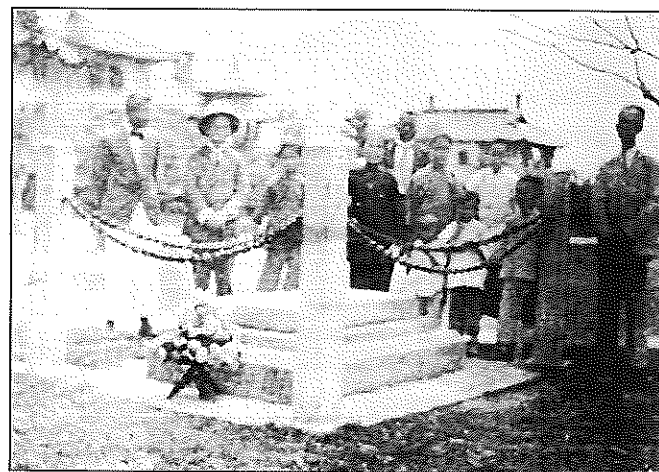
梁發親筆所寫的日記

目錄

李序	李志剛	1
誠序	誠靜怡	5
劉序	劉翼凌	7
自序(一)	麥沾恩	11
自序(二)	麥沾恩	12
重譯導言	朱心然	13
第一章	神聖故事之光	17
第二章	先知的誕生	25
第三章	撒種與收割	35
第四章	比正午的日頭更光明	43
第五章	娶妻的代價	53
第六章	中國的福音	61
第七章	富人情味的文學	71
第八章	個人佈道	81



廣州河南梁發故居



廣州嶺南大學中的梁發墓

第九章	雙重打擊	93
第十章	麥子和稗子	103
第十一章	愛國心是不夠的	109
第十二章	神的物與凱撒的物	119
第十三章	出發——傳道——醫治	127
第十四章	最後的過渡	137
第十五章	多年之後	147
附錄		154

李序

馬禮遜牧師一八〇七年來華，開展十九世紀英語系基督教在中國傳教新的一頁。馬禮遜牧師在東印度公司做翻譯員，工餘從事聖經的翻譯，又以當時滿清政府及澳門實施禁教政策，馬禮遜牧師的傳教工作受到極大的限制。雖然倫敦會於一八一三年再遣米憐牧師到廣州協助教務，因為受到政府的禁制，所以於一八一五年則遷往馬六甲，設立恆河以外的宣教中心，創辦英華書院並以開設學校，出印中西文書報，翻譯聖經推動福音事業。在馬禮遜牧師和米憐牧師發展中國宣教工作之初，梁發與兩位牧師的交往，以及他的工作，在中國基督教會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梁發原是一位雕版的印刷工人，當馬禮遜牧師於一八一〇年九月出版使徒行傳的時候，梁發協助雕版印刷，他透過蔡慮與認識馬禮遜牧師。至於一八一一年出版路加福音，一八一三年出版全部新約，梁發是其中雕版工人的一員。及至米憐牧師於一八一五年四月從廣州前往馬六甲，梁發亦是招聘遠行的一員。當米憐牧師在馬六甲籌建英華書院，出版中文書刊，梁發亦有參與印務工作。藉工作關係，梁發耳

濡目染，漸受聖道感化，更因米憐個人及其家庭影響，他終於離棄偶像，決心歸信耶穌基督，於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日在馬六甲，由米憐牧師施洗歸主。梁發受洗後，熱心向道，經米憐牧師的推薦，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由馬禮遜牧師封為宣教師，他便成了中國基督教第一位宣教師，開拓華人傳教的工作，直至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病逝廣州，先後三十二年之久，梁發忠心至死，堪稱華人傳道良好的模範。

梁發從事聖經出版之外，也參與英華書院有關書刊的印刷。其中米憐牧師於一八一五年在馬六甲出版中國近代首份的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梁發負責該印刷工作和撰寫部分稿件。事實上，梁發自小家貧，所受的教育不多，然而他自任職傳道之後，亦有撰寫見證的文章。

一八三二年梁發出版《勸世良言》，共有九卷，內容包括信仰教理、聖經註釋、宣道講章、護教辯道等類別。以十九世紀初葉，中國書籍出版仍然使用木刻雕版印刷，知識分子出書故非易事，而梁發以一介寒微竟能出版不下十萬言的《勸世良言》，可稱之十九世紀華人教士重要的著作。因為《勸世良言》的派發，其後竟為洪秀全所獲，於一八四三年影響洪秀全思想的改變。洪秀全更按照《勸世良言》，自行「以水灌頂」，作為洗禮的決志，承認自己是耶穌的門徒，翌年創辦了「拜上帝會」，在花縣鄉間聚集信徒不少。至一八五一年形成太平天國的建立。因

此歷史學者認為《勸世良言》是一本影響近代中國的著作，梁發富有中國色彩的神學思想由此散發。

在一八四四年中美兩國政府尚未簽訂望廈條約之前，基督教是禁止在中國境內傳教的，而梁發早期傳道工作是採用遊行佈道的方式進行，並深入廣州鄰近的鄉村。及至基督教獲准在中國五個口岸興建教堂和醫院，梁發才能在廣州博濟醫院和惠愛醫館向病人傳道，成為教會最早的院牧工作者。

梁發早年在廣州、馬六甲各地工作，及至鴉片戰爭以後，轉以廣州活動為主。因為他是中國第一位宣教師，又是倫敦會同工，所以歐美早期來華傳教士與梁發多有接觸，即如美部會（即公理會）的裨治文牧師、雅裨理牧師、衛三畏教士、伯駕醫生、波乃耶牧師、邦尼牧師；倫敦會的麥都思牧師、修德牧師、戴爾牧師、合信醫生；浸信會的叔末士牧師、羅孝全牧師、地凡醫生；美國長老會的哈巴醫生、紀里士卑、花連治牧師；循道會的俾士牧師；崇真會的郭士立牧師等先進，多與梁發結納，在廣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帶展開工作，日後各自發展傳教事業的路向。梁發的事奉不分宗派，促進教會合作的發展。所以梁發的風度和風範，不只是倫敦會的傳道人，更是屬於中國教會的傳道人。他的成就和貢獻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而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重譯《梁發傳》出版，飲水思源，意義深長，深願華人教會信徒

讀後多得幫助，發揚承先啟後的精神。

主僕 李志剛 謹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香港銅鑼灣道禮賢會堂

誠序

數年前在華南某個明媚的日子，一群從中國各地來的教會代表在廣州參加教會會議。有一個下午他們集合在一個人的墓前，這個人的故事可以在這本小書裡看到。為了紀念這位屬上帝的人，他們舉行了崇拜並種下了一棵樹。他們圍繞在梁發的墓前，心裡非常感動，難以平伏。他們首先想到早期的中國基督教運動，然後又想到第一世紀在羅馬的基督教運動，這樣的聯想不但自然，也是很重要的。接著《使徒行傳》之後，基督教會的歷史上又多加了一章，這就是梁發的生平及工作。這本簡單的傳記，教導我們中國教會是建立在東方人的心裡，上帝的拯救大能在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當有人全心全意將自己奉獻給上帝及祂的工作時，上帝能夠進入他、伴隨他、為了他、透過他來完成祂的工作。

我們非常感激本書作者，雖然資料不太充足，但他仍不辭勞苦地去收集資料並整理出來。我們不僅可以從這本書看到一個人的成就，還可以看到他在天上的主人的大能，他就是為這位主人的名和祂的關係而生活和工作的。梁發雖然已經逝世了，但他通過本書篇幅仍舊向我們說話。我們盼望和祈求這本書重新挑旺我們靈裡

的聖火，好叫我們在這個動盪、意義深遠及充滿挑戰的時代中，向普世傳揚福音。

誠靜怡

一九三四年於廣州

劉序

太平天國起義的一百周年——一九五〇——中外的史學家紛紛舉行紀念；關於太平天國的書籍，其中有許多為向所未見的，都在這時出版，有風起雲湧之盛。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也決定重印梁發傳，而梁發的大著《勸世良言》又恰恰在這時發現，這都不能不說是歷史上的奇蹟。

當「中華最早的佈道者」之名而無愧的梁發，在全國充滿著拜偶像者和基督徒的迫害者的環境中，在斬首或充軍遠方的政令威脅下，居然敢著書立說，自刻自印，甚至親自派送，這種大勇無畏的精神，當然不能不使百載以後的我們肅然起敬。這是他之所以不朽處，也是他的傳記值得再版，值得重印，乃至值得將來加以增補擴充的地方。

梁發生平一個最大的遺憾是他自己並不是讀書人。他之著書行世，最大的目的就在喚起中國的讀書人。他謙卑地以為自己不過是一個區區的刻字工人，因此他的文章不能像讀書人一樣獲得中國老百姓的信服。他認為如果要大多數的中國人皈依，首先要使中國的讀書人皈依。他之把自著自刻的書親自在考棚分派，正是為了

這目的。

其實，那時的佈道工作，除了派書以外，簡直沒有別的可做。在禁令森嚴下，公開的集會和講道是不可能的。梁發的同工米憐牧師說過：「當一個傳道人不能親身出發傳道時，他的責任就是派最方便的代表（書籍）出去。誰能說這個小小的平安使者不會先把主的道路鋪直，先把一個民族為祂預備好呢？」

這段話在他的同工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上面，完全應驗了。在廣州考試落第的洪秀全，看了這本書後便服膺基督，發起拜上帝會，其後又發動太平天國運動。以宗教為幌子，然因對基督的教訓未能有深刻的認識，而言行不符，運動終於失敗了，然而它在時間上延續了十三年，在空間上波及十九省，而追本溯源，亦不能不說是《勸世良言》所留下的影響。

可是這本有那麼大影響的書卻湮沒了百年之久，在中國竟是一「踏破鐵鞋無覓處」。據說，倫敦博物院有一本，卻是殘缺不全的。（後來我聽簡又文先生說，在美國哈佛燕京社圖書館藏有一本）。一九五一年四月 John Foster 博士在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發表了一篇關於太平天國的論文：我那時在達卡大學講中國近代史料，看了這篇論文以後，才知道這書已由雒魏林醫生（Dr. William Lockhart）家裡的藏書裡面發掘出來。歡幸之餘，便寫信到倫敦會詢問。倫敦會回

信說，這書已送到司里奧克學院圖書館（Selly Oak Colleges Library）去了。這當然是舉世罕見的存本，向他們借出來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寫信請他們把它影印寄來。幸而他們已攝好了一份正片，我只要請他們攝一份反片就行。這個後來做到了。

我用幻燈映出來把它略讀一遍，覺得它不但有歷史的價值，還有佈道的用處，雖然它有一些啟蒙時代免不了的缺點。第一它針對著異教的中國風俗習慣說話，而這些風俗習慣此時仍有一大部分普遍存在；第二它的文體像梁發其他的著作一樣，能夠「適合於當前的環境，使聽者覺得那是出於真心的」（馬禮遜語）。李敬芳對洪秀全說它「內容極奇和中國的經書大大不同」，正是本書的確評。

這本書最初發現時，缺少了第一部，祇有八部。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決定把它印行，作為梁發傳的附錄後，第一部也在倫敦發現。感謝神的恩典，中華最早的佈道者自著的佈道論文終於能夠以現在的完全無缺的形式擺在讀者面前。

劉翼凌 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

註：本譯本將《勸世良言》略去。

自序（一）

在嶺南大學的校園中央有一座墳墓——梁發的墳墓。雖然中外人士現在只有很少數能明白這個人為甚麼受了這麼隆重的紀念，然而他死的時候（一八五五年），梁發這個名字已傳頌於英美的教會了。這本小書就是說明梁發之所以值得受這麼敬重的理由。

在美國教士們抵粵一百年的紀念當中，這本小傳出現，可算是適合。由馬禮遜、裨治文和梁發所發軔的中華基督教會，負責刊行這書，並且又是在它的全國總會第二屆常會之期而出版，更可以說是適合了。梁發現在已經不止屬於中國的教會，並且屬於全世界的教會了。所以在敬獻這本書給另一個同樣的中國基督徒——誠靜怡博士——時，我們謹禱這個使徒生平的故事能帶領教會各肢體更能與主耶穌基督團結，於是又更能互相團結。願這故事能幫助我們內心的火焰更熱烈地燃燒起來，正如梁發內心那種宣傳福音的火焰一樣。

一九三〇年十月

麥沾恩序於廣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

自序（二）

倫敦會在華南工作的一位宣教士老將皮堯士 (T. W. Pearce) 對這本回憶錄的主角表示了他的敬意：

「除了信心及忍耐外，在這殉道者名錄板上還多加了多才多藝的天賦恩典，讓梁發成為把基督教精義全然融入中國人的生活中、並用天賦恩典去傳播基督教模式的偉大先驅之一，這模式仍舊是教會及差會的『領導模式』。」

「他是基督教所能提升成為崇高、且適合於服務教會及世界的那種階層的例子。這只有由那不可見（的上帝）的能力，並力上加力，及通過內住的聖靈所帶領的積極獨立心志的人，才能做得到。」

皮堯士博士無疑是找到了梁發在現實和充滿張力的屬靈生活中，其事奉特色的公開秘訣。他對聖經的熟悉、他簡潔有力的禱告、他無懼的做見證、他聖潔的性情，這些都把我们帶回基督他自己裡面這唯一的來源。難怪畢海濶教授 (Harlan P. Beach) 寫道「梁發可以算做任何時代的主持人」。

麥沾恩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國，廣州

重譯導言

這本梁發的傳記是由麥沾恩 (George Hunter McNeur) 的英文原著 *China's First Preacher Liang A-Fa 1789-1855* 翻譯而來，該書是上海的廣學會在一九三四年發行的。本書最早的中文版是由胡簪雲譯成的文言文版梁發傳，到了一九三一年的梁發傳則由陳德明杜少衡重譯成白話本，根據該書謝頌羔的重譯小言，這譯本沿用文言版的語氣和名詞，所以需要保留胡簪雲的名字，其中文書名為《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英文為 *The First Chinese Protestant Evangelist, Leung Faat (Liang A-Fa) 1789-1855*。一九五五年輔僑出版社重印此書，中文名為《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傳》，另外再加上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內容與一九三一年的白話版一樣，全無改動過。

作者麥沾恩 (1874-1953) 生於紐西蘭，是紐西蘭長老會華南差會（即前廣州及鄉村差會）的首位宣教士。他由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三九年為止，均在華服務，曾在廣州白鶴洞協和神學院任教，並曾擔任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大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他在青少年時期學習印刷術，長大後專注於寫文章，對力求事實及詳細校訂不遺餘力。文言版的譯者胡簪雲曾在廣州白鶴洞協和神學院受神學訓練，對建立中華基督教

神學非常感興趣，他的文章可以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版的《景風》中看到。

在本書中，麥沾恩從各個角度來描寫這位倫敦會宣教師梁發，讓我們可以看到梁發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看到他的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交融，這前所未有的信仰與工作，給家庭及老家帶來難題。梁發的妻子黎氏的堅定信仰，也讓人看到她長期住在非基督徒老家需要面對的掙扎。作者亦寫了許多他的兒子對父親信仰的不悅，看到一個被迫與主流文化教育脫離的人在心理上的反叛。除此以外，作者也描述了宣教士對梁發的批評與讚揚，讓我們好像看到活生生的梁發站在我們的面前。

在作者的著述過程中，也沒有忽略當時的歷史環境，特別是中英兩國衝突的一連串事件，處在夾縫中的一介平民梁發如何做一個中國基督徒；在律勞卑事件中他需要逃往海外；在鴉片戰爭中他也為了要消弭戰爭而扮演了並不能影響大局的角色。

這次出版梁發的傳記，完全是根據麥沾恩在一九三四年的英文版翻譯而來的。由於編者手頭上沒有文言版，所以不知其內容如何，但發現一九三一年的白話版與英文版有好些相異之處。根據一九三一年版，謝頌羔在重譯小言中，指出該版在翻譯時用了麥沾恩的英文原本（應該是根據他的手稿），但當時英文版尚未出版，到了一九三四年出版時，麥沾恩曾再加整理，把一些一九三三年左右有關梁發的研究寫了出來，但原文並無太大的改動。然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需要以麥沾恩的英文版本作為

正本來看中文譯本的問題。三十年代的中文譯本除了分章不同外，在整個鋪陳上都顯得組織紊亂，其主要原因是中譯本喜歡將原著以外的中文資料多多益善地盡錄下來，並加上較瑣碎的資料，以至於喧賓奪主，把作者的主題打亂。另一方面，譯者也較含蓄為賢者諱，在提到梁發的人性弱點時，譯者不是避而不談，就是淡化了原來的描述。此外，由於舊有的中文譯本是較自由的翻譯，所以好些地方只是為了譯文的流暢而漏譯或對原文誤解而錯譯。但今天這個譯本以英文版為本，將上述的問題都改正過來了，我們對原文也做一些必要的修正及補充。

在讀這本梁發的傳記時，讀者要記得這本英文原著是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提出的一些看法是與當時的社會與教會有關，例如民族主義及本色化等問題。此外，當他提到現今發生的事，他是指一九三〇年代。

在整個翻譯麥沾恩的梁發傳記的過程中，我要謝謝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的龐君華先生提供辦公室、圖書館及各種便利，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此外，我要特別謝謝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編輯部陳潔心小姐在修稿譯稿方面任勞任怨協助，讓這本書能出現在讀者面前。

朱心然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神聖故事之光

在我確信的事情之一，就是全世界、特別是我們西方國家，需要展開空前的教會歷史研究。……我真心的相信，我們現在進入了宗教歷史最困難的時期，我們需要非常珍惜這幾個世紀以來所學到的教訓。我對研究基督教，這普世的基督教，更重要的，這一個有生命活力的基督教，抱著很大的信心。

——穆德 (Dr. J.R. Motz)

關於基督教新教宣教先驅到中國的歷史，著作已很多了，但仍嫌不夠。我們的基督教在幾個世紀以來向外發展，然而忽略了那塊土地上的孩子們，就是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初熟果子，那記錄便不算完整了。這些基督徒是由宣教士贏回來的，之後他們也成為他們親人的基督使者。在中國我們所接觸到的是個有活力的基督教，並且是活生生地表現出來。誠如使徒行傳及其後對初期教會的描述，我們可以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基督的力量如何去救贖及改變人心。因此在每一塊基督徒新征服的土地上，這信仰都得到全面的肯定，令傳教的熱誠得到更多的靈感。那些受了無知、迷信、卑賤的信仰所束縛的人，現在具有了聖徒一般自我犧牲的精神，

成為上帝所愛的僕人和子民。像這類贏得獎賞的生活故事，讓我們再一次向至高的主朝拜，把多彩的冠冕與祂許許多多的王冠聯結起來。在這時代，我們有全面的歷史知識、有更寬容的精神、對基督有更深入的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比起我們的祖先，我們更能預備好自己去承認非基督教的宗教裡，存在著不完全而時常令人誤解的真理概念。像馬禮遜這些開拓先驅開始工作時，就很容易拿到好些資料。上帝從來沒有讓祂自己在祂中國的兒女心中，找不到見證人。中國古典文學中，早就有上帝及人類責任這些觀念，基督教的先驅在表達更完全的上帝啟示時，並不介意引用這些典故。宣教士在已經轉變的中國佛教裡，找到了中國人的宗教天性，其中有些特徵顯示出基督教在很久以前就對佛教有影響。道教也像佛教一樣，神靈世界的信仰，起碼存於一般人的心裡。新教的基督徒絕對不會忘記羅馬天主教會在過去好幾個世紀中，在中國遭到苦毒的逼迫，但有關十字架的福音教導，還是在整個中國中流傳開去。馬禮遜到達中國後的第一個中文老師，就是一名天主教徒。他也用了一些不知名的耶穌會神父的早期作品，幫助他翻譯新約聖經。那些新教的基督徒先驅借用過去的東西時，在慶幸之餘，從不懷疑耶穌基督獨一至高無上的地位，凡與他們所理解的耶穌教訓有衝突的任何事物，也不去妥協。如果他們懷疑或妥協，他們就不是新教的先驅了。由他們為基督贏回來的第一代門徒的品德，自然可以向他

們遠近屬靈的兒女做見證。我們無法找到比梁發這樣更好的例子，他就是這本傳記的主角。他是個真正的中國人，也是個真正的基督徒。

馬禮遜於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在廣州逝世，那已經是一個世紀前的事了。現在是重新學習這偉人的人格和工作最合適的時候，同時也紀念他的中國同工對這幼嫩的教會的關懷及事奉。他們早期責任的移交，可以讓我們學到好些功課，特別是在因為有不同的理由，促使有點疑問但又必須處理的權力移交，由外國人交給中國人管理。這將證明中國教會將在真正的使徒統緒裡，有自己的領袖。我們從綜合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基督教的亮光，我們很需要那些歷史各有長短的教會貢獻出來，和其他教會分享。一位從美國來的資深基督教青年會幹事，跟他一名能幹的中國同事說：「你現在不需要我們也可以繼續工作，你比我們更能將中國的青年會管理好。」那位中國的總幹事說：「對，我們知道怎麼辦好青年會，但我們更需要你的『特質』。」這本傳記能幫助我們去欣賞不同種族的人在基督裡聯合，我們都需要這種共同的特質。

那些對中國教會歷史有興趣的人需要活躍一些。我們很可能在宣教機構或研究性的圖書館裡，找到一些保存得很好、與外國宣教有關的資料，但寫中國傳記的人就感到很棘手了，因為只有極少相關的資料可以抵得住歲月的摧殘。由於這經驗，

我們可以慶幸早期教會歷史的紀錄，是在氣候好的地方保存下來，可供後來的作者使用。中國舊城外的垃圾堆，絕不可能讓好像研究西亞的歷史學家那樣得到一樣的回報。華南的天氣令記錄或印刷資料難以保存的原因越來越多。在其他地方如果有一句格言是正確的，那就是一個值得為他作傳的人逝世了，那就越快為他寫傳越好，這格言在廣東更有特別的說服力。在華南，白蟻對書籍有特別的癖好，許多宣教士也為此付上了代價。象鼻蟲、蠹魚、蟑螂、霉菌和其他小蟲子都會破壞書籍。由於天氣潮濕，紙也變回紙漿了。另一方面，洪水泛濫也造成不少損失，一九一五年廣州三角洲就曾泛濫過。梁發逝世時，他鄰近廣州的河南故居裡，還保留著一籃文件和書籍。有一位信耶穌的親戚相信那些東西具有歷史價值，就把整個籃子帶上船，送到城中的基督教機構，但那機構的舊樓正要重新改建，儲存空間有限，而且那裡的人並不覺得這事的重要，又把這籃子放回原處，所以當洪水一來就全淹沒了，因此沒有人知道失去了第一位中國傳道人的生活故事，對中國教會到底有多大損失。現在我們只剩下一些梁發的家庭照、一些給蟲蛀破的文件和一本在一八一三年在廣州出版的《馬太福音》。雖然傳統上中國人會好好保存祖先的紀事，但有關梁發家庭世系的資料，已經無從稽考了。梁發寫的小冊子沒有一份留下來。稚嫩的中國教會需要學習這適時的教訓，適當的收集和保存跟自身歷史有關的資料，可

惜許多資料已經無可挽回的失去了。最近（按：一九三〇年代）美國教會歷史學家來中國訪問，點燃了人們的興趣，使中國教會的領袖對了解有歷史價值的東西會更為敏銳。

為甚麼中國會缺乏有價值的傳記還有另一個原因，這是因為中國的傳記標準寫法已經僵化，使傳記失去了人情味。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說：「在中國較大的傳記裡，可以看到有關名人的介紹，好像中國的歷史寫法那樣，他通常只有一些骨架，沒有血肉皮膚去美化那身軀，只將某人的名字、出生日期、住址、當過甚麼官、甚麼時候逝世放在一起，就寫成了一本傳記了。」其實我們也聽過英國歷史教科書也是這樣寫成。有一位做醫生的朋友告訴我，他先前因健康問題到日本度假，每天都要午睡，因此他找到了一個能保證入眠的良方，就是讀一本著名但以古老形式寫的教會歷史書。對中國作者而言，我們可以從通俗戲劇裡找到很多的例證，尋求更有趣的方法寫歷史，例如《三國演義》，即使以不足的歷史資料來寫，但可以讓人有很多想像的空間，令過去的事復活，每一代數以百萬計的人都對這悲喜劇樂此不疲。像這樣一類的藝術，雖然與嚴肅的事實更有聯繫，但這是中國教會歷史作者所需要的，它會找到廣大及有興趣的聽眾。特別在這個強調民族意識的時候，有關中國的東西會變得更有價值。他們對於「本色」教會的要求就讓他們注意到甚麼

會令教會「本色化」。當我們看教會歷史散開的枝子時，上面開出的花和果子，使到古老的土地上的新生活更加美麗和豐盛。在研究種子萌芽長大的問題時，讓我們回顧這位中國先驅傳道人，他經過了孤獨、漫長而猛烈的試驗，驗證了他信仰的力量和真誠。

可喜的是，我們並非完全沒有中文資料。在倫敦會的檔案裡，有一封梁發在一八二七年寫的信，還放在中式的信封裡。此外，還有梁發在一八三〇年三月廿八日到十月六日所寫的日記。該檔案室很小心地花了六個月時間將這些寶貴資料送來廣州。這日記寫了超過一百年，但仍保存得很好，所以看到的中國人特別感到驚訝。梁發的一些還活著的親戚，向我們提供了他們所知的簡單資料。我們也到處找尋英文資料，並有一些發現。我的朋友將馬禮遜、米憐（William Milne）及合信醫生（Benjamin Hobson）的信件找了出來，並將有關資料印了出來，這樣就有足夠的資料去描繪出這位名人的畫像，並放在名人堂裡。不然的話，梁發就可能在我們的腦海中消失了。一八四六年一本在倫敦印的書裡提到梁發，裡面曾有這樣的備註：「這裡我們不需要談關於他的事情，因為在所有教會中都聽到讚美他的話。」在香港首位的維多利亞教牧（按：維多利亞教省當時包括香港、中國及其他一些亞洲地方）的四美牧師（George Smith）寫道：「他的名字在歐美廣為人知」。一八四一

年，伯駕醫生也在美國的參議院眾議院聯席會議上，報告了梁發的一些生活情況。梁發的名字，也在一八四七年，由一個委員會提交給英國下議院的一份報告中出現。這位唯一的中國新教傳道人自然會在基督教國家有吸引力，也就如中國俗語所說：「池裡無魚蝦也貴。」但這本書應該可以回應這樣的爭論。無論如何，他的名字漸漸為人所淡忘，數年之前，中國的教會仍然對他一無所知。一九一八年，因著奇異巧合，有人在廣州市郊發現了梁發墓，於是人們對於梁發再度興趣盎然。在一九三〇年所出版的中文傳記，就是因這樣的醒覺而產生的。為了回應很多人的問題，並確信梁發應該得到歐美基督徒給予的榮譽，於是這故事就用英文寫了出來。

第二章 先知的誕生

生命的書沒有序言，每一頁都是真實的故事。只要我們願意去尋找，就可以看到一些扼要的字句。

——艾恩斯華 (Percy Ainsworth)

高明縣是廣東省最小的縣之一，因周圍有重要的社區，使高明縣被人忽略了。在圍牆圍著的城中，有一個最出名的市集鎮叫三洲，三洲即三島之意，因為該鎮旁邊的河上有三個島。從市集出發要半個小時才可能到達其他三個區。像高明縣這些邊界城鎮，與它毗鄰的郊區一樣，在傳統上都是中國惡名昭彰的地方。一群群的強盜很容易從一處逃到另一處，官員因懼怕進入另一個城鎮執法而放棄追捕。各個城鎮的官員也因互相妒嫉，而讓這些罪犯得以逍遙法外。當各方軍警能團結時，該地才能維持治安，但只要有任何麻煩發生，而使當地的駐軍要暫時離開，就讓強盜和海盜有機可乘。在河的對面，即三洲對面，就是古勞村，梁發於一七八九年，即乾隆五十三年在那兒出生。米憐的傳記作者在書的開頭寫著：「如果梁發敏感的話，他看到蘇格蘭甘寧蒙 (Kennemont) 的風景一定會大受感動、大有收獲，他的

屬靈父親米憐牧師就在那裡到處追逐母羊。」梁發出生的村莊沒有甚麼可以打動人心的風景，這村莊位於一個為群山所圍繞的低地平原中。由於地處低窪地區，當地人唯一與其他村落聯繫的途徑就是走過防洪堤。三洲是沿著防洪堤而建的，因此成為蘇格蘭人所說的「大市鎮」(a lang town 即人煙稀少的地方)。夏天大雨來臨時，因河的水位提到比稻田更高，所以需要較複雜的堤壩系統，建得像一隻船有許多個防水隔間一般。這樣一來，這些河堤建好後，就不會因有一段被沖倒而導致大片土地給淹沒，但有時也會有不正常的大雨使得河道及支流水位上升，以致附近的田和村子都氾濫，造成巨大的損失和痛苦。在一個多災多難的地方，當地歷史一連串所發生的事件，都與洪水災難有關。在廣州三角洲田地，有許多地方因夏天洪水連續不斷，所以春天時人們都不去種稻米，只有在夏末等危險過後才種植。地勢較高的地方每年有兩次收成已成為慣例了。梁發所居住的村莊附近，由於田地太低所以水很難退去，他們把肥料放在水上，把稻苗種在柔軟的泥巴中，這在水不太深時才能種，因為稻苗完全被淹沒就會死掉。農夫首先把種子撒在肥沃的一小片土地上，等到稻苗長到六寸或更高時，才一小把一小把的將稻苗分行插在田上。這些困難和不穩定的因素一直影響鄉人的生活，梁發本身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因著洪水的影響，原居民都自然會在較高的地方蓋屋子。古勞村就是在細心的

探索下而建成的，該村散落在一連串的小山中，根據居民的姓氏而劃分出各個區域。梁姓的家族在村的前頭，稱為西區，屋子蓋在較低而多石的斜坡上，約在山腳以上五十尺的地方。在最高處有很多榕樹，樹上通常有很多氣根，本來這些氣根應該植根在地上，生出另一棵樹來，但因根纏住本身的樹幹，使得樹的體積越來越大，梁發小時候，就是在大榕樹的蔭下遊玩和休息的。也許他也如「無神論者與橡子」的中文說法，在孩提時想過造物主為甚麼讓這大樹生出小醬果，而這些蔓藤為甚麼又長出大南瓜來。也許當一個醬果從樹上掉下，使他在樹蔭下驚醒過來時，他就會得到跟這難題相同的答案。這小村莊前有梁家的祠堂，梁家子孫就在裡面向祖宗的神主牌焚香祭祀。另一邊有一個瞭望塔，有粗鐵枝在窗上，並且有一扇鐵門。梁發年少時的重要經驗，很可能就是在更房外聽看更的鑼鼓聲，當有警報時他會見到村裡的防衛人員匆匆去排隊集合。梁發住的村莊時有本地人和客家人械鬥，本地人是說廣東話的，而客家人在幾百年前由華北南來，散居華南各地。他們為了霸佔肥沃的土地而引起紛爭，由於本地人勢力較大，所以就將客家人趕回山間，因此客家人就在那邊建立起自己的村莊。村裡的瞭望塔也是在洪水來臨時，作為低窪地區民的避難所。梁發小時候，這高塔是一些災難和逃亡故事的清晰標誌，讓他在日後的基督徒經驗中，清楚地感受到詩篇作者所說的避難所。建在較高的地方的屋子通

常都有菜園，裡面種了些桑樹、煙草以及大麻；沿著散無規則的防洪堤壩走，小孩子可以聽到水牛及牲畜的叫聲。

梁發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出生、長大。他出生時的那間屋子，在一八三三年被洪水沖掉了，但在那一條狹窄黑暗的後巷中的原址，仍有後來梁發所蓋的屋子。那屋子裡的木樑經已破爛，磚牆也碎裂了，人們都擔心這樣下去的話，會傷害到寄居在裡面的老人。儘管這間屋子已經荒廢了，但在一七八九年時，梁沖能在家裡生了一個男孩非常高興，這位自豪的父親大概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會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梁發的「發」字有「差遣」的理由。中國的父母親一如古代的希伯來人般，替孩子取的名字總有個意思。他們希望梁發能在外邊為家族帶來財富和光榮。在中國傳統的眼光看來，他似乎做不到了，甚至有些反效果。而這個字讓基督徒想起：「有一個人是從上帝那裡差來的」（約翰福音一6）。「發」前面加上「阿」字，用廣東話讀起來會比較好聽一點，但通常只用在單名上。

梁家很窮，所以梁發十一歲才能夠進學校，家人對這個兒子一定有很大的期望，不然的話就不會送他去讀書了。當這個孩子長大後也得做一些家務，如擔柴、餵飼禽畜等。一個人一生受到最大的影響離不開年青的階段。我們不必質疑在他性格成型的時期，對他成年後所有的掙扎和決定產生的影響。他到底是怎樣學習去生

活，我們沒有那些記錄，這讓基督徒想到一句話：「從來就沒有所謂無可記錄的年齡，即使一個歷史學家的筆閒置著，但歷史還是寫了出來，刻在人的性格上。最終一個人的性格就是因他的事蹟及歲月所塑成的。」人的一生，從來沒有像青少年這個階段這麼容易受塑造。

一個孩子到了十一歲才進村塾就學，那個孩子必須要有些勇氣才行，因為照慣例大多數的兒童都在較年幼的時候就開始讀書。班上學童年齡自然都比他小很多，但是他比他們更成熟，而且能從這遲來的機會受益。認真求學，是中國人的特點，就算現在有新的學校系統，我們還是能找到像梁發這樣的例子。一位歷史學者告訴我們，梁發學習的主要方向，我們能夠知道是因為幾個世紀以來學習古籍經典的課程都沒改變。梁發的第一本讀物是《三字經》，這是一本一千年前開始編寫的三字韻律入門書籍，灌輸以孝悌思想為本的做人準則及榜樣。三字經讚揚勤於學習的美德，例如：「頭懸樑，錐刺骨，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卓。」（註）在四年的私塾生活中，他需要將《四書》、《五經》及《聖諭》背下來。《四書》及《五經》是儒家經典，聖諭是清朝皇帝康熙所寫的道德格言。因此梁發對於他同胞豐富的古典文學傳統至少有一些認識，並且樹立了他一生工作上不能缺少的文學基礎。有一件事他肯定學得很

好，就是將錯綜複雜的中國字寫得小心和正確。仍留在倫敦宣道會檔案中梁發用毛筆所寫的書信，就可大大證明了塾師的能力和學生的勤奮。儒家高尚的倫理教條的入門教導，加上聖賢古老的智慧，以及禮讓、自制的學習，多年後在梁發身上結出果子。另一方面，每天早上這個學生在上課之前，必須向孔子的像及老師鞠躬，而他的祖先的神主牌，猶如雲彩圍繞的見證人，正從祠堂後面俯望著他。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提及他的母親，數年後當梁發談到自己的信仰時，他提到了早年拜佛的事情。這就如彭格（Berge）談到提摩太時說的，他「把它跟母乳一齊喝下。」他的母親在他小時候就攜著他到觀音廟去，教他合什和鞠躬。每逢朔望，他又會在佛經、神壇和偶像前面，用香燭、鞭炮和紙錢來拜神。每年掃墓，他也參與那既快樂又神聖的節日，所以他日後篤信基督的那種深厚的宗教天性，在宗教淺薄的家庭祠堂和學堂中的禮拜中逐漸發展了；正如保羅論到律法時說，這些宗教經驗是引導梁發歸主的師傅，儘管這些宗教經驗有錯誤及不善之處，梁發本人也可能堅決否定這事實。他的新信仰帶來的異象和宗教經驗，其實早已植根於他早期的宗教生活中，深入他的潛意識裡。只有那些不知道在中國人心裡要留下屬靈印象有多困難的年輕人，才會質疑以上的話，因他們來自沒有宗教崇拜的家庭和世俗的學校。最熱心的異教徒，往往能產生出最好的基督徒。我們可以記得當華滋華斯

（Wordsworth）想到他周圍沒有異象，他寧可選擇「在落伍信條裡喝著奶的異教徒」信仰。

梁發在十五歲就離鄉背井到廣州城工作，這可看到梁發家境貧困。此外他尚未娶妻也是另一個證據。如果他家有些儲蓄，或有能力以抵押來借貸的話，這個家庭就不會少了一個媳婦去事奉他的母親。中國的鄉村生活對小伙子根本毫無吸引力，他們除了耕田或在寧靜的市集裡找工作外，似乎別無選擇。對於那些獨立和愛冒險的青少年來說，城市是相當吸引人的。古勞村的年青男子通常會到外面找工作，以支持村裡的婦孺老幼的生活。因為有些事情是不受時間改變的，我們現在閉目想一想，可以想像到一個少年在一八〇四年，將幾件衣服捲入棉被內，外面用草蓆包裹著，然後背起來上船的情景。他帶著家中自製的糕餅，兩眼含著淚水，朝他的村子望了最後一眼，看看樹、瞭望塔和祠堂，才上船到廣州。他的母親肯定也睡不好，因為身為人母的就是這樣子。

順風的時候，這艘平底船就藉著帆走；逆風的時候，就借助繩子和篙子航行。帆船先通過狹窄的小運河，然後去到大河，向著城市出發。舟行一夜，翌日便抵達省城。當船經過河南洲頭嘴時，他遙望省垣，開始了與西方世界的接觸。前灘有一行排開的商館（factories），上面有許多外國國旗飄揚著，這些商館總稱為「十三

行」。「行」指一行（排）建築物。這商館的英文意思，就是買賣商品的人的住宅，在每一組的建築物上都有用中英文寫的特別名字。由前灘開始以至於整排的樓宇，這些建築物由磚或花崗岩蓋成，有兩、三層樓高，相當突出，並能立即吸引來訪的異鄉人。這個中國少年大概不會想到，他以後會在這群可恨又受人鄙視的外國野蠻人中成為常客。多年以來，從三洲來的渡船就停在十三行一帶，所以梁發可能就在一個世紀前的同一個地方下船。當時中國並沒有基督教新教宣教士，但在同一年，年輕的馬禮遜去信申請倫敦會的工作，祈求「上帝將他置於最多困難和從人眼光中看來最難成功的佈道區域中」；當他被派到中國時，他的禱告肯定是蒙了應允。

梁發最初學習造毛筆，不久就轉而改習雕版。中國早在七世紀初時已懂得木刻活字印刷，公元九五二年皇帝就曾下詔用這技術印刷典籍。開始時先將一塊木切成活頁紙大小、約一寸厚的厚板。然後由一個書法好的人在方格裡，小心寫上要出版的書，接著向下對著木板貼下，工人則用濕的手指將紙拿下，讓墨水的痕跡留在木板上，雕刻工人就在木板上雕出字型。梁發在同一個師傅的指導下學習了四年，他的技術與年俱進。一週又一週的經過了這些年，他的技術不僅有助於早期基督教工作，也使他對中國文學知識有所增加，讓他裝備成為一名作者和宣教師的更重大工

作。這學徒被另外一個（天上的）主人訓練時，他和旁人都不察覺。當上帝在古時揀選一個先知，這個人的天賦、外在及道德環境、傳統及教育影響都把他整個人塑造出來，在上帝的手下與上帝同工，做祂呼召的工作。上帝也是如此塑造梁發的。

註：三字經的白話文為：「為了要驅逐睡眠而讀書，一個人把自己的長髮懸在木樑上，另一個人用錐去刺自己的大腿。有一個人藉著螢火蟲的光讀書，另一人則靠著反射的雪光看書。雖然他們的家裡窮，但他們仍沒有忘記要讀書。有一個人背著柴薪，另一人將他的書綁在牛角上，雖然他們在工作，他們仍緊張地讀書。」

第三章 撒種與收割

在芸芸漢學家及更正教的宣教士當中，馬禮遜作為他們在中國的先鋒，總是引人注目。並且令所有後來者，無論是學生還是傳教者，在語言和社會的中國大海上更容易航行。

——赫德爵士 (Sir Robert Hart)

當梁發被雇為印刷工人時，馬禮遜來到中國，他於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晚上八時左右抵達廣州。他來的時候，那些英國船舶都不願載他，恐怕引進了一位宣教士來華，會妨礙他們商業上的發展，於是他不得不到紐約去搭船。我們回想當時中國政府禁止基督教傳入，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反對任何與羅馬天主教有競爭的對手，加上各樣阻止中英貿易關係的限制，我們都不必詫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廣州及澳門的商人對馬禮遜的品格及能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們覺得他任翻譯員的專門工作，對東印度公司以後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當馬禮遜被委任為翻譯員時，大家深知他的宣教目的，他知道這份工作只會促進他的宣教工作，而不會阻礙他。雖然有時倫敦的東印度公司董事部對於聘請一

位新教宣教士的職員會有甚麼後果感到憂慮，但是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代理人發現馬禮遜是一名既聰明又有效率的公司雇員，在他這份正式的工作保護下，他就能夠翻譯聖經，做他最重要的工作。對於翻譯聖經，廣州的英國商館主管寫信給他，上面寫著：「如果有必要的話，我看不出為甚麼不能公開你將聖經翻譯成為中文這件事。我們（商館的成員）可以振振有詞回答中國人：『我們認為這書（聖經）在有書之中是最好的，馬禮遜先生剛好有這樣的才幹，並且願意把這書翻譯成中文，好叫你們也能夠去讀，我們認為他做了一件好事。』」

一八一〇年九月，馬禮遜的聖經譯本已經到了付梓的階段。他準備先印一千本《使徒行傳》。在離開倫敦前，馬禮遜曾在大英博物館抄下了四福音合參、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的中文手稿。這些手稿是一些不知名的耶穌會神父翻譯的，對馬禮遜的翻譯工作有極大的幫助。我們可以這樣推論，儘管馬禮遜是一個不辭勞苦的人，如果沒有這些無名者幫手，他的工作就不可能這麼快完成。在翻譯使徒行傳這一類的工作，天主教及新教在神學及教會上的差異，並不至於影響到這樣的合作。這本使徒行傳的印刷，是由馬禮遜的助手兼私人教師蔡盧興負責的。蔡盧興是一位讀書人，在馬禮遜抵達廣州後即被雇用。蔡盧興後來承認，收取的價錢比該付的價錢多兩、三百元。我們要記住，馬禮遜的助手及印刷商當時確實冒了極大的險，這可由

當時的皇上諭旨看到。馬禮遜在一八一二年四月二日的一封信附著該諭旨的摘錄。「自此以後，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眾，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為防範，為首者立斬；如有秘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名字（即洗禮）者，斬監候（即收監候斬）；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當時政府壓迫基督徒是這麼厲害，怪不得印刷商要多收一些錢了。他們在那次所印的《使徒行傳》的封面上，用了一條假書籤，作為掩飾。

同一年，即一八一〇年，梁發的母親逝世，他回到高明奔喪。住在廣州的那幾年，他一年回去最少兩次，就是清明節掃墓及新年。他現在已經學徒訓練畢業了。他會把成為熟練印刷工人的一部分工錢寄回去給雙親及弟弟，作為養家之用。梁發很可能要付起大部分的喪事開銷。即使像他家那般窮困，也得鋪張地辦理後事，因為崇拜偶像這些儀式本身就是件花費很大的事。但因為她是他的母親，而且他與母親一樣，有著迷信的恐懼。我們可以肯定，他不會埋怨把好不容易賺來的儲蓄花掉，讓她母親的遺體可以在吉祥的地段，有一個風光的葬禮，好讓母親的靈魂在西方極樂世界安息。這裡有一個需要擔心的理由，就是他的積蓄恐怕並不多，因為他後來承認，他早年常與壞朋友為伍，把錢都花在豪飲和賭博上。

回廣州以後不久，這個年青雕版匠就因他的手藝而與馬禮遜常有機會接觸。在一般人眼光看來，這個會晤不過是偶然罷了，其實卻是神旨所定的。有人批評說，馬禮遜的信徒都是從他的僕人中找來的，他們的信仰是跟利益有關的，說這種話的人，不是對事實一無所知，就是有惡意要掩蓋真相。經馬禮遜施洗的人，都確實曾被特聘用的。因此他們就享有機會定時聽到以自己語言教導的基督教道理，他們也時常與尊貴的基督徒紳士接觸。少數人是因個人的危機而受洗，但他們都得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教導才能受洗，而且是在政府禁止下受洗信主的，他們會遭親朋的排擠，在選擇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後，就會自動犧牲跟外國人連繫所能得到的報酬，因這和信仰有抵觸。所以一些早期改信基督教的人在試煉中失敗，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們要對那些捨己並背起十字架的人要公平些。我們會在本書提到其中一些人。梁發並不是馬禮遜的僕人，他是雕版工人，為十三行附近社區的人工工作，而且是受蔡盧興的聘用而雕刻新約聖經。他最初接觸福音是從雕版中看到，沒有證據說他一開始是從宣教士口中得聞福音的。

那位把梁發贏得向基督的人是米憐，他與他的年輕太太在一八一三年由蘇格蘭到達，參與馬禮遜的宣教工作。七月四日星期日，他們到達了澳門，但並不受葡萄牙政府歡迎，米憐只能逗留十八天就得離境。他後來偷渡到廣州的十三行，在那裡開

始秘密地學習中文。年底馬禮遜跟米憐發現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宣教基地的時機還未成熟，馬禮遜早在離開英國時就已預料到。他在一八〇六年寫信給他的父親說：「上星期二我跟倫敦會的董事們見過面，他們同意我先到馬德拉斯（位於印度東南部）再到馬六甲，先把行李放在那裡才去廣州，看看能否住下來。如果可以的話，我就把書送去馬六甲。如果不能，我要回馬六甲住下來，因那裡有數千的中國人，我可以努力學好中文。」他是經美國過來的，所以這個計畫改變了，當東印度公司給他一份工作讓他能留在中國時，他正想搬去馬六甲。唯一的問題是，馬六甲是否適合建立差會呢？這董事會決定米憐先應先拜訪東印度群島華人移民的集中地，讓他可以分發聖經和等候中國開放的機會。米憐取道於蘇門塔臘和馬來半島之間的海峽回到馬六甲。那邊的英國當局很友善，天氣又怡人，港口容易通到在印度和中國來往的航道上的東印度群島那裡的市鎮，可以找到一些華人社區。當米憐夫婦在一八一五年四月前往馬六甲設立新的宣教基地，他們還帶回了馬禮遜推薦的忠心的印刷工人梁發。梁發不僅參與印刷新約，還替米憐所寫的新書製作雕版。米憐在廣州作短暫逗留時，對掌握中文大有進步，他甚至能夠寫出一篇有關基督生平的文章，經由馬禮遜改正，梁發雕版，於一八一五年二月出版。

梁發常被誤認為中國第一個信主的人，就算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理雅

各 (James Legge) 及巴里士卑 (William Gillespie) 這些能幹的權威人士也犯了錯誤，以後的作者也自然是以訛傳訛。但是馬禮遜和米憐的來往信件清清楚楚表明其實不然。中國第一個信徒是蔡高，就是上面所說的蔡盧興的幼弟。當馬禮遜來華後第一年，阿高年方二十一歲，來到馬禮遜的家。蔡高兄弟的父親在澳門是船主，後來因船隻由耶加達回程時，在南中國海沉沒，以致喪失了家族的產業。蔡高的父親在蔡高十六歲時逝世了。雖然蔡高年青時身體不好，令他無法把握最好的機會受教育，但蔡家大小都接受良好的中文教育。馬禮遜被他大大的吸引住，他來到澳門不到一年，寫道：「這裡有個男孩，是個失去父親的孤兒，他是盧興的弟弟，他的健康尚可。我希望能多注意他。」他嘗試令蔡高對耶穌基督發生興趣，但因為言語上的隔閡，不能講得清楚。後來蔡高的兄長聘請他督印新約的工作。馬禮遜在一八一二年十月他的日記中用羅馬拼音寫下蔡高的名字。那時蔡高已固定參加每天的祈禱會和星期日的崇拜，他還請馬禮遜教他禱告的方法。一天，蔡高拿了幾個偶像給馬禮遜看，說他相信宣教士所說崇拜偶像是無用的說法。蔡高請求馬禮遜為他施洗。但他希望秘密的受洗，甚至不願他的哥哥知道。馬禮遜對他的品性並不滿意，因為蔡高性情急躁，常與哥哥及其他雇員口角，所以馬禮遜把他辭去。蔡高似乎沒有因此懷恨在心，他每個星期天必從家裡走好幾英里路去參加主日崇拜。他也養成了祈

禱的習慣。他向馬禮遜懺悔說，他對親友未盡他應盡的責任，所以心裡有罪疚。蔡高經過長時間的考驗，並有許多證據顯示他有真正的改變，就寫了他的信仰剖白，馬禮遜就決定為他施洗。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在澳門海邊一座高山山腳的泉水，為蔡高施洗。那泉水的水至今仍山旁流下，發出汨汨聲，並匯聚在一條公路橫隔的飲水泉旁，蓄在海邊的幾個小蓄水池中，現在被拿來當洗衣服之用。這件事在馬禮遜的日記上有這樣的記載：「在流到山腳的泉水中，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洗，這人的性格和名字在之前已提過了。哦，主能夠用耶穌的血洗淨他的罪，用聖靈的能力來淨化他的心，希望他是大豐收的第一個果子，是在千萬人中來得拯救的。」蔡高再也沒被馬禮遜雇用，但他此後繼續嚴守他的信仰，直到他在一八一九年因肺病而離世。澳門有一間教會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相信當日洗禮的泉水仍從山間流到海洋。而這位寂寞的先驅的禱告已蒙應允了。

第四章 比正午的日頭更光明

從有意識的抱負、自知、自責和自制，開始讓我們每一個人更深入的與優秀男女交往。就是這樣，我們可以在他們裡面，看到有甚麼東西能讓我們醒覺過來。

——麥金托士教授 (Professor H. R. Mackintosh, D.D.)

梁發抵達馬六甲後不久，就成了一個熱心慕道的人。我們能找出對他改變的一些影響嗎？他以前與馬禮遜的接觸，和他離新約書版時由書版中所認識的聖經，都對於他的心靈有顯著的影響。而且至少也引起他的一些疑問。他後來脫離了舊有的環境和壞朋友，並找到他從新開始的機會。幸運得很，我們這裡有梁發所作的自述，說明他之所以立志相信耶穌的原因。他說：「我未信救主之前，雖然自知有罪，但不知怎能獲救。我每逢朔望，必會往寺廟參神，求神保佑，但我身雖拜神，但內心仍懷著惡念，說謊和欺騙別人的念頭始終無法離開我的心。後來我與一位傳教士同往馬六甲，他常向家裡的人宣傳由耶穌而得救的教義。我雖參與他的聚會，但我的心其實不在當中。有時我看他們的聖經，又聽他解釋，但我卻不能完全了解其中的意義。當我聽聞傳教士勸人不可拜偶像的時候，我常說：『這真是一個

新奇的宗教。照他所說，元寶、蠟燭、金花、冥鏹，都是無用的，而且是罪過。我恐怕佛祖會因他褻瀆神明而懲罰他，我們便可看到他的教條會怎樣了。

「數月之後，有一個僧人從中國來，住在附近的觀音廟中。他常來探訪我，我問他：『我要怎樣做，罪才得到赦免？』」他答道：『每日背誦真言，那麼在西天的佛祖將赦免你全家的罪了。如果有人能布施錢財給與僧人，請他為那人唸經，這樣來生可投生富貴之家，且不至受地獄之苦。』我聽完這段話，一心想做一個佛教徒。這位僧人送了一卷佛經給我，囑咐我每日讀一次，說如果我唸至一千遍，那麼前生罪過都可以抹除。此後我便每日背誦這經，但有一晚我獨坐時，自覺生平犯了很多罪，光是唸經，但一件善事都不做，未必就能得到赦免。

「同時，我又聽聞那些傳教士說耶穌的赦罪，在閒暇的時候我又自己查考聖經，見經中嚴禁不潔、欺騙、拜偶像等罪過，於是我想：『這是一部勸人離惡的善書。而這書的教訓又得耶穌的神蹟作為證明，這書一定是真經了。』此後我便留心聽人解釋聖經，而安息日讀經時也更加注意，而且求傳教士為我解釋。我問他：『耶穌替人贖罪，究竟為甚麼呢？』傳教士告訴我：『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被差到世上來，為罪人受苦，使所有信的人都能得拯救。』因我自覺是個罪人，我就問他：『怎樣才能得赦免？』他答：『如果你肯信耶穌，上帝將認你為兒子，在來世

賜給你永生。』

「回房後，我想我是一個大罪人，如不靠著耶穌的功德，上帝又豈會赦免我？於是我便決志成為耶穌的門徒，要求受洗了。」

以上是一篇最有價值的個人見證。梁發經歷了真正的宗教經驗。他深覺自己的道德責任，並自覺是個有罪的人。他誠心要在佛教僧人的傳統普及方法中尋找赦免之道，卻是找不到。他的心靈中早已甦醒並有與上帝和好的念頭，就是那位公義，並能使罪人稱義的上帝。他準備如同奧古斯丁說：「你（按：上帝）為你自己創造了我們，我們的心不能靜止，除非在你裡面得到安息。」他畢竟在聖經中和宣教士口中所說耶穌基督裡，找到了到上帝之路。這句陳述是那麼簡明、清晰和令人滿意，我們不能就此推論該陳述用盡了所有曾經在雕匠心中動工的種種影響力。他不能給讀者深刻的印象，倒不如那經整理過、有歷史和地理背景、並附有啟發性的解釋和恰當圖表的故事，觀察出救主的真實性及帶出救主的價值。而且初期翻譯的新約，因譯筆拙劣，怪異名字迭出，當時又無熟識的教授方法，所以很難令中國讀者明白。米憐的小冊子卻有所不同，因他並不一味追求譯文的準確而犧牲流利的語句。主耶穌的故事無疑是最感動梁發那易受感化的天良和追求真理的心。

這雕匠所讀的是超越米憐字面上所表達的，他在米憐身上看到基督生平的人格。他常在那傳道所作客，在那裡他見到第一個基督徒家庭。那兒天真的兒童能夠吸引這孤寂的人，特別是米憐的妻子在離開中國航行四天後產下的孿生子。他每天參加家僕和工人的家庭禮拜，不單聽那奇怪的教導，也聽那屬上帝的人真誠的禱告。米憐的傳記作者曾記錄這樣的一件事情：當他第一次向倫敦會中的鴨巴甸委員會前請求來華佈道時，眾委員都以為那樣一個粗魯的鄉下少年不能勝任去擔任文雅有禮的中國人的宣教士。當他們聽了他的禱告之後，懷疑頓失，承認他是真正稱職。

中國教會可以把梁發的洗禮週年紀念當做教會假期，特別是無人知道他的生日是在甚麼時候。米憐對梁發的洗禮印象深刻，他也小心詳細的紀錄下來。米憐於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日安息日所寫的日記中記載著：「今日十二時我以尊貴的三一神之名為梁公發——通常稱梁發——舉行洗禮。洗禮是在傳道所的一間房中舉行的。在未施洗之前，我曾經與他鄭重的談話，教導著他，並為他祈禱，以預備他接受這聖禮。這些準備的工作用了許多時間。我看到他堅持要做一個基督徒，就給他施了洗。我希望他在情緒和性格上的改變是單單由於基督教的影響，哪一個人能夠知道他的心？我私下問了好些探究性的問題，又給他做一個適合慕道者的問答練習。他

祖籍廣東省，年約三十三歲，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之外，並無其他親屬。他受過普通教育，能讀一般書籍。他的性格堅定，更有節儉的習慣，他不像一般中國人那樣善於應酬。他從前很頑固倔強，有時令人討厭，近來已無可指責了。……他要求在正午十二時受洗，這個要求的動機何在，我不能斷定，據他說是『因為正午時日影不偏不倚』，但照我猜想起來，那是因為他的心中仍存有中國人那牢不可破的擇日迷信。我告訴他說，在上帝的眼光中看來，此一小時與彼一小時毫無分別，他既然做了基督的門徒，就應視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一樣，只有安息日是特別劃出來為事奉上帝之用的。我知道這種迷信一時難從第一個初信真道的異教徒心中除去，又知道讓他加入教會並為他舉行了洗禮以後，這種迷信自然會破除無餘，不宜因這件小事而遲遲不舉行那聖禮。」

這位前一世紀的傳教士在他的態度中顯出了他的仁慈與智慧。也許梁發首次誕生的時辰是正午十二時，因為中國人相信時辰會影響一生的際遇，所以小心保存著生辰記錄，因此他選擇這個時間紀念他的重生。又或許他以為正午是開始新生命的最適當的時間。也許他腦海裡想著使徒保羅歸主的經驗。（也許他想）「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

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各書一17-18）現在不論他所持的理由是甚麼，這位宣教士默許這種無害的要求。如果將接納信主的人到教會的標準訂得太狹窄，可能會造成傷害。如果西方牧師堅持要有他們國家熟悉的相等經驗，就會造成障礙，我們的主在那兒就找不到一個人了。在未為梁發施洗前，米憐每星期見梁發一次，為他做特別的準備，在面談時，他會向梁發解釋梁發自己讀經時發現的難題。這位宣教士不是等到梁發的基督教經驗成熟後才施洗。

以下是米憐對於這慕道者所發出的問題和這慕道者的答案：

問：「你是否真正要離棄偶像來事奉又真又活的上帝、創造天地的上帝？」

答：「這是我心所願。」

問：「你可知道和感覺到你是有罪的被造之物而不能自救嗎？」

答：「我知道的。」

問：「你是否真的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和世人的救主，而你為著救恩的緣故單單相信祂？」

答：「這是我心所願。」

問：「你要成為基督徒，是否想藉此獲得世間的好處、利益和報酬？」

答：「不，我所以受洗，是因為覺得那是我的天責。」

問：「你是否從今以後直到老死，立志始終謹守上帝的誠命及律例，在人面前行公平公義？」

答：「這是我心所願，只恐力與願違而已。」

上面的問題與答案都是他們自我的寫照。我們再難找到比那五條更基本更概括的問題了。米憐在他那篇記事上加添下面的幾句說話：「在我而言，這次聖禮使我有種感動、喜樂、盼望與驚懼交集的感覺。他是這新枝上的第一個果子，希望他能守信至死，使日後有豐富的收穫，使教會中人快樂，增加基督的榮光。」

受洗之後，梁發繼續為米憐牧師工作了三年，但「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弟兄。」。他在基督教的知識裡穩定長進，是個勤奮的學生。但他並不是一直使老師感到滿意，不然會對這位蘇格蘭神學家和中國信徒寄望太多了。米憐寫道：「我給梁發看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叫他試寫些東西，作為小小的測驗。他有很好的見識，卻漏掉救贖的條文，還有，除了寫基督的神性之外，他還寫有關耶穌降世的計畫，完全是索辛尼的講法（Socinian discourse）。」（註）米憐這樣的結論是對老師而不是對學生的批評：「若大略把事情說出來，很容易失去它的效果。」我們若了解梁發倫理、宗教傳統的話，就不會對他的難處感到驚奇了。要這位中國基督徒反覆讀宣教士的教導的教條，是一回事；如果要他很誠實用自己的想

法解經，那是另一回事了。

梁發現在對宣教有關的各種工作都感到興趣。這時米憐申請到一部印刷機和兩副英文和馬來文的鉛字，教他的印刷工人學習排英文和馬來文用印刷機印書，但印刷中文聖經則仍用雕板。因馬禮遜在澳門和廣州工作所受的限制，所以大部分的印刷及發行工作很明顯應在馬六甲進行。

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十日，當英華書院在馬六甲舉行奠基禮。馬禮遜長久以來盼望的計畫，終於有一部分可以落實了。多年前（一八一三）馬禮遜寫著：「我希望在馬六甲有個訓練宣教士的學校，是為歐洲人或本地人，也是為那些在恆河以外的國家的人而設計。也希望有最好的印刷器材。我相信通過本地的宣教士和聖經，福音會得到勝利的。」他希望這學校能夠使英國以及用中文的國家之間能有良好的溝通。校方不一定要學生相信基督教或參加禮拜，但會邀請他們出席的。馬禮遜為這所學校的工程籌集了一千磅，每年的經費一百磅，他還替圖書館收集到不少有價值的書。米憐是第一任校長。由於懷疑這新的事業太過冒險，因此剛開學時，學校給孩子一些錢，父母才願意送子女來學校。這間學校不久就把困難克服了。梁發自然對這計畫很有興趣，後來他考慮做個不很正規的神學生，跟這間書院有關。

米憐也開始辦了一本中文月刊《查世俗每月統計傳》，梁發也常撰文投稿，所

以他開始了訓練的新階段，讓他能寫出或說出對基督拯救的經驗。

註：索辛尼主義 (Socinianism) 是指十六世紀利人勒立·索辛尼 (Lelio Francesco Maria Sozzini, 1525-62) 及他的侄兒福士都·索辛尼 (Fausto Paolo Sozzini, 1539-1604) 所提出來的一元論神學。他們強調人理性的能力。福士都認為人的問題是要從自然的死亡裡面拯救出來，死亡並非是罪的刑罰；而基督只是一個人，上帝讓他從死裡復活並參與祂的能力，統治世界直到第二次的再臨。

第五章 娶妻的代價

我知道你的心已經跟基督結婚了，所以最好不要離婚。別跟這樣的一個丈夫相遇結合而後悔。請為我這個基督的囚犯禱告吧！

——賽繆·盧瑟福 (Letter of Samuel Rutherford)

一個中國人寄居異國，實難覺得快樂，梁發的心常掛念他久別的家人。他與他們分離得太久了。中國的氏族制度總會將該族的孩子召回來，不管他們流浪到甚麼地方。在廣州城北面大村外面的松樹林，一個路邊的庇護處上刻著「散居的人，歸來之處」的字眼。該村有數以千計的男人到五大洲去討生活。這些村人雖然居住在天涯海角，但他們的心仍舊繫在他們祖先的家。如果他們不幸死亡，他們也希望能將屍骸運回，埋葬在祖墳裡。在海峽殖民地、東印度群島，包括菲律賓群島，好些中國移民覺得那兒氣候合宜，適合建立永久的居所；但梁發是孤獨的。他孤寂的感覺因一八一九年三月一個摯友去世而越發增加。那個摯友就是那教他知道甚麼是基督徒家庭的米憐夫人。米憐夫人死後，米憐悲痛萬分，此後他因思念她，日記上經常淚跡斑斑。也許這傳教所的悲傷事故使梁發渴念他的家人更甚，在

想到從前的喜樂時，也促使他決定要找尋一個終身伴侶。無論如何，他很快的就乘船返回廣州。米憐在日記中寫道：「阿發這位中國的基督徒離開了我們。我給了他一些適當的指引、作了禱告、掉了許多眼淚之後，我們就分開了。願主保守他平安穩妥和至死忠心。」

他再一次見到山上的樹，旁邊的瞭望塔，以及老家村前的祠堂。他沿著防洪堤踩著熟悉的路，在這幾年中，最大的變化還是他自己。他回到故鄉高明縣後，對前途有些打算，他帶了積蓄去籌辦婚禮，並為父親蓋新屋。快進村的時候，他發現，身為一個基督徒，一個跟隨基督、住在馬六甲差會院子的人，著實是件與眾不同的事。很多接受基督的中國移民回鄉後，就會因跟當地的現況妥協而墮落了。這對於一向注重個人生活的西方人而言，是很難體會如此嚴厲的試驗。而對梁發來說，就更難受了，因他的經驗是史無前例的。如果他是個回教徒，他至少在廣州城還能找到熱鬧的信徒圈子；如果他加入了羅馬天主教會，他會受到廣州城一帶的教徒歡迎他。但梁發是孤獨的。他是這非法新教的唯一代表。他與家人團聚後，人家都寄望他參與拜祖先拜偶像的儀式，同時他也不能避免中國婚禮中的異教儀式。他可以怎麼辦呢？要辦一個安靜的婚禮去配合一個曾旅居海外、受異俗影響的人，那似乎並不可行。新娘的家人也絕不會接受這種脫離傳統的恥辱。對一個回流的移民而言，

結婚是整個家族的事。我們只能猜想一個本來快樂的筵席，卻給這固執的新郎掃興了，他父親和親友一定很難過。我們不知道梁發怎麼辦或人家如何對待他，但我們知道甚麼事使他決定對鄉人說清楚他是基督徒，並讓他渴望鄉人意識到拜偶像的邪惡。

從馬禮遜、米憐的方法和梁發的手藝，我們可以看見梁發怎樣作見證。他拿起尚未完成的中文聖經，寫了些小冊子，裡面收錄了些最重要和最清楚的經節，是關於上帝的創造，拜偶像的罪惡，人要信主而得救的需要，書名是《救世錄撮要略解》，裡面有十誡，三首聖詩和禱文。這小冊子只有三十七頁，但它是第一本用中文寫成的新教佈道書籍。他把原稿帶到廣州去給馬禮遜看，在得到馬禮遜欣然批准後，他就拿去雕板，並印了兩百本，準備帶回家鄉分給鄉人。但沒料到他還沒離開廣州前，被衙役逮捕，連同他的雕板及書籍都被沒收，並把他押解到縣署裡去。另有一位米憐的僕役也同時被捕，他們在酷刑的威嚇下，被迫吐露他們所知馬禮遜及米憐有關的事，並供出曾受米憐雇用的華人姓名。縣官取了供詞，立刻派人到東印度公司馬禮遜的房中拘捕蔡高的幼弟蔡三，但馬禮遜將他鎖在自己的臥室中。

梁發在縣官面前力證他所印的小書，不但沒有甚麼荼毒人心的地方，而且是勸人為善的。縣官說：「你的書胡說亂道，毫無意義，但我因你的離國出洋而罰

你。」說完，即吩咐衙役說：「打他！」當時中國移民律有這樣的一條：「凡軍民人等私自出洋貿易及遷往外洋群島居住者，治以私通敵人之罪，為首者處死刑。」這條律例到一八六〇年仍然存在，但從未嚴格執行，只為地方官吏向回流移民或他們的家庭敲詐財物的工具而已。

梁發的書籍和雕板全都被毀了，他更被衙役用竹片在腳掌上毒打，血從兩足流下。他在獄中反思，他將基督的真道介紹給他的同胞卻得到奇怪的結果。但他肯定他印書這事是對的，因此他覺得他之所以受到酷刑之苦，實在是因自己的罪，他決定要向上帝認罪和尋求赦免。由於要籌集昂貴的罰款，所以梁發暫時被釋放，他於是去找馬禮遜幫忙，但馬禮遜覺得如果答應他的話，會造成一個危險的先例，這對雙方都肯定會是難堪的經驗。馬禮遜寫著：「他是個基督徒伙伴，並為基督受苦。我可以怎麼辦呢？如果我給他錢，人們會說，有位東印度公司的雇員給了他一千元（這太誇張了），這樣做的話，會為類似的攻擊開了先例，因為我可能為了關心宣教工作的緣故而用了這個方法，被人家欺詐（以受苦為藉口），所以我拒絕了。」馬禮遜向有力的中國商人極力遊說，請求營救釋放。梁發積貯的一些錢本來預備為他父親和妻子蓋房子用，這時不得不拿出來交給縣官，連他的衣服也給衙役拿去了，他更被禁止住在廣州城。馬禮遜寫給倫敦會的信上說：「我相當高興這個中國

基督徒是為基督受苦，而不是為自己的罪受苦。我們和他都沒有理由把他那入獄的事視為恥辱。在福音傳揚出去之前，這地有殉道者的血灌溉，並不是不可能的。」梁發在自述他那次的經歷時說：「我不敢違背基督。」

自從梁發被驅逐出廣州城之後，他返回故鄉，與他的家人親友團聚了四十天，然後又到馬六甲去，跟米憐工作和學習，又過了繁忙的一年。這時整本聖經已經翻譯完畢並已印了出來。舊約從申命記到約伯記的那幾本是米憐翻譯的，其餘的則由馬禮遜翻譯。格拉斯哥大學因米憐曾參與那偉大的工作，給他頒發了神學博士學位。一年之前，馬禮遜也得到相同的榮譽。我們可以想像梁發得到整本以他自己語言寫的聖經有多高興。馬禮遜將梁發回中國的事情跟完成翻譯的事工連起來談，暗示著這位基督徒印刷工人感到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留在海外。目前在上帝的旨意和宣教士朋友獻身工作下，給了他的同胞聖經，因此梁發的工作就是去把聖經信息帶給他們。米憐在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三日寫信給馬禮遜說：「若梁發持守信仰，追求知識，希望能在一、兩年或更長的時間成為可造之材。好讓他回中國前按立他，一旦你逝世後，或者有信心的人未能到你面前受洗，他就可以合格施行基督聖禮。他明年夏天可能回中國去，我想說服他多留一會。請你慎重考慮這事，如他能由我們這小學院送出去，這書院在開辦了兩三年後，能出了一個當地的佈道者，還算可以

適合去從事傳福音這份受祝福的工作，那可是多大的憐憫和安慰。……我希望我們所做的是一致的行動。請告訴我你的想法。」

沒有人能勸得動梁發在馬六甲多留一段日子了，其中一個原因是他那在古勞村的小兒子出生了，他很想去看看他；另外，他在傳教所看到一個基督徒家庭，看到那位基督徒妻子和母親的影響（按：米憐的夫人），就決意要去引導妻子信耶穌基督。他回老家後，因得了男孩子而非常快樂，生男孩是中國人最好的禮物。他常和他的妻子讀聖經，並向她解釋，又常與她一同祈禱，有時會為她祈禱，後來他的妻子果然信主，使他喜上加喜。她是中國第一位信主的婦女，成為新教勞苦結出來的果子。但她如何接受洗禮加入那可見的教會呢？洗禮對梁發來說是個寶貴的經驗。如果帶著孩子長途跋涉到廣州或澳門去找馬禮遜，就不大可能。是否該將這儀式押後呢？我們可以肯定他很快地作出決定，他最終決定自己來舉行洗禮。他在簡陋的家裡，在一個沒有甚麼陳設的房間中舉行洗禮，他從村裡的井中取水，用飯碗來代替洗禮盆，這樣梁發就將他為基督得到的第一個獎賞，接納到基督徒的團契。他以宣教士為他施洗的儀式做為模式，我們可以肯定他最先選讀了幾段聖經，然後作一回懇切而直接的祈禱，也許他更唱了一首讚美詩，因為梁發很熟悉禮拜時甚麼時候要唱詩。當這個無知而年青的中國婦女，背著孩子，立誓離棄偶像跟從基督，而由

身為工人的丈夫將聖禮的水灑在她低頭來的頭上時，世間一切宏偉的座堂都不能更成為上帝的家了。幾年後梁發回憶這神聖的時刻，說道：「從此以後，我們夫婦兩人一心一意奉事唯一生活著而真實之上帝，世界之唯一主宰，且切願盡力使我們四周迷信偶像之人回心轉意奉事上帝焉。」梁發的妻子姓黎，是同村的另一區人，夫妻倆有許多共同的興趣。

梁發使他的妻子信主之後，上帝的恩典加強了梁發獻身傳福音的立志。他自覺需要多一點準備，他與他的妻子商量過，他要再到馬六甲米憐那裡去繼續學道。一八二一年，中國第一對新教基督徒夫婦因為福音而別離，梁發的妻子跟兒子留在家鄉。他妻子為這新信仰的試煉到底受了甚麼苦我們只能付之想像了。她不識字，也只了解基督教最基本的道理，獨自留在這個她長大生活的異教徒社群中，她的處境比丈夫的更困難。

米憐如兄弟般接待梁發，贊成他專心研究聖經。這位學生發現這位老師的身體不健康而很難過。因為米憐所負的責任多而且重，他愛妻的逝世使他終日憂傷，是他更大的重擔。他的肺時常出血，他曾往檳城去，但環境和氣候的改變沒有帶來甚麼改善。然後他返回馬六甲。他在一八二二年六月二日時，在崗位上逝世了，死時只有三十七歲，跟梁發的年紀差不多。他是一個熱心、衝動、有決心的人，他深信

傳道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呼召。他常常說：「若我深信一件事情是對的話，我就會赴湯蹈火去完成。」他曾翻譯聖經的一部分，並曾任英華書院校長，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他又編輯一本中文月報和一本英文季刊。他一生譯著了許多小書和小冊子，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名叫《兩友相論》，當時是很有效用的中文佈道小冊之一。他在所有中文刊物上用的筆名是「博愛者」。他留下不辭勞苦工作的輝煌紀錄、聖人般的生平和崇高的成就，但是米憐在他獻身為宣教士的短短九年中所做的一件最偉大的工作，就是贏得梁發相信福音和訓練這位中國的弟兄。

第六章 中國的福音

遠東的人有他們自己精神與宗教的遺產，在好些方面是與西方民族不同的。他們的遺產幫助他們用自己的方法去了解上帝在基督裡的旨意。

——劉廷芳

當梁發亦師亦友的米憐夫婦逝世後，他自覺無逗留於在馬六甲的必要。這位中國以利沙已經繼承了蘇格蘭以利亞的靈，渴望把基督教信息傳給他的同胞。馬禮遜談到他的同事米憐時說：「沒有一位更熱心的傳道人了。」相同的火燄也在梁發心中重燃起來。他回到故鄉去，看到家人平安非常高興。他開始展開傳福音工作，要贏回他的父親成為基督徒，但這位老人家不願意放棄他祖宗的信仰。

梁發到廣州去找馬禮遜，安排帶他的小兒子到他的家領洗和種牛痘。這雙重目的的做法在這麼久之前就給記錄了下來，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東印度公司的皮爾森 (Pearson) 醫生在十九世紀初，就將天花的接種疫苗引進來。但到了一九三三年，梁發的家鄉如果有人種牛痘，還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種牛痘就是將天花病人身上的一片痂拿下來，種在小孩子身上，讓它發作，這樣小孩子在長大後就能免疫了。我

們也要指出，這樣打針的科學方法在廣東省其他地方都很普遍，而且通常都是免費的。

馬禮遜對梁發的來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發讀了歷代志下七章十二至廿二節後，就跟我一起跪下來用中文禱告，他的禱告是有感而發的，自由而熱情。上帝是當受讚美的！哦，希望種子能在中國生根長大，儘管人們不能說怎樣做。收莊稼的主呀！求你以聖靈的感化，從天降下甘霖來澆灌這道的種子。」梁發讀的經文是有關所羅門獻聖殿和獻祭後上帝的回應；提到聖父聖子和以後的世代，也比較服從上帝的人得福與拜偶像的人受罰，這經文是非常合適的。

經過安排，梁發在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梁發帶著他的小兒子到馬禮遜那兒施洗。在中國，為孩子取名是表示了盼望及祈求。孩子名叫進德，意味著這對夫婦希望兒子能在恩典中長大。然後人們叫他阿德，就像有地位的中國人一樣，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名字，這樣的做法有時確是令歷史學者迷惑。馬禮遜在他的日記上寫著：「今天，我們的中國同工梁發，帶他的兒子梁進德來這裡，讓他的兒子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受洗。哦！但願這小小的基督教家庭在這異教的土地上，成為傳揚真理的工具。」

梁發很急切的要在馬禮遜那裡繼續研究神學，他感覺到在研究聖經時，那些較困難的部分，例如舊約，即使看那些中文的釋經書籍亦無幫助，他也懷念米憐曾經給他的熟練的指引。可惜那年十二月馬禮遜要離開中國回國去了。馬禮遜來中國後，不斷工作了十六年，未曾休假。三年之前，他的妻子去世，他的子女也已經返回英國，他預備回國作短時間的逗留。但他最大的遺憾是，沒留下一個宣教士來繼續他在廣州和澳門已開始的工作。他曾多次向英國及美國教會呼籲，但始終沒有結果。在這情形下，梁發能返回中國使他有說不出來的安慰，而米憐誠心誠意的推薦他這份工作：「為了確保在一些已經唾棄偶像的人中間施行基督教聖禮，經過慎重考慮，他把梁發這位八年來表現出有資格去工作的人，獻給這在他同胞中做傳道人的職位。」梁發自述說：「馬禮遜先生以手按我，封我往四處各方向人宣揚福音真理。」根據那些接下來與梁發工作的宣教士的看法，很明顯看到馬禮遜按立梁發進入基督教事奉是完全合乎程序的。對於梁發替妻子施洗，或他自己的按立禮有任何反對的話，我們可借用英國周報編輯何敦（J. A. Hutton）所寫的來回答：「就我自己來說，對任何建議，我從來沒有向當局發出信仰或是實踐方面以外的問題，而且是很慎重地考慮到所有處境。」從他按立後，直到逝世時，他的薪金皆由倫敦會支付。

馬禮遜離開了中國比他所預計的時間更長。一八二六年九月十九日，差不多三

年之後，他才帶同新夫人及小兒子來到澳門。在這段漫長的日子中，梁發的工作如何進行，我們並無記錄可以參考；當時沒有郵政服務，他又不懂英文，在宣教圈子中更沒有其他英國朋友，所以他沒有方法寄報告書到英國去。馬禮遜回華後第二天，梁發就對他說數年來他怎麼運用自己的才能的故事。馬禮遜與梁發那種久別重逢的快樂使他頓忘一切不快，因為之前他發現他的住宅和家具因無人看顧而致朽爛，而他的書籍亦被白蟻吃掉，一時心中非常失落。他感謝上帝，並且恢復了勇氣。他和梁發一同禱告，感謝上帝保存他們的性命，並且讓他們一起仰望耶穌。在馬禮遜回華後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日，馬禮遜又照常為中國人舉行禮拜。禮拜後梁發給他看一本中文小書，是希伯來書的註釋，這本書是他在馬禮遜回英時所作的。馬禮遜說：「這書的目的，是想將他從已故值得悲哀的米憐那裡所得的宗教（按：基督教）觀念傳給異教徒。我讀了一部分，覺得梁發實在有一些優點，雖然其中用語不免有異教色彩，但由此可證明他實在研究過聖經。他又作了一本贊同基督教的短論，名為《真傳救世文》。」

這位宣教士在這裡或其他個案裡所評摘的那種「色彩」不一定是不良的，那是現代中國信徒極力主張的一點地方色彩，也就是基督教適應新環境的天然記號。一個中國傳道人，如果不會用傳統宗教生活的遺詞用字、或心理來與他的信息調和，

那是令人詫異的事，只有這樣才能令人明白。無疑當中著實存在危險的因素，因為總是有十字架的先驅率先到達新的領土。那危險已描繪在華北西安府的景教碑上：十字架、雲和蓮這個組合，代表了基督教、道教和佛教的融合。

馬禮遜對梁發在那三年裡，忠心及辛勤的盡傳道人的責任十分滿意。他從梁發那兒，收到好些他跟鄉人談論宗教的紀錄，以下是一個例子：梁發坐船時讀馬可福音，有個乘客從他的肩膀上悄悄看過去，看到「直至人子從死裡復活」就問梁發那是甚麼意思。梁發便告訴他有關耶穌受死與復活來替人贖罪，同時也表白了自己的信仰，並向這人傳福音。這人聽了耶穌行神蹟的事，就問梁發有沒有見過。梁發說沒有，但這些神蹟在聖經中提過了。那人便說：「你沒有聽過嗎？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盡心》下）雖然西方人相信這些作品，但我們沒必要去相信他們。」梁發說他所以相信聖經所記，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個罪人，而且知道沒有這救主的話便不能逃過刑罰。他也引用孟子的話：「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註1）（《萬章》上）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些地方色彩，是由古典書籍出來的。梁發引用了對方熟悉的典故，讓人家很清楚他所說的，並感受到那種力量。那典故是這樣的：鄭國宰相子產得到一條活魚，下令僕人把牠放到池塘裡。這人卻把魚殺掉吃了，然後告訴主人，他已照他的吩咐把魚放到水中。那條魚最初

不知道自己在那麼，後來牠彷彿置身家中，最後就自由自在地游走了。主人高興地說：「牠到了該到的地方了！牠到了該到的地方了！」這僕人就跟朋友說：「誰說那個宰相是個聰明人，我把魚煮了吃了，他還說『牠到了該到的地方了！』」梁發把對這事的看法寫了出來，帶出的意思是：我們可以用常有之情（方）來欺騙君子，卻不能用不可信的道理來欺騙他；正如好人接受聖經證明了聖經的可信程度。

馬禮遜報告他不在中國時梁發的工作，他寫道：「在這樣的土地上，到處充滿偶像及拜偶像的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逼迫耶穌的門徒。即使有許多人好像尼哥底母，也不足為奇。就如教會歷史學者米納（Milner）所謂的「異教的基督徒」——意思是未有完全的宗教知識、怯懦而不敢直認是基督徒的人。不管我的弟兄們有甚麼意見，但這裡有一個人，是個決志的基督徒，而又能公然承認他的信仰，他就是梁發。我真的理解他的熱情，可能會超出他的智慧。」

馬禮遜回來後不久，梁發寫了可能是他的第一封致倫敦會的信，這封信經馬禮遜譯成英文，可代表他所寫的許多書信。信中說（註2）：「我儕雖分居異地，各未謀面，但我儕既同信我主耶穌，則久已心心相印矣。因我儕所信之道一，心一，望亦一也。故我梁阿發與列位老先生及一切信主基督耶穌之人在基督中實同一體，因我儕雖各不相識，但我儕之心則一也。」

「因此之故，我謹致書問候在大英國居住而誠心信從我主耶穌之先生與教友，願爾等平安！」

「當最上之主欲令一人一家或一國悔改信從真道時，彼用其奧妙難測之神旨召人宣傳福音，並召人信仰及服從真道。我梁阿發之所以得聞福音真道，全家信主，亦由於至高上帝神旨。彼感召老先生馬禮遜與米憐來華向我宣傳及解釋福音真道，同時又感召我梁阿發聽信及服從之。羅馬人書十章十四節曰：『未嘗信之，何由籲之？未嘗聞之，何由信之？未嘗信者，何由聞之？』」

「世界各國，宗教繁多，但無一能與福音真道相較者也。我如今不汲汲於尋求此世之福，而自願在傳教士之門為弟子，透習真道，且將其宣揚於我祖國人民，使彼等亦得聞此大喜之信息，相信且服從之。我希望我之同國人悔改向道，丟棄彼等之鑄像，崇事天地萬物之主。」

「但我儕中國人，由上至下，各種各界之人皆已久為罪惡所迷惑，且極端自高自大，福音真道對於彼等是一種新異之訓，而中國士人學問之傳授，其習慣又與別國不同，所以我恐德薄能淺如我者，實不足以教導彼等也。我惟有竭力盡心，且望至高上帝用聖靈之影響以感動人心而已。」

「但現在雖或不能有偉大之改變，在我儕生前之時日，不能見我儕努力之結

果，但我儕仍繼續將福音真理傳於別人，希望子孫後代之時，人人能悔改歸主也。

「故我懇切祈求所有老先生及所有真心信主之人，有德行者用彼之德行，有錢財者用彼之錢財，本博愛之心，將福音真理廣播各地，使所有人類皆悔改歸主，庶不致孤負至上主所顯示之救贖世人之恩德；反之，我儕可由之以盡我儕之義務，到來生之日，可望我儕之主賜我儕以無窮之天堂幸福，此時我儕可以永享安息和歡樂矣。願我主耶穌基督之安康永與列位同在。阿們！」

註1：孟子所言，原文如下：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

「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註2：梁發的信件譯為白話文，如下：

「我們雖分隔異地，素未謀面，但我們既然都信我主耶穌，就早已心意相通了。因我們所信的道相同，愛心相同，盼望也相同。所以我梁阿發與各位老先生及一切信主基督耶穌的人在基督中實在如同一人，因我們雖然各不相識，但我們的心志是相同的。

「所以我謹去信問候在英國居住而誠心信從我主耶穌的先生與教友，願你們平安！當至高的主想令一個人、一個家庭或一個國家悔改信從真道時，祂用祂那奧妙難測的旨意召人傳揚福音，並召人相信及服從真理。我梁阿發之所以聽到福音真理，全家信

主，亦由於至高上帝的旨意。祂感召老先生馬禮遜與米憐來華向我傳講及解釋福音真道，同時又感召我梁阿發聽信及服從福音。羅馬書十章十四節說：『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世界各國，宗教繁多，但無一能與福音真道可以相比的。我如今不忙於尋求今世的福，而自願在傳教士的門下學習真道，更向我祖國人民宣揚，使他們亦聽到這個大喜信息、相信和順服福音。我希望我的同胞悔改歸向真道，丟棄他們的鑄像，崇敬天地萬物的主。」

「但我們中國人，不論地位高低，各種的人都已久被罪惡所迷惑，而且極之自高自大。福音真道對於他們是一種新奇古怪的教訓，而中國士人傳授學問的習慣又與外國不同，所以我恐怕像我這樣才疏學淺的人，實在不足以教導他們的。我唯有竭力盡心，仰望至高上帝用聖靈的影響來感動人心吧。」

「現在雖然不能有偉大的改變，我們在世的日子，不能見到我們努力的結果，但我們仍繼續將福音真理傳給人，希望到了子孫後代時，人人能悔改歸主。」

「所以我懇切祈求所有老先生及所有真心信主的人，有德行的人用他的德行，富有的用他的錢財，本著博愛的心，將福音真理廣播各地，使所有人類都悔改歸主，才不致辜負至高主救贖世人的恩德；反過來說，我們可以盡我們的義務，等到來生的時候，盼望我們的主賜我們無窮的天堂福樂，那時我們可以永享安息和歡樂了。」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平安永遠與各位同在。阿們！」

第七章 富人情味的文學

蓋爾納 (Gardner) (他不是反基督教的言論中被打擊得很厲害嗎?) 相信辯護性著作有存在的必要，無懼於爭論性的課題。他覺得保持沉默，就等於否定他所知所活的真理，但文學一定要賦與人情味，而且是寫給普通人看的，不是單單用來擊敗那些好爭辯的人。

——開羅的登柏蓋爾德納 (Temple Gardner of Cairo)

在通商條約簽訂以前，中國政府要整個外國社團，每年夏天離開他們的商館好幾個月。中國政府這樣做，毫無疑問是要令外國人深深明白到他們的居留權是暫時的，這是因中國滿清政府的皇恩浩盪，讓他們每年能來中國是一種優待。中國法律也因同樣的動機禁止任何外國婦女到廣州。因此，馬禮遜能夠跟家人花一些時間在澳門團聚，這種強制性的休閒使得他能繼續教導梁發。馬禮遜在一八二七年九月那天寫下了一段話：「梁發已與我同住了一個夏季，他讀過聖經大部分，且每日前來求我為他解釋他不明白的地方，然後他回去將所聽到的記錄下來。阿發最擅於祈禱，當他跪下祈禱之際，也最能顯出他的虔誠。他天性暴躁易怒，跟同胞講話

也非常沉悶。因他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家中的異教徒僕役都毀謗、譏笑他是背棄歷代祖宗信仰的人，又是賣國賊。梁發曾完成了保羅所寫的羅馬書的意譯本，這書對於我們這些外國宣教士甚為有用，因這書告訴我們要用適當的字句，又使我們可評價他的觀念是否錯誤而加以改正。」

同一日，梁發又寫信給倫敦會，那封信仍放在原來的信封裡，保存在該會的檔案中。如要引用，會嫌太長，現將這封信其中一段收錄於下（註1）：

「況且貴國賢人君子尚有如此愛人之德，而愚本國之人反不愛本國者，豈是屬吾主之民乎？緣此，愚今在老先生馬禮遜門下，習讀讀道，一載有餘，幸得老先生馬禮遜循循善誘，博文約義，頓開茅塞，略知福音真道之義，第見真理無窮，其境難盡，愈思愈深，欲罷而不能，是以日夕早晚，切求上主施賜聖風之德，啟愚靈心，竭盡吾才，或能學習於一二，可以過慾寡過，正己修身，或以之勸眾教人也。雖然愚思學道或者容易，恆心守道而行者甚是難矣。」

梁發在經過長時間與老師一同學習，到了要分別時，非常難過，甚至哭了起來，為他無法領人悔改歸向基督而傷心哭泣。他決意著作佈道小冊子，分給同胞，覺得這是傳揚聖道最可行的方法。回鄉後不久，有一件事足以令梁發增加勇氣，原來他本鄉的人中已經有預備接受福音的人了。有一個名叫古天青（譯音）的年青塾

師對於聖經真理很感興趣，梁發安排和他同住，這樣他們就常有機會一同研究基督教。一八二八年正月的一個星期日，梁發就為這位初信道的人施洗，古天青曾寫信給馬禮遜（註2），述說他的經驗：「世界人類道德之壞，皆病于人無自知之明，且太狃于此世之惡習。數月以來，我與道兄不問朝夕，共研真道。彼云，真道最大之源是由天而來，最古之教訓雖中經許多流別，但皆詔我儕以天地間祇有一神。一聞此說，我遂立憶我從前所犯之愆尤與罪污。我欲尋赦免之門，但不知其路，幸而得吾道兄將此路指示與我。彼曰：『爾之罪雖重如泰山，如真誠悔改，信賴救世主耶穌基督，則爾罪將被塗抹，而爾獲永生之賜也。』因此我敬謹傾心信服，且接受洗禮來洗淨我之罪污，望由聖靈之恩在我心內種下善根，且助我結出聖果也。」

因著梁發與古天青的友誼，他們開始促成了一個新的實驗。他們兩人在他們那區合辦了一所為男童而設的基督教學校。那學校是在中國設立的第一項新教的教育事業。梁發利用中國歷來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來進行傳教的工作。以後所有宣教歷史都可以見證到這方法的價值。這不單能使小孩子在年幼時認識基督教真理，又可以自然地接觸到孩子的父母親戚，更同時可以使孩童有機會接受教育。這裡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裡教育的重要性，也看到古代中國與基督教本質上的融和。但這時機還未真正來到時，這種嘗試要通過考驗。幾個月後，就有人起來反對這學校和裡面

的老師，並有謠言指梁發散布迷信，且將國家出賣給雇用他的外國人。他的學校被解散，梁發也逃到澳門，此後我們便失去了古天青的消息。

馬禮遜對梁發繼續學習及從事文字工作，感到滿意。那年（一八二八）馬禮遜在向倫敦會匯報梁發的工作報告中，說梁發還著有佈道小冊子，這類小冊子共有十二種。其中一種是為他的學校的鄉村兒童而寫的基督教問答書，其他都是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朋友所發的反對基督教的問題而作的。有一個樣本可以看到他寫的是甚麼，有一種反對是：「既然說救主是天地之主，而且無所不能，在祂沒有不可能的事，那為甚麼祂要進入母腹降世成為人，而玷污、降低了自己的神性呢？這種說法，實在與真理和理性大大抵觸的。」另一種反對是：「既然福音是最好的教理，而上帝又是全能的，為何祂不感動皇帝的心，使他下令所有人民遵守真理，反而用我們這些下等的人來宣傳福音呢？」此外：「既然耶穌在漢朝之前還沒出生，祂怎麼救以前的人，又怎麼稱得上是世人的救主呢？」梁發在這本書中解答種種質問，並且憶述他向各種人傳道時的對話。當他向人傳道時，有些人對於他熱心於這新奇的教訓，報以微笑；其他人在他對偶像的批判時表示憤怒；另有一些人則接納真理，並且覺得他所提出的教訓有可取的理由，同時卻又覺得他所攻擊的意見深入中國人的心中，恐怕不是人力所能破除的。這位推行基督教著作的先驅在他的作品中

總是能觸及生活上問題。馬禮遜對於這些有價值的小冊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沒有一個用中文寫作的歐洲作者可以比得上由中國人自己寫作小冊子的效果。其中有兩份小冊子是以韻律的格式寫成的，這種格式在中國相當普遍，因為既可唱誦又容易記憶。

一八三〇年初，這小小的團體又加了一個新門徒。這人是屈昂，他曾在馬六甲跟梁發學習印刷，在那兒的差會印刷部門工作過幾年。他回到中國後繼續為馬禮遜做印刷工作，並恆守基督教誠命。從前他極懶惰，忽略去照顧妻子和家庭。他所住的村屋鄰近黃埔，那時是廣州海外船務港口，離市區有十英里。但自從在澳門馬禮遜的家中受洗之後，他就立刻回家勸他的妻子停止拜偶像，並單要信靠耶穌赦免她的罪。屈昂所以成為基督徒，主要就是受梁發的影響。我們可以猜測到他為見證他的新信仰所踏出的第一步，大概也是梁發的主意了。可能由於屈昂太過衝動，而祂太太也不像梁發那麼溫順，加上他過去的行為，都不能使她感動和相信。當他跪下祈禱時，他的妻子覺得他不用香燭，又不是跪在祖宗神主牌或偶像前而感到奇怪，就責怪他事奉洋人的神。她向她的鄰里公然罵他的丈夫已經離經悖道，說他的禱告給她帶來惡運，例如她洗衣服時就下雨。屈昂發覺留在家裡太難受了，所以就跟梁發一起工作，幫助他處理傳道和文字工作。他實習後第二年起，就受雇於倫敦會，

直到老死成為一個最忠心和重要的工人。

前面已說過，在倫敦會的檔案室有一本梁發寫的日記，記載了他從一八三〇年三月廿八日到十一月六日的工作。在這段期間，屈昂大部分時間是和梁發一起工作的，從廣州回高州的路上，他們花了六個星期，共走了八百英里。二人出發時，他們先去梁發在高明的家，在那裡準備印刷小冊子。其實文字的準備工作比不上他們各人的準備。從梁發的日記上可以看到在出發前，他經歷了一個明確的屬靈經驗。

除了好友屈昂信主之外，還有一件事大大地激動這傳道人的心靈。馬禮遜多次的呼籲，終於得到美國教會實際的回應，裨治文 (Elijah Bridgman) 牧師和雅裨理 (David Abeel) 牧師於是年二月抵達廣州。裨治文牧師在中國人中工作，雅裨理牧師則在黃埔，填補外國水手牧師的空缺。三月廿五日，馬禮遜請這兩位兄弟到他家中來和梁發見面。這兩位美國宣教士用這句話來總結對這位中國門徒的第一個印象：「梁發有主耶穌的形象」。在分離之前，梁發用中文讀了路加福音第十章，並用第二節作了簡短的談話「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裨治文說：「如果基督徒都願意考慮他表達這一節同樣的理想和印象，面對這廣大的莊稼，作工的人的比例就不會相差得那麼大了。」然後他們一同跪下，由梁發帶領祈禱，在他們未站起來之前，馬禮遜將梁發的禱文譯

成英文。馬禮遜告訴這兩位美國朋友說：「梁發的禱文不是用一般的表達方法，而是充滿感情和誠意的。梁發的禱文很適合於他們當前的特殊環境。」這一八三〇年第一次的中、美、英宣教士禱告會，可以吸引到一些基督徒畫家，將這禱告會作為一幅歷史圖片的主題。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的開端，而且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以中國教會就這樣歡迎了他們；梁發以心以口，進一步給他們按立和委任的印記。雅裨理在當晚的日記上寫道：「如果將猶太人的應許應用在中國人身上，由新麵構成的全團讓他們一個一個地如初熟的果子般聖潔，（羅馬書十一16）那麼我們就能盼望那被忽略的救主葡萄園一角有榮耀的收成……梁發歡迎這些宣教士來到這被黑暗籠罩的國家，看到他那特別是有救主的形像，實在使我們甦醒。」這次會面也在梁發心中激起強烈的反應。他感到這些從海外來的援兵，對他是個挑戰。幾天後他回去見馬禮遜說：「我已經成為主的信徒好多年了，但從沒有為上帝作過有價值的事。如果我突然死了，上帝問我做過甚麼，我要怎說好呢？我希望和屈昂到處分發聖經及小冊子，傳揚福音，這是我們的目的，可是我們沒有足夠的盤川。」馬禮遜答應給他需用的錢，並且叫他們小心，不要冒無謂的險。梁發請馬禮遜繼續代禱，讓上帝保護帶領他們。他們一同跪下來，把新工作交託給收莊稼的主。後來屈昂和梁發回到古勞村的家，整裝待發。

一天，梁發讀經讀到他常引用的經節：「然而人未能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羅馬書14：15）他再次想到上帝的恩典使他能歸主，有機會學習，還差派他去傳福音，如果他不教導中國人，他們怎能明白呢？於是他就立志研讀聖經，使得有更好的裝備出外傳揚福音。第二日，他讀完了創世記，為著創世的故事而感動，他就跪下祈禱，求聖靈的光，使他更能明瞭聖經中的奧秘。他在日記中說：「我常存心目的於聖經奧妙之旨而不忘記之，乃可以為宣教人也。」他就重新再將全部聖經讀過，並且在十天內完成了。

這兩位印刷工人的傳道人準備好了小冊子後，就返回廣州商量旅途的方向。他們最初想往北行，但最終決定拜訪一位學台，這人是負責監督全省的科舉考試，然後他們拜訪每個府，再看下一步如何。我們不知道梁發為甚麼作出這個重大的決定。他改變北上的計畫，因為本來有一個人願意作他們的嚮導，可是那人收了訂金後就逃之夭夭了。屈昂在那位學台的幕僚中有個親戚，可能是這原因影響了他們。但梁發轉向士子的主要原因是他開始就有一個信念，他知道那是聖靈的帶領，基督教只能通過受教育的領導層來帶領他的同胞。他也意識到他本身的局限。另一方面，外國人寫的或譯的書，文字不免粗俗，但他希望藉著他那肯定不完美的作品，

讓那些有學問及精通文學的人能信主，好叫他們的同儕或平民都能注意到他們。

他們跟著學台走了四百英里來到高州，用船從水路把書運過去。他們在沿途所經過的市集中給士子送書。到了目的地時，他們透過屈昂的親戚，得到當局誠懇的禮遇。他們每天都在考試場地的入口處派書給離場的考生，這樣一來，數百名來考試的士子就可以將他們印出來的信息帶回家去。高州早已因先進的文藝中心而出名。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有一個廣州協和神學畢業生在那兒做學生工作。梁發因這次成功而大受鼓舞，並且決定乘勝追擊到敵人的堡壘去。他們回到廣州城準備更多的書，打算在華南這個大都會的試場上大派用場。

註1：「貴國的賢人君子尚有這樣愛人的恩德，而我國的人反而不愛自己國家的同胞，豈是屬我主的子民嗎？因此，我現在在老先生馬禮遜門下，學習真道已一年多了，幸得馬禮遜先生諄諄善誘，博文約義，使我茅塞頓開，略略明白福音真理，越發見真理博大精深，愈想愈深入，欲罷不能，所以從早到晚，我都懇求上帝賜下聖靈的幫助，開啟我的心靈，竭盡所能，或者能學習到一點，可以遏止私慾、避免犯錯，正己修身，或者可以勸眾教人。雖然我想到學道或者容易，恆心守道者就相當難了。」

註2：古天青的書信白話文如下：「世界上的人類道德之壞，都由於人無自知之明，且太沉溺於

今世的惡習。數月以來，我和弟兄不分朝夕，一同研究真道。他說，真道最大的源頭是由天而來，最古的教訓雖經過許多流別，但都啟示我們天地間只有一個神。一聽到這番話，我就立刻想起我從前所犯的愆尤與罪污。我想找赦免的門，但不知出路，幸而得這位弟兄將這條路指示我。他說：『你的罪雖重如泰山，如真誠悔改，信賴救主耶穌基督，你的罪就會被塗抹，而你也會獲永生的恩賜。』因此我誠敬地傾心信服，並且接受洗禮來洗淨我的罪污，希望聖靈的恩在我心內種下善根，幫助我結出神聖的果子來。」

第八章 個人佈道

以個人去接觸朋友、或基督教工人，或親戚，這樣的方法會贏得更多人相信基督教，而且幾乎是其他各種方法的總合。

——《宣教的再思》(Re-thinking Missions)

早期的宣教士同工對梁發性格的描述並不很動聽。米憐說：「梁發不擅社交，也甚少跟其他中國人來往。」馬禮遜也發現「他天性暴躁易怒，跟同胞講話也非常沉悶。」這肯定對他是否適合擔任傳道人是一大障礙，但由接下來的見證，可看到他自從基督徒經驗變得成熟後，已經漸漸變得較好了。梁發在某方面確實反映出英國或美國的早期宣教士過於嚴肅的形像，他們幾乎忘了「上帝的國度也是喜樂的」這個真理。由歷史對他們的描述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缺乏了幽默感和笑的恩賜。在馬禮遜的傳記中，我們很難發現任何一章呈現出較輕鬆的氣氛，這樣的說法也可以用來形容梁發。馬禮遜在年少時，曾參加過巡行話劇的表演團，一位傳記作者認為這是最後一個最適合他的角色：「他是一個最冷漠的人，而且如果不是完全沒有幽默感，就是幾乎沒有幽默感。」

如果看了我們在家中的梁發，就會發現他是個很有感情的人。他是孝順的兒子，有愛心的父親和丈夫。他的日記中，有好多處提到他的家庭關係。他習慣在每次遠行後，回家跟家人一起禮拜，感謝主在他離開時保守全家。

在他跟屈昂開始危險的內地傳道之旅前，他為了準備家人的心，特地向他的妻子和兒子解釋馬太福音十章的意義，告訴他們，救世主在世時如何差遣門徒出外到各處去宣揚福音，現在也照樣差遣了他們。他叮囑他們不必為他憂慮，因為他們是去辦上帝的事，上帝將會照顧他們。在出發前的星期日，他在家中主持了兩堂講道，早上他叫他們注意看使徒行傳十四章廿二節，那是說門徒回到他本來受逼迫的地方：「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上帝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中午他提醒他們，使徒保羅在哥林多這個敗壞的城市開始宣教的爭戰吶喊：「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哥林多前書二5）。從這裡，我們可以見到他如何安慰家人，教導和鼓舞他的同伴屈昂，並更新上帝交託給他的使命。星期一早上，他們就沿著三洲堤壩起程，以真正的使徒模樣，開始他們第一次的傳道旅行了。

我們還可以到另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深刻觀察，梁發回家後，人們在慶祝七月初十五盂蘭節。數年前，他曾去信給馬禮遜談到人們過這節日的事，說道：「當我見

彼等作此無意識之舉，我心甚為傷痛，不知所為。我只能日夜默想及注意我自己之行為，堅心嚴守真道，向上主祈禱，求彼早日感化人心，使彼等改變，引彼等出永苦之路而復趨正軌而已。」這一次，梁發就跟妻子討論這件事，他談到不論貧富都被僧人騙了，他繼續說：「這樣妄耗錢財的事，個個人歡喜去做。我如今略為勸人不可去做此邪事，免費銀錢，誰知反被人毀罵。」他的妻子說：「現今的人，誰分黑白？眾人所歡喜做的事情，個人也歡喜做。如今我們不肯跟隨眾人，燒化香花、元寶、蠟燭、紙錢，我耳中不知聽了多少說話，說你講的道理似係天主教的人，又說你罵神罵鬼，後來必有大災大難。」梁發說：「據你聽人所說，你想我因勸人不可去拜菩薩神佛偶像，後來亦有災難否？」他的妻子回答道：「依我所想，必無災難。只怕我夫妻二人不能恆守神天各誠而行，才有災難。」梁發說道：「正是此理；但有時神天也令服事他的人受些苦難而警醒其心，使人知道在世界之上沒有安樂之福。他們要等到來生，那時他們的靈魂可享天堂真正的福樂。你要有忍耐的心向善，相信我們的救主恩惠，並盼望那福樂，這樣你的心可得平安。」

梁進德這時已經有了一個妹妹，名叫亞沾，生於一八二九年。在剛才說到的盂蘭節兩星期後，梁發因另一個孩子隨時要出生了，所以就從廣州回家去。之前他是在傳福音的責任感驅使下，以致在妻子懷孕的重要時刻離開家庭，就是剛才提過的

廣州之旅。臨行前他也拿出了創世記第三章來給她妻子看，依他的看法來看，母親生產的痛苦跟人犯罪的關係。同時他也向妻子保證說，藉著救主贖罪的功勞，她的罪已得赦免，她的靈魂也安全。然後他勸她要不住祈禱，上帝就會憐憫她，賜她平安。他也答應她會不住想念她，並會盡快回來。他這位勇敢的妻子說：「你去做上帝的工作要緊，不用替我擔心。」梁發這次到廣州去，是為了讓一位林先生作出決定，他是個好奇愛發問的人。

梁發回來時進到家中看到妻子的臉時就知道這時候該與她一起分擔痛苦了。當他得知妻子在劇痛之中，就爬上樓梯到讀書的小閣樓，跪下求上帝幫助她，又連忙安慰她。在那幾天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家庭充滿著憂愁及焦慮，她走到死亡的幽谷裡，而後又掙扎回到生命和盼望中，這對於這位丈夫實在是嚴厲的考驗。有一天，他獨個兒在思考人類的煩惱憂愁，以及他妻子所經過的苦難，他記得他的積蓄都花光了，他的衣服也在當舖裡。由於妻子病重，他得不時的照顧她，然而又沒有錢請人幫忙。他的結論是：為福音而死比忍受長期的痛苦還來得容易。

一個月後，梁發在早上禮拜及早餐後對妻子說：「明天我要去廣州城了，你得保重自己，不要掛心。雖然你見不到我，但我一定會早晚祈求上帝看顧你的。」第二年，那難產的孩子就回天家去了。

當時在中國傳播基督教是一種罪行，可以判以死刑，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個人談道。有很多證據證明，梁發忠心地抓緊這樣的機會，可是他天性寡言，缺乏社交技巧，這也帶來了一些困難。在一個世紀前，梁發便發現這章開頭引言的真諦。

要看梁發如何做個人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從他的日記中來看他如何去引領林先生到救主前。林先生在廣州有一間旅店，屈昂和梁發這兩位佈道者從高州回到省城去就住在那兒。第二天，林先生突然進到梁發的房中，看見梁發在房中祈禱，他覺得奇怪便問道：「閣下如此跪在地上，是拜怎樣的一位神啊？」梁發答道：「我們叩拜的神係原始造化天地人萬物的王，管理天地萬國人物，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活神，故凡有人誠心拜求之者，神必聽准之。」林先生對於這解釋作了簡明的評語說：「如此甚是方便。」

第二天，梁發拿了兩本書給林先生說：「兄看此書，若有不明其意，不妨下問於我，余必盡心講解之。」林先生感謝他，後來他到梁發的房中來問他：「閣下所說真的經是從何方得來的？」梁發答道：「此真經之書本來存在如氏亞（即猶太）國內。從前此國之人不與別國人交接，後來此國之人不守神天（即上帝）誠律，乃跟隨別國之人去拜各種偶像，又做許多姦淫邪惡的事。然神天亦用許多先知哲人教

他們悔改其惡，但他們不獨不肯聽教，反而將那些教他們的人或捕害或殺死。故此神天令別國起大兵攻打此城，敗滅全國的人。是以有心敬信真經守道之人先得神天默祐，令伊把真經聖書帶了逃走外國宣教勸人，故至今各國得知真經道理者皆由此而來。我得知此真經聖書而略知真經之奧義者，因我前幾年在外國貿易，偶然遇見一位善人，傳授此經書於我，叫我將經書意義編為小書，分送勸人，免致世上之人皆被魔鬼迷惑了心，不知本來之要道，徒然自害寶貴之靈魂。」林先生說：「原來真經聖書乃從外國而來，而我們中國的人都係盲目的遵從，不肯辨別真假。今得閣下來舍館居住，實係天使你來救我們被迷惑之人。」梁發答道：「亦要覺自己誠心肯信真經道理，才能得出迷惑之路，若半信半疑，反受害更深，罪孽更重。」林先生：「聖經聖理，我無有不信，但求尊駕逐本講明聖經之義，我才能傾心信服。」梁發答道：「但凡信奉真經之人都係先信後明，如今你要先明後信，誠恐不是真心奉道之人，必要後來越聽越疑，更沒有敬信之心矣。」林先生說：「我之心已定，只求閣下指教而已。」說到這裡，剛巧有人叫他出去。

兩天之後，梁發正在房中讀書，林先生走了進來問：「那《兩友相論》之書所講信耶穌之意何解？」梁發答：「耶穌乃係神天上帝之聖子。信者，信耶穌受難受死係代贖世人之罪，又信耶穌有神之全能，可救人之靈魂，於肉身死後，乃得永

福，又信耶穌能以聖風感化人之心而變為善，此是信耶穌之意。」林先生聽後就走

了。

一天，梁發一個人在讀書，林先生又來問耶穌是個怎樣的人。梁發答道：「耶穌二字在真經原文乃救世之意，故論其係人之性，則受難受死，而代贖世人之罪，論其有神之性，則死後埋葬地穴，三日三夜又能復生，然後升天；故能救凡信從之者之靈魂出地獄之痛苦也。」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林先生又到梁發房中去，萬分歡喜的對梁發說：「我看了《真道尋源》，又聽閣下所講的道理，我心甚樂。如今求閣下把救世主如何受苦難而死及贖人之死及如何救人之靈魂，講給我聽。」梁發說：「論救世主受難受死，代世人贖罪的奧妙道理，講一年亦講不完，如今大概講講與你聽。蓋救世主本身無絲毫罪惡，何故反受苦而死，這是神天愛憐世上之人，把世上之人應受罰之刑令救世主替代而受之，以使凡人知罪悔改、敬信救主耶穌者，可因救世主受死之功而救其出刑罰之中而贖其罪。這是贖罪大概之意。又救世主救人之靈魂者，先以聖風（即聖靈）感人之惡心而變為善義之性，又暗助人勝敵各般邪惡之惑，引導人恆守誠律，使其不致落地獄受永苦，這是救靈魂之大概之意。故曰敬信救世主者必得福，不肯信之者定受永禍也。」林先生說：「如今我更明白真經之意，今日有事，

改日再來領教。」

梁發正在房中祈禱，求上帝降下聖靈改變所有聽過道的人的心，林先生又有空來坐。梁發對他說：「凡愛凡愛學神天真經道理的人要有兩層工夫。先要自己留心思想聽過的道理，又要思想肉體與靈魂之事，比較禍福長短。又最要學獨自拜神天，求神天賜聖靈感化你的心，令你知罪，知靈魂之貴重，知在世上之危機，知死後永福之樂，知死後永禍之苦，知救世主能代你贖罪，知救世主能拔你出永禍之苦，而引你出永福之路。如此思想，則可獲神天聖風之恩，而感化你之心也。」林先生說：「我現在之心甚亂，因為未見閣下之先，我想入佛教，去了幾次寺門，那些和尚都喜歡我，但查知我父母係有些錢財之人，要得我父兄主意，因此那些和尚就不肯給我剃髮。」梁發說：「幸而你未曾入佛教，若是入了佛教，那末，正是入了地獄之門了。」林先生說：「是何緣故？」梁發答道：「佛家和尚以多般詭計哄騙人們，開口便說：『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請問佛家和尚，以何功德而能升天？不但現在的和尚不能升天，即佛亦是一個大罪惡之人。且不講佛的別種罪惡，就是不肯敬認真神上帝這種大逆不道已應受永罰了。況且佛係周朝之時所生，是個邊方小國之人，且不論佛生時所作功德，即把佛教現在的經書查考，亦未見佛有何功德，有何裨益於人類，獨說入了佛門，必要參禪打坐，看經念佛，且問參禪打坐

者，有益於佛，還是有益於人？看經念佛者，有益於人，抑或有益於佛？況且誰無罪過，但入了佛門，手藝不做，終日念經打坐，毫無裨益於人，就能消譴解罪，又能有功德而升天、享長安極樂之世界乎？又說看佛念經，可往西方天竺（即印度）佛國，享極樂之世界，如今天竺之國，不用看經念佛，有錢搭船，亦可去得。所以佛家的詭計，樣樣經典，都是哄騙人的錢，自己乃得自在安樂而食。如此之人滿身罪惡尚不容誅，而況可望得升天乎？」林先生說：「我前時不知，只知入了佛教就是善門，殊不知依閣下所言，正是大惡。但那些和尚也講出佛門許多好處。」梁發說：「他自然也要講些好處，才能迷惑人之心而施捨銀錢送他受用，又好迷惑人人入佛教做和尚，遂其奸歹之心。即我從前未得神天感化我心之先，不知真經道理之時，我亦想做佛教徒。後來獲得神天之恩，感化了心，知真經奧妙之意，遂敬信遵從之。漸學者，漸識其意，迨至今恆心誦讀，則心中明白，又如同神天所應許的話說，真理可以握之於手掌中。才知佛教之害，真經聖教之益。我已將真經奧義略說與你聽，信與不信皆在於你。但你無論如何不可入佛家之教，你若從了佛教，則受害無窮了。」林先生說：「我如今知佛教之害，信真經之益，但我有一件事，未敢領洗禮，待我慢慢的講與你聽。」說完便告辭了。

不久梁發需要回家，林先生對他的教導感到很快樂，不肯收他房錢，只有約定

了梁發下次去省城時一定要住他的店，才肯收下。林先生對梁發說：「閣下所講的道理甚悅我心，更兼閣下言行舉動令人欽服。」

如果我們把他們下一次的對話放進來的話，這章要長一倍了。梁發立刻開始他有建設性的教導，特別選用了雅各書。每天不論是早是晚，他的心和聖經總為朋友而敞開，但林先生還沒有做決定。

幾個星期之後，梁發又恢復做教導的工作。這一次林先生終於吐露出他困難的真相了，有一天他說：「閣下所講的道理，句句都係真實，我無有不信。但我總未敢領受洗禮，因我父親現在做的生意係賣元寶紙料，我若領洗奉信耶穌，必不能做此生意。」他只想當個秘密的門徒，除非他父親同意他受洗，否則他是不能表明自己的信仰的。他這樣逃避正好與主所說的配合了：「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梁發指出如果林先生以不做父親的生意視為不孝作藉口，來逃避對神對人的責任，那實在是罪。梁發讀耶穌所說的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希望林先生能作出決定，他說：「此數節書之意，當時救世主教其眾門徒弟子曰，人們要信從真道，須要克制自己的私意，世俗的陋規一概拒絕，又要常常預備受苦受難、受捕害、受死，如此方能從其學道。」

無論在得時不得時，梁發這位佈道者，都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

人、警誡人、勸勉人，而這位旅店的主人終於在第二年成為了基督徒，並經梁發而受洗了。

第九章 雙重打擊

我們在英國的朋友，好像已經放棄對中國宣教了。當我的腦海在追索這事時，我就因回憶而想不下去，我似乎想不出甚麼新方法來延續中國的宣教工作——就是英國的宣教工作，一旦我因任何事故而離開……聖經是一大寶藏啊，翻開聖經，看上帝跟祂的子民相交，真使我的靈魂甦醒。

——馬禮遜，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日

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四年，是梁發在廣州城佈道最有果效的日子。他不僅帶領了旅店主人林先生加入教會團契，更令其中的一位住客，名叫李新的泥水匠加入了教會。李新非常認真，後來他被聘擔任助理宣教師。一八三一年，梁發又另外為四個人施洗，其中三人是一個父親及他的兩個兒子，都是讀書人。至於當中有多少信主的人仍舊忠心，我們無從稽考。然而要忍耐到底的代價是超過一些人所願意付的。合信醫生在梁發逝世時寫道：「他使很少很少人信主，他也看到很多多年前經他施洗的人，又墮進偶像崇拜及罪惡裡。」但是他們的信仰對梁發來說卻有很大的鼓勵，他快樂地寫道：「此地差不多有十人一心一意繼續事主，且學習實行福

音中之聖道。每禮拜日我儕聚集一處，共讚救主救贖的大恩。」

除了傳福音有成效外，還有一件事使這位孤單的傳道人非常快樂，就是裨治文牧師讓他的兒子梁進德到他的家中去讀書。裨治文教他正規的英文，所以梁進德在十二歲那年已經能讀中文和英文聖經了。他也學習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以裝備他作更好的聖經翻譯。這位父親為兒子得到厚待而高興，他常常祈禱自己的孩子能夠成為傳福音的牧師。

那時梁發的父親梁冲能改變了他對福音的態度，這對梁發而言也是個鼓舞。他的父親承認聖經上所說的上帝是真神，所以願意參加家庭禮拜。可是他仍繼續崇拜他同胞的神祇，聲言他不敢以為自己比皇上和他的大臣們更聰明，因為他們也是崇拜這些神祇的。

馬禮遜有一次談到梁進德病重，他的父母對他的生存都沒有指望了。梁發寫下好些他所知道的醫生名字，禱告上帝去引導他向誰求醫。他隨意選出一張有盧醫生的名字的紙條。在盧醫生的診治下，那孩子不久便恢復健康。爺爺梁冲能看到這件事，就信上帝是真實的，並跪下敬拜祂。馬禮遜從梁發的信中接到這消息，便在日記上寫：「我假設梁發是照使徒行傳一章廿四節的記載去作的，那時門徒禱告，求上帝告知誰會被揀選。我完全不知道該不該去譴責這樣的事，因我不敢去限制這位

以色列的聖者。」但是梁發的老父從來沒有做過最後及完全的決定。他就好像古時的撒瑪利亞人，「又懼怕耶和華，又事奉他們的偶像。」

教會的增長及各方面都使梁發得到鼓舞，並且增加了熱忱及勇氣。衛三畏 (S. Wells Williams) 在一八三二年第一次到廣州時，就與梁發見面。他寫著在一年之內，梁發印了超過七萬份小冊子和聖經日課。他說：「他現在盡快印書，而且已經派送了數千本之多。不久之前，廣州舉行考試，超過二萬五千個考生從各縣到廣州來。梁發雇用了幾個苦力把箱子抬到貢院大堂裡，他在那裡把生命之道傳給這些聰明的青年，速度之快，就跟他處理書籍一樣，如是者三日。他是一個儀容可敬的老人，年約五十歲。他的面容流露出仁慈的心，令人一見他便心生愛敬了。」約在同一天，馬禮遜寫著：「阿發在信內對我說，他已立志忍受任何境遇。他已預備忍受迫害，但直到寫這封信為止，並未有事故發生。趁著還有今日，阿發以激動的心去工作。今年廣東省泛濫成災，加上狂風暴雨，災情非常嚴重。溺死或被倒塌樓房壓死的、或者因流離失所、缺乏糧食而餓死的有數千人之多。阿發跟其他人的房子也被水沖去了。整個中國都籠罩著愁雲慘霧；北方有旱災糧荒；南方有大雨水災；在後宮裡皇后也逝世了。」馬禮遜時刻擔心他那勇敢的同工的安全。對於梁發在試場之外犯險，他說：「這勇敢的程度有如分發小冊子給牛津或劍橋的學者。」他必

需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好叫英國的讀者明白。但是在英國的大學發小冊子，卻不用冒著被監禁在倫敦塔或被斬首的危險。這樣的可能性會令許多中國人膽怯和意志消沉，因中國人天生膽小，可是這倒激起梁發更熱心參與行動。

我們提到這本書（按：《聖經日課初學使用》）的數量時，就需要談到它的性質及來源。這本書是用一本為英國學校而印的聖經課本，內有仔細篩選的聖經經節，但是沒有附註或評論。梁發這本書跟這本英文的聖經課本完全一樣，只是有關經節是直接引用中文聖經的翻譯。這本書是在梁發的監督下，在廣州印行的。第一版的成本由居住在廣州的外國人支付，其後各版的費用則由英國聖書公會繳付。每本書分成一套三卷。這些書不單分發給學生，梁發也把這些書連同馬禮遜所印的小雜誌帶到廣州附近的郊區，他也用了自己所寫的及其他小冊子。如果旅途較遠，開支就由裨治文來付。這樣，英美的基督徒一同供給梁發戰鬥的力量，但只有梁發獨力冒險，讓這樣的合作得到成果。

一八三四年之前，馬禮遜的身體開始有衰弱的徵象。他的妻子和家人都在一八三三年年底返國，只有他最大仍在世的兒子馬儒翰留在廣州，這時他只有十六歲，就被英國商人聘為中文翻譯員。馬禮遜在極度的孤寂和與日俱增的衰殘之中，繼續進行他的工作。他在一八三四年二月五日的日記上寫以下的話：「當我看見我的孩

子所慣坐的椅子時，我十分悲痛。唉，我所愛的兒女啊！我何時能再聽到你們的祈禱，和在你們的臉上親吻啊？我疼痛的頭啊！我疼痛的頭啊！上帝啊，憐憫我啊！」在逝世前的四十天，他還在預備最後的講道，講道的題目叫做「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英國商務監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的夫人這時剛好在澳門，準備請馬禮遜到澳門的東印公司禮拜堂中宣講這篇道，當時馬禮遜被委任為商務監督的翻譯員。可是有些心胸狹窄、有教派意識的人反對，認為與其請一個未經聖公會正式按立為牧師的人來主理禮拜，倒不如廢掉禮拜好了。儘管這消息傳到他那裡，但他在世的最後一個星期天，在廣州家中與一些中國信徒相聚，那天的講題也許就是同一篇道。這次聚會，大概是他一生在中國所見，人數最多的聚會。他不理會身體上的軟弱和痛苦，心裡還是為了能服事這些人而快樂。在這聚會中，有一位代書李先生告訴他說，他已經立志信耶穌，馬禮遜聽了，心中非常快樂。這位李先生，就是在一八二九年程耐里（George Chinnery）所畫的畫，馬禮遜及兩個華人助手中，坐下來的那個。他的好朋友和多年來的同事梁發，那時很可能也在座。他們一起唱馬禮遜新近譯好的聖詩「救主耶穌愛我魂」（Jesus, Lover of My Soul）。我們可以想像這位先驅在散會後，獨自唱那首詩——「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數天之後，在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晚上十時，馬禮

遜溘然長逝了，他的禱告蒙應允了。

這剛過去不幸的事顯出生命之短促，激發了梁發參與更加危險的事情。不到三個星期，他又帶著書籍來到試場門口了。這時廣州剛好舉行三年一次的鄉試，全省各縣希望中舉的考生都在那兒聚集。試場內有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個小房間，考生就鎖在裡面寫文章，如今那兒已經成為中山大學的所在地了。

當時有些情況使梁發這種無畏的行為變得非常危險。這時律勞卑奉派來到廣州當商務監督，處理中英兩國的商业和政治關係，尋求一個較合宜的基礎，這事引起了外國人的注意，尤其是英國人。律勞卑堅持要和總督直接商議，但是中國政府只准他通過十三行的華商作交流，中英間的商业關係就從八月十六日起中斷。那些曾幫助過英國人辦事的中國人——特別是與已故的外交使團翻譯員馬禮遜有關的那幾個中國人——自然極受嫌疑。梁發自知處境危險，可是他決意為主冒險。他好像那立在犁耙和祭壇之間的牛，預備去工作或犧牲。我們這裡有他親筆所寫，關於這件事的記述，但全部引用的話恐怕太長了。

考試的頭兩天，梁發和三個助手派了數以千計的書給考生，並無遇到任何麻煩。到了第三天，其中一個助手給巡卒抓了，還拿走了一套書到知縣那兒。知縣看完那本書之後，便叫那些巡卒以後不必干涉這些閒事，因此那位助手就繼續去工

作。可是第四天，又有巡卒前來，將梁發抓去，並沒收了十套書，但他在往衙門的途中逃脫回家。十三年前他在同一個地方的經驗，讓他知道 he 會受到麻煩的遭遇。第二天，他聽聞這事已呈報廣州知府；他因懼怕被捕，便將其餘的書籍放入箱內運往其他地方。第二天，他離開省城回鄉了。數天後，廣州知府派人到他省城的寓所，拘捕了他的兩個助手。其中一個說他並不知情，知府命人打他的嘴巴，直到他不能說話為止。另一個在審訊時把一切事情供出。知府就繼續緝捕那些在省城和臨近村莊曾參與印刷及派書的人，卻找不著帶頭的人。梁發聽見所發生的事，便立刻帶他的妻女逃到江門。第二天，知府派了一百人，分乘兩隻船到梁發住的三洲逮捕他。到鄉後，不見他們，便把他三個親屬帶走，又將他家中雜物搶掠一空，更用封條將他的家門封住。他們把梁發親屬所養的家畜全都取去宰食，這就是官兵幹的好事。他們搜索鄰近的墟市及鄉村，一無所獲，後來便回到廣州城。梁發接到了消息，就立刻帶著妻女到更少人去的赤坎墟市。最後他所帶的錢花光了，就叫妻子到省城，向裨治文求助。她到達時才知道裨治文已去了澳門。梁發帶著家人再返回江門，自己就冒險往澳門見裨治文。他寫著：「感謝上帝之仁慈，我果安抵澳門。當我見裨治文牧師之時，我之心悲痛異常，竟忍不住大哭起來。」裨治文告訴梁發，馬儒翰已經查明只要付巡撫八百元，那些被捕的人就可以獲得釋放，他與他的家庭

也可以免罪。梁發拿了錢回去給他的妻子，並告訴她好消息後，便住在裨治文在澳門的家。馬儒翰寫道，知府答應用八百元可以放了其他人，但一定要逮捕和懲罰梁發。馬儒翰付了這筆巨款後，所有在獄中的人都獲得自由了。裨治文帶梁發和他的兒子梁進德到一隻往伶仃島的快船上，請英國商船船主巴利（Parry）好好照顧他們。

梁發在等待開船時，把一切的情形寫了下來，他結束時寫道：「這種情形使我想起凡是傳揚福音的人，一定要忍受迫害。於是我默想羅馬書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九節、雅各書五章十一節和彼得前書五章十節的意義。我雖不能像救主耶穌、保羅及約伯般堅忍不拔，但我仍願效法古代的聖徒，保持我心境安寧。此外，我雖曾忍受許多迫害，但我心仍覺安樂和快樂，我現在唯一的恐懼是怕中國政府加害我的妻女而已。所以我每早每晚，都求上帝垂憐保護，及拯救她們。我亦求所有牧者、先生與所有熱心愛主的人為她們祈禱。」

接著，裨治文和馬儒翰寫了一封聯署信到倫敦會解釋。他們指出梁發和他助手的罪行並非印刷及分發基督教書籍，而是分發外國書籍。這是因為律勞卑在十三行附近的街道上，貼上了用中文寫的告示，解釋英人的立場。中國官方發現梁發及派書的助手與外人有關係，又發現梁發本人與外國人有密切的接觸，就懷疑他與策劃

這事有關。他當然是無辜的，但梁發幾乎不可能去證明自己清白，因他已有案底，而且他是由一間英國差會長期聘用的，而這差會的負責人是馬禮遜，是律勞卑的官方翻譯員。後來梁發和兒子坐船從伶仃島到了新加坡。

第十章 麥子和稗子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

——傳道書十一章六節

我們或許可以問這位有勇有謀的傳道人，向士子傳福音到底是否值得，因為梁發本身不是學者，他寫的文章對喜歡吹毛求疵的士人來說，可真毫無文采可言。其中一個答案可見於太平天國運動的歷史，在這個運動中，梁發的一套小冊子幾乎令中國天翻地覆。

一八三四年八月，梁發在廣州試場外派發他所寫的小冊子，受到巡卒阻撓，這事發生之前，他曾經把一份小冊子派給一個青年考生，這位考生名叫洪秀全。洪秀全考試落榜，帶了那份基督教書籍，回到距離廣州城廿五英里的花縣的家去。他那時沒有注意梁發所派的小冊子，只是把它放在書架上，而且擱下了九年。一八三七年，他再度參加考試，又名落孫山。他在第二次考試完畢後回家，不久就生起病來，他在病中看見許多異象。這些異象延續了四十天之久，給他深刻的印象。他在

異象中，看見一個令人起敬的老人給他一把斬魔劍；又看見一個自稱「天兄」的中國男子教他如何使用那劍。

幾年後（一八四三年），他坐在書房中看書，他妻子的兄長來拜訪他，並且在書架上發現梁發的小冊子就問洪秀全，這才引起他對這本小冊子的注意。當下他從書架上把那小冊子拿出來讀。他讀了這小冊子以後，就相信他已找到解釋他所見異象的鑰匙了。他知道那令人起敬的老人就是小冊子裡所說的上帝，而那所謂「天兄」的人就是耶穌基督。他馬上接受他所見的異象是上帝的啟示，那些小冊子是來幫他解釋的。洪秀全和他那做教師的朋友馮雲山，興起打倒拜偶像的運動。他們雖有熱忱，可是他們缺乏基督教知識，沒有有建設性的改革計畫，以致他們向迷信的挑戰變得毫無果效。最後洪秀全決定加入基督徒團體，就是這些書籍的來源。他第三次考試落榜以後，去拜訪美國浸信會宣教士羅孝全（Issachar Roberts）牧師，羅氏住在距離十三行頗近的靖海門海邊，是個非常出眾的人。施惠廉（William Spear）牧師是美國長老會的宣教士，他說在洪秀全來的那一年，羅孝全在裨治文家中參加為外國社區而設的晚間主日崇拜。唱詩時有個僕人來到他跟前說，有五、六十個強盜在搶掠他的屋子。施惠廉看著羅孝全，他卻面無表情。等他第二天早上回到家去，發現甚麼都沒有了，只剩下磚牆而已，連窗、門、地上的瓦片都給拿

掉。到底這是發生在洪秀全來之前還是之後，我們不知道，但是在這間屋子裡，這位年輕的改革者曾經從羅孝全的口中，得到不少詳細的基督教信仰的教導。他在這位宣教士家中住了幾星期，就請求受洗。有人說，羅孝全的一個華人助手因恐怕洪秀全會取代自己的工作，計畫要除去他。他悄悄地告訴洪秀全說，要先付五塊錢才能受洗。無知的洪秀全就帶著錢到了宣教士那裡去，羅孝全像彼得見到行邪術的西門般非常憤怒，也許還用了相同的話來罵他。羅孝全說因為洪秀全提到受洗後會受雇，所以他決定延遲施洗了。他對於這件事頗為後悔，但他對後來的太平天國運動有很大的期望。這年青的改革者並無懷恨在心，幾年後他還邀請羅孝全到南京擔任外交部長！羅孝全在一八五四年聖誕節時寫：「我非常嚴肅地相信這個運動是為了上帝的榮耀和中國的榮耀與利益而出現，這樣，誰不會為這偉大的工作而高興呢？」然而他在南京的太平天國總部住了十五個月後，他的幻想完全破滅，而且極度失望。

洪秀全因申請受洗被拒，就回去創立他自己的團體，叫「拜上帝會」，集合了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對崇拜偶像的人在他的旗下。在廣西省附近，洪秀全認為去領導人民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他便當上了領袖。這革命越來越大，更浩浩盪盪的帶著武器直逼北京。

當這個中國基督徒愛國者，以及他戰事報捷的消息傳到英美那兒，引起了兩國對中國能早日歸主的興奮盼望。當時英國聖經公會適逢五十周年紀念，就籌募款項，預備及分發一百萬本中文聖經。太平天國運動的初期，梁發的小書及羅孝全的教導有非常明顯的影響力。洪秀全所組織的造反團體自行印刷和分發另一個版本的新約聖經。麥都思 (Walter H. Medhurst) 曾就他們其中一本宗教書籍寫道：「這本書可說是太平天國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議論正確，禱文也很好，而寫到關於人類的墮落、耶穌用血救贖罪人，及聖靈感動人心等教義的敘述，都能引導一切有志尋求真道的人朝向天國。」十誡及一部分的登山寶訓曾用大字寫著，貼在南京的城門上。這位叛變領袖的從弟當上了參謀官，名叫洪仁玕，即「干王」，曾在香港理雅各的帶領下，當過熱心的傳道人。

可惜後來洪秀全因戰事上的勝利而帶來他性格上的災難。他本來精神已經不是太好，過於誇大自己的使命，宣稱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可說是褻瀆之極，而各方面又太奢華。在中國戈登 (Charles G. Gordon) 將軍的領導下，政府軍鎮壓了這次運動後，衛三畏說：「從拆毀的城邑，蹂躪的村落，一堆堆的垃圾，就知道從廣州到天津的二千英里路之間，沒有一處不遭災劫。他們的出現有如欲罷不能的鞭子……除了數以百萬計的銀子流失及黎民的疾病飢寒外，有人計算從一八五一年起到一八

六五年為止的十幾年之間，死於太平天國之亂的人有數百萬之多。」這是由一位有資格去批評的人說的，讓我們曉得這運動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不能忘記起初那屬靈與愛國的熱忱，曾帶來成功的希望。滿清政府的殘酷、腐敗、迷信拜偶像的影響，才是中國的敵人，應當被除掉。洪秀全他們如果忠於梁發的小冊子所寫的異象，就能達到他們的目標，並將中國開放給基督教的文化。

記載這個革命領袖的思想最詳細和最精確的書籍，是在中國的英國外交官密迪樂 (Thomas T. Meadows) 所作的《中國人及其叛亂》(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出版於一八五六年。「洪秀全和他的朋友馮雲山決意到外省去傳道，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是因他受了梁發書中所寫的『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這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的事蹟所影響。可是如果我們去檢查梁發的著作，我們看到梁發只討論最大的關心課題，最重要的是對他及同胞有深遠意義的事，例如世界的創造、登山寶訓中偉大的道德規律、保羅的傳道事蹟及著作等。」

這是一個公正的權威人士對聖經教導的普遍性寶貴的見證，以及他對梁發選材的稱讚。密迪樂也誠心讚揚梁發的熱忱及自我犧牲的精神。但是他也批評梁發的文本體，因為梁發太依賴聖經的中文翻譯本及宣教士的小冊子。這樣的說法不太公平，

因為梁發是自由的引用聖經，他自然只能用當時僅有的翻譯本，他也注意到聖經翻譯需要重新修訂。他曾寫道：「現在聖經譯文所採用之文體與本土方言相差太遠，譯者有時用字太多，有時用倒裝之句法及不通用之詞語，以致意義晦暗不明。聖經教訓之本身已屬深奧神祕，如再加上文字之晦澀，則人自更難明瞭其意義矣。我為中國人，我知何種文體最適合於中國人之心境。吾人須先努力將譯文修正，使其切近中國方言，然後將其印行。雖然讀者相信聖經或反對聖經係另一個問題，初與文體之晦明無關；但吾人總應竭吾人之力使聖經之文字易於通曉耳。」

梁發所留下的文章樣本，反映出一種與現在白話相類的淺白形式，不是古典的那種艱深複雜的風格。如果這位基督教文字先驅學養不足，得不到寫文章的人讚許，他至少能把他的意思弄得有條理給讀者看。如果他能用個人的解釋來跟進自己的文章，效果就會更加好了。所以他寫的東西好像種子撒在阡陌上。文學，特別是宗教書，不管有多清楚，總會帶給人一些困難的。即使是聰明的讀者，也需要有人來解釋才能把所讀的放到心裡去。無論如何，他們需要在一些基督徒的品格中看到道成肉身。就如史格特 (Walker Scott) 讓他的女英雄主角丁絲 (Jean Deans) 說：「書寫是做不到的，一封信也不能好像人的聲音，向著人的心那樣讓人看到、祈求和請求。」我們非常希望洪秀全能了解梁發這個人和他的小冊子。

第十一章 愛國心是不夠的

通常愛國心是一件外套，內裡隱藏著自私自利、或缺乏理性及事實。英國的大眾許多才銘記著卡維爾護士 (Nurse Cavell) 紀念碑上的話：「愛國心是不夠的。」卡維爾護士是對的；愛國心是不夠的。她站在兩個世界的邊緣上清楚地看到，只有在人與國家之間完全實現基督教的博愛，這個世界才会有盼望。

——麥克南 (Kenneth MacLennan)

一八三五年七月，梁發與兒子往海峽殖民地後六個月，倫敦會的麥都思來到廣州，查詢分散在那兒信徒的情況。當時馬禮遜逝世了，梁發正流亡海外，政府又處處注意他們的行動，所以這個小教會便落在悲慘的困境裡。他最先遇見的一個一年前由梁發施洗的秀才，名叫劉澤泉（譯音），他是麥都思唯一可以接觸到的人。他替美國宣教士潤色多種小冊子。他很懂得鑒賞文章，也閱讀基督教文學，加上與一位認真的基督徒接觸，當中所發生的事是相當有趣的。梁發見過他，很高興能有勝任的人來幫助自己，使自己的書更容易被人接受。當他與這位佈道者爭論時，他

發現梁發能回答他的反對意見。由於他有口吃，所以言談間常要用到紙筆協助。他數月來因著梁發的教導和友誼，又看了他所修改的書，他忽然如夢初醒，熱切地要求受洗。麥都思來時，劉澤泉到馬儒翰家中和他見面，他告訴麥都思這群信徒的情況。可能因劉澤泉有學者的地位及秀才的學位，才免受當時的迫害。

梁發施洗的第一批信徒中，有一個造筆匠，名叫周阿三，他為了自保而帶著官兵去到梁發的村屋中。他使梁發完全失望，因他的信仰是假的，只是為了要圖利，所以當他一為道受苦就馬上跌倒了。梁發有兩個做同行的親戚，在受洗後做過印書和派書的助手，後來從獄中釋放後就不知所蹤了。另外一個做印刷工人的信徒被釋放後逃到新加坡去，他受雇於美國的宣教士，成為了能幹又忠心的工人。

那時梁發的兒子梁進德回到了廣州，仍在裨治文牧師家中學習。麥都思在他家中見到梁進德，曾有幾句話論及他：「他的英文程度尚可，同時也繼續學習中文。他是一個沉靜、謹慎和服從的青年。如果他想讓別人對他有嚴肅的印象，而且賦有宣教士精神，他就會對真道有極大的貢獻，也能幫助修訂中文聖經譯本。因此裨牧師教他希伯來文，還繼續教他完整的古典文學。進德現在的生活極不舒服，終日困守室內，不能出門一步，因為如果他走到街上去，人家就知道他與梁發有父子關係，而且是個基督徒，立刻要把他捉拿去懲辦。」

梁發的妻子和女兒，暫時在屈昂的妻子在黃埔附近的家中避難，她們顯然得到屈昂妻子的同情。梁發希望妻子能和他一起到新加坡，但他妻子害怕海上的旅程。梁發所知道的，就是麥都思認為這些逼迫加上丈夫的教導，會啟發她的智慧，並在她的心裡加深了對真道的愛慕。

那年下半年，麥都思不經意地在廣州挑起更多的麻煩。他跟史第芬 (Edwin Stevens) 航行到四省各處，大量分發書籍。史第芬曾跟雅俾理當過海員牧師。當消息傳到北京時，政府發出告示，譴責他的行為，並派一名欽差到廣州去逮捕一切為外國人出版、寫文章及印書的中國人。裨治文被人發現他與印刷書籍的事有關，那欽差要那位為裨牧師作保四年的華商負責。那個商人辯護說這些書籍是從馬六甲運來的，才得保清白。梁進德在裨治文家裡處境非常危險，裨治文就秘密地把梁進德送到新加坡去。至於屈昂仍留在省城，到目前為止他還安然無恙。但他因為不小心冒犯了一位朋友而被告發，說他與宣教士有連繫，官府也發了緝捕令。幸虧有人即時警告他才得以逃脫。他也逃到了伶仃島，從那裡坐一艘英國的船到馬六甲去，到了那裡，他就和梁發一同為倫敦會工作。屈昂的兒子不是基督徒，他被補後被迫供出與外國人有聯系的中國人名單，數月後才被釋放。他這一次被捕，倒使他成了名，原來他的名字被列在上諭之中。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四日，伯駕醫生 (Peter

Parker) 在廣州十三行區開設了眼科醫局。由於中國政府的行動，伯駕醫生不敢分送基督教書籍，也不敢作公開或私下的講道，否則他的醫院就要被關掉，因為政府在懷疑他，並監視他的行動。

從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三九年底的四年之中，梁發不斷在馬六甲和新加坡工作，期間只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回國一次，稍作逗留。英國聖書公會在中國的第一個代理人李太郭 (George T. Lay) 經過澳門時與梁發在一起。他說：「梁發常常讀聖經，希望明白聖經，但他抱怨儘管他可以向上帝的上帝禱告，卻還是不明白上帝的道。這可能因為中國人思維的關係，而英文諺語和難懂的片語，常常成為他的絆腳石。」一八三五年，梁發與創製活版中文鉛字的戴耳 (Samuel Dyer) 牧師共事。由於梁發及屈昂都在馬六甲，使到宣教工作更加活躍。一八三七年被報告為倫敦會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年。那年四月受洗加入教會的合計有二十人。五月又有十個人受洗，其中一位是六十五歲、白鬚皚皚、儀容可敬的塾師。

梁發幫助美國公理會的崔理時 (Ira Tracey) 牧師翻譯他向中國農夫的演講，該演講是由新加坡栽種會主辦的。不但如此，他還寫了《鴉片速改文》這本小冊子，我們對這些先驅在認識他們的任務時心胸之寬闊，留下深刻的印象。社會服務在很實際的中國人來看，是基督教的自然表現。梁發在中國時為福音而被禁止居留和受

逼迫，跟現在為基督教工作的自由作比較，他一定感到快樂多了。

但沒有甚麼事會促使梁發永遠在國外工作的。他已聽到向同胞傳福音的呼召，向海外華僑傳福音有豐富的收穫不能完全滿足他的心。一八三九年底，梁發回到廣州。自從馬禮遜逝世後的五年之間，沒有一個英國宣教士住在廣州，幸而有一些美國宣教士能在不安定的政局中艱難地工作下去，而且仍能結出果子來。英國政府並沒有再採取行動，強迫中國接受律勞卑的要求。中國人仍然認為英國是野蠻商人部落，需要向中國皇帝進貢。自從英國商務監督因病離開廣州，並在澳門逝世以後，中英間的商業關係恢復到當初英國惡劣及受到羞辱的情況。這情形對英國來說，是難以容忍的，所以兩國會否開戰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最後，販賣鴉片成了開戰的原因。道光接到了許多奏章，要求禁止不同國籍的外國商船公開私運這種毒物進口，並有中國官吏縱容保護，他決定採取嚴厲行動。他任命湖廣總督林則徐到廣州代表朝廷解決這事。林則徐於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到了廣州，八天之後，他就下令外商立刻將所有屯積在外國船上和貨倉中的鴉片一律繳交中國政府，並且命令外商具結保證以後不再輸入這種毒物。英國人沒有立即遵守這項命令，中國官兵就包圍了洋行區，不准外國人離開廣州城，又要幾百個為外國人工作的中國人離開。林則徐威嚇外國人，如果他們不讓步就會引發暴動。在這

樣的高壓下，英國人別無選擇，就在五月廿一日把價值二百萬鎊、總數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鴉片繳交欽差大臣林則徐。他把那些鴉片全部銷掉，於是激發起中英間的第一次戰爭，戰事從一八三九年九月起到一八四二年八月才結束。

今日在中國及西方有遠見的人都同意一位美國歷史學者的看法：「這第一次的戰爭只不過是遠東和西方衝突的開始罷了。東方不願在外交及商業方面給西方各國平等的待遇，而西方各國卻堅持他們有權利享受這樣的待遇。」我們及當時的英國政治家都得坦白承認，英國販賣鴉片荼毒千萬人的身心靈，是一件可恥的罪行。雖然東印度公司早在一八〇〇年，因著中國政府的禁令而停止使用它們的船隻運載鴉片，但是英屬印度是鴉片的主要來源，大量的鴉片是由英國船隻偷運來的，這是因為他們把收入利益置於公義之上。

在戰爭爆發之前，梁發回到廣州。這時的光景使他灰心氣餒，心中異常悲痛，他愛國的真誠和對基督教的熱忱，使他覺得需要做一些事來阻止戰爭爆發。他到十三行，拜訪了當時在廣州代表英國政府的馬儒翰，懇求他用他的影響力來避免戰爭。梁發的說詞是很特別的，他說他擔心一旦英國人與中國人開戰，他的同胞就會再接再納聖經了，也不會去聽英國宣教士所傳的福音。基督教的利益必須與英國政府相衡量，因此馬儒翰需要用盡各種方法去消除敵意。相信馬禮遜的兒子已經被他

父親好友的懇切請求所感動。可惜為時已晚，戰爭的爆發已不是馬儒翰或梁發的力量所能遏止的了。如果我們了解中國人天性的膽怯，我們要欽佩梁發的勇氣，因他本身過去的歷史及目前的光景，使得他的行動非常危險，他還敢去拜訪敵國政府的代表。他這樣不顧己身安全，唯一能推動他的動機，就是他為著基督的國度降臨到中國而焦急。

雖然是這樣，梁發仍能在廣州傳福音，而明顯地沒有受到政府干預，是很奇怪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當地官員正為比他更重要的事情而忙碌。另一方面，中國官員不願因逮捕梁發而惹怒美國社區的人，因美國商人和宣教士都欣賞他。我們並不要低估梁發的勇敢精神，但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或可解釋他為甚麼那時候仍獲准到十三行區去。林則徐到達廣州後要找一名英文翻譯員，他知道梁發的兒子梁進德懂得英文，就聘請了他，梁進德當時二十歲。所以這位在裨治文家裡接受了八年訓練的人，希望他能適合為基督教工作，而作了林則徐的翻譯員了。在這情況下，他的父親不可能遭到干涉，而梁發從前犯法的事都順理成章地被忘記了。我們可以看到馬禮遜和梁發兩人的兒子，在中英之間這段不幸的歷史中，引起有趣的話題。

戰爭初期，米憐的兒子美魏茶 (William C. Milne) 牧師到了澳門，準備接續他父親及馬禮遜開拓的工作，他是由合信伴著而來的。由於中英對抗的關係，也知道

梁發如要到澳門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就寫了一封信給梁發，由伯駕轉交。他接到了一封非常感人的回信，裡面寫了梁發的回憶。當時他站在馬六甲英華書院門前的石階下，目送米憐的四個孩子，他們在父母親逝世後，搭船回英國。弟弟忽然拒絕上船，並回頭向著英華書院大哭。梁發觸景生情，回到他的房間哭泣，他常常禱告祈求上帝保護、賜福他們。現在他聽到大兒子（就是一八一五年米憐夫婦及梁發首次由澳門到馬六甲的航程中，在船上所生的孿生子之一）繼承父親的牧養責任，來中國延續父親的工作，梁發的心充滿喜樂及感激。自從他從馬六甲回來後，他已給四個人施洗。在他的領導之下，已經有一個十二人的固定聚會。當梁發寫這封信歡迎他的屬靈父親的兒子時，他可能也在想著他對他自己的孩子的期望。

梁發在廣州找到固定的居所了。古勞村的鄉人因官兵在一八三四年搜捕梁發而遭囚禁、罰款和充公土地，所以當然都不想他回來，因他們不希望再冒同樣的危險了。他們要梁發賠償一切損失，這實在是很可怕的要求。但梁發承認他們的想法是正確的，所以也盡力賠償，可是到他離世的時候，他仍不能滿足他們。又因梁發一家到現在不能把欠債還清，使鄉人滿意，使基督教工作在那個地方至今仍受到限制。在他失去祖業及遭鄉人仇視的事上，他用了保羅的話來自勉：「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

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於是梁發決意遷到廣州河南的一個名叫龍尾導的村上去居住。在一八四一年廣州城被英軍轟炸時，他的住宅附近有許多砲彈落下，但沒有人受傷。

梁發發現他在伯駕的醫院有很好的機會，可以時常到那兒與病人談話。他說：「當我在街上或村中告人以拜偶像之愚蠢時，彼等常譏笑我，但當人有病而獲痊愈時，則其心甚柔軟易受感化也。」一八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伯駕在美國華盛頓參議院及眾議院的聯席會議上，引用了梁發上述的話，並說：「梁發談到這所醫院時，他可能會很有感觸，因為他在這裡醫好了自己的病，如果是本地醫生來醫治這種病的話，他很可能會死。如果我未曾完成其他善事，而只在恢復這位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這事上起了作用，我的使命也就不會枉然了。」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為甚麼我們可以說伯駕醫生「以柳葉刀打開中國」的其中一個原因。

林則徐在一八四〇年給罷免了欽差大臣一職（雖然他仍保留了湖廣總督的工作），由耆善接任。梁進德的父親和朋友勸梁進德不要接受衙門的工作，後來這個年輕人去了澳門探望合信醫生，合信對這位訪客作出了評論：「在這一段日子，在他第一次作為公眾人物的經驗中，仍顯出遵守著基督教原則。只有時間可以告訴我們到底他的翻譯、以及他對外國人的了解，對北京政府的建議有多大影響。我們傾

向想他的影響是很大的。」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外國人的意見向中國皇室提出。梁進德大部分的工作是將那在澳門出版的英文報紙譯為中文，由欽差大臣轉達北京，讓皇帝及他的顧問能加以注意。梁進德最近結婚了，當他仍在研究中文時，裨治文牧師和馬儒翰都負責支持這對夫婦的生活。梁發認為己的兒子只要再多研究十年，就能準備好去翻譯聖經了。

一八四一年九月，因著戰事停止，梁發能夠到澳門去拜訪他的宣教士朋友，使他非常高興。他每到宣教士的家都召集僕役，向他們讀經並加以解釋，又將麥都思譯的新約聖經的勘誤表交給那些宣教士。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中，他的朋友最感興趣的就是他教導他的女兒阿沾讀書，在那個時候，以這個女孩的身分能有這樣的成績是非常少有的。梁發提到當宣教士不在，以及在戰爭中的處境時，他自己是多麼孤單及工作多麼困難，他說：「我必須撒下種子，（他手指著天）天上的上帝就會降下雨露。」

第十二章 神的物與凱撒的物

在過去一百多年，曾經在歐洲發展並蹂躪了歐洲的國際與民族之間的緊張鬥爭，很不幸的說，已經自然到達遠東。中國人的愛國情感已漸漸有了新的看法。我們幾乎不能批評中國人是過分的民族主義者或過於狹窄的愛國主義者，他們要抵抗外國勢力的突襲，列強的帝國主義計畫，和強行以武力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余日章

在第一次中英戰爭後所簽訂的條約中，廣州（還有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成為開放的港口，給外國人居住和通商。珠江口的香港島也割讓了給英國。在戰爭期間，英國人就利用這個小島作為停泊船隻的一個方便的港口。雖然南京條約沒有立刻將宣教士工作的限制除去及給予宗教自由，但該條約讓那些差會有一新而安全、並且最接近中國的運作基地。說實在的，英國在佔領香港方面沒有可驕傲的地方，但她只是做了那時候其他列強如果有相同的原因及機會都會做的事。無疑歐美的教會感到那是因上帝的旨意而發生的。

這時，倫敦會將總部由馬六甲遷至香港，其他差會也照著行。當時的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跟好幾位助手到香港，其中最突出的青年名叫何進善。他的父親是一名印刷工人，曾經與梁發一齊工作過。在未進英華書院前，何進善受過完整的中國古典教育。在理雅各的教導下，他能夠很流暢的讀新舊約原文聖經，他甚至能用希伯來文寫作，他也成為最認真及口才了得的宣教師，理雅各說他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聽過有比他更好的宣教師。

有天晚上何進善在一個很擁擠的教會講約伯的故事，會眾都得站著。當他說到約伯拿起瓦片刮自己時，他就蹲下來像去撿瓦片一樣。這時理雅各站在會眾當中，他發現自己的手也放在地上，他舉目一看，會眾中也有數十人彎下了腰，模倣著宣教師的動作，大家完全被他的口才及戲劇性的力量所吸引了。工作了幾年後，他在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星期日），被按立為香港的第一間華人教會的牧師，雖然他屢次被邀請進入商界或政府工作，並可得到高於宣教師五倍的薪金，可是他仍舊留在差會工作，直到一八七〇年他逝世為止。他有一個女兒仍健在，她就是伍廷芳夫人。從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四四年的幾個月間，梁發和何進善在香港一同從事傳道工作，並建立了好些傳道中心。屈昂也跟隨著理雅各，一同參與傳教工作。但很不幸的是梁發與屈昂吵了起來，因著兩人的疏遠，加上梁發的父親病重，梁發就回廣

州去。他的父親於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日逝世了，享年八十七歲。

梁進德也在香港的新中心受雇為差會工作。他可能是在學校協助理雅各，但總的來說，他這新的經驗不是很愉快。他認為香港這殖民地是一個低賤的地方，是那些因窮困或犯罪而來這裡，而且是最低下階層的中國人的樂園。回到廣州後，他受雇於一個做外貿的廣州主要買辦潘海官，擔任英文翻譯。此後他再也沒有參與宣教工作，因此宣教士對他這個人表示懷疑並感到失望，覺得他是一個容易被物質利益引誘的人。由於他在買辦處工作，屢次被欽差大臣耆英召見。耆英詢問他關於歐洲各國的風俗、歷史和國勢，並將這學來的知識稟奏皇帝。一八四五年他寫道：「昨年臣受命往兩廣與外人議和，順便調查若輩所奉之宗教，經小心查察之後，知彼等所持以教人者確並無不善之處。臣覺有將此事稟奏皇上之必要，乞以後勿再窘迫及阻止此種宗教，以懷柔遠人。」耆英是滿洲人，他以前在滿洲和北京任職時已經和外國人有少許接觸。他是簽訂南京條約的中國全權特使之一，與外國代表們有更進一步的接觸。在廣州時他得到柏駕醫生的診治，他那時已有六七十歲，是個結實強壯而幽默的老紳士，有堅定的步履和正直的風度。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有趣的圖畫，就是一名滿洲官員與廣東青年在談話，在這種情形下讓他有機會能賞識外國朋友，特別是賞識他們的基督教信仰。

在先前引用的短文裡，耆英也提到他的私人秘書，那位秘書生病時，想從鬼神、醫生和相士而得醫治，卻非常失望。但他聽到外國人怎樣向上帝祈禱，他自己也學著，病也立即好了，以後他每逢遇到困難，發現祈禱都有幫助。這個秘書曾請耆英為他準備一篇禱文，這篇短文包括了一篇極為莊嚴而且文辭流麗的禱文，讓我們想起在中國古籍裡向天禱告的其中一篇禱文，而且確信在禱告中，能找到真正宗教的心。古代北京天壇的敬天崇拜，在靈裡跟在耶路撒冷聖殿中的相去不遠。「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有一件事使英國政府和在廣州的外國人感到莫大損失的，是一八四三年八月，馬儒翰先生在不到三十歲時就逝世了。他在這形勢緊張的數個月中責任沉重，尤其是在談判其間的那段日子，他擔任了商務總監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爵士的秘書。梁發十分悲慟，他的中國友人也同樣的感到很悲哀。他記起當他身陷麻煩的時候，馬儒翰如何援手；他也想到人生苦短，決定利用各樣機會，盡他的力量傳福音。那時他寫了一封信給倫敦會，說他有許多病，身體衰弱，工作困難，雖然他不太能自由行動，他仍召集信徒到他的家中，向來訪者傳福音，他也利用這不能活動的機會校勘佈道小冊子與書籍，並準備了一個中文聖經譯本勘誤表。

當南京條約的內容傳到外國後，各國都立刻把注意力轉移向與中國的關係上

面。英國所享有的居留及貿易權，其他列強也要分享。兩年後，中英所簽的虎門條約當中加上了「最優惠國」條款，以後該條款也規定加進所有外國政府與中國所簽的條約中。美國派遣顧盛（Caleb Cushing）來華與中國政府商訂條約，裨治文和伯駕被任為這次交涉的中文秘書。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在鄰近澳門的望廈簽訂了條約。這次中國方面的全權代表是耆英。梁進德大概也參與這事，雖然他並無正式的角色。那年五月六日，梁發曾寫信說他的兒子要去陪伴顧盛，幫他安排促進兩國間的諒解。這是第一個條約其中一條准許外國人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設立基督教教會和醫院。

往後的一年，中國正式在全國寬容了基督教（羅馬天主教及新教）。如前面所說，原先是法國大使提出要求，然後由耆英回應而成的。現在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准許宗教自由，令這寬容條款顯得過時沒用，這些條款不但無用反而變得有害。雖然中國及列強都不去理了，但這些條款仍舊是不平等條約的一部分，這對中國的愛國基督徒來說是非常不愉快的。他們跟現在自主的中國教會是不相稱的，因為它使反基督教的攻擊及宣傳品有藉口不逕而走。我們不要忘記，在這條約簽訂的時候那情況是非常不同的，當時若沒有這些條款，任何外國人在中國傳教都可被判死刑。這樣不幸的事幾乎是無可避免的，把自由傳教與羞辱的條約混在一起，藉著打

仗強行加在絕不情願的中國上。當梁發和梁進德知道這新自由時很不樂觀，梁進德表達他的意見說：內陸官員一定不會讓宣教士得到土地，或是用其他方法，讓這條約的目的無法得逞。

一八四四年，英國聖公會的教會宣教會派四美牧師（George Smith）到各通商口岸來調查傳道情況。他在一八五〇年，當上了維多利亞教區的首任主教。當他來到廣州時，要在十三行外找一個暫時住宿的地方。因此河南海幢寺的方丈就來到伯駕的屋中，商量四美在寺裡學習中文的可能性。他們倆正在談話之際，忽然又有一個訪客來到。我們現在讓四美來描述：「在這方丈準備離開之前，又有一個人來看我。這人名聞歐美，原來就是新教在中國傳教所結的第一個果實和他同胞傳福音的第一位當地傳道人梁發。他年紀約在六十歲左右，是一個體魄強健，精神煥發，儀容可敬的人。他興奮地加入我們的談話。我看見了這位因上帝的恩典的改變力量而成贏過來的人，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樂，這種快樂惟有曾經經驗過同樣情景的人才能領會，他好像是沙漠中的綠洲，使人們疲倦的眼睛睜開。我們這次的組合很是特別的。一方面坐著一個本地學者，可視為有智慧及體面的人，可是他仍舊做著卑陋的偶像的奴隸，而對於真神和人類的救主耶穌基督卻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坐著一個對於虛玄的異教學問並不那麼通曉，但是由上帝的聖靈教導，並因上帝的

恩典，從罪與死中拯救了出來——屬世的智慧及屬上帝的智慧。我也很樂意的看到梁發和那方丈都沒有表示任何不敬對方的態度，他們彼此以禮致意後，就用溫柔和藹的態度開始談話。一個有基督徒的和氣，一個有中國人固有的禮貌，因而防止了狹隘的反感的表現。」

四美牧師是伯駕夫婦的賓客，招待他的這位女主人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住在廣州十三行區的外國婦女。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三日星期日早上，四美在伯駕的飯廳裡向四十位英美人士講道，下午伯駕夫婦、梁發、麥卡拉芝牧師（T. M. McClarchie 聖公會教會宣道會代表）和四美參與領聖餐。四美牧師寫著：「這個聚會中充滿著一種異常莊嚴的氣氛，我們在這遠離我們的教會及不同的故土，能夠有這樣的榮幸在這裡與大家能有基督徒的相交。我們在這裡聚集的人數不多，甚至比原來的那些使徒還少，跟他們一樣，我們是在頂樓房間，周圍都是不信的人。我們慚愧地承認我們的罪，祈求上帝在我們的工作上賜下能力，在這裡我們再次紀念救主的死，在他身上，我們建立被接納的盼望，並因服從祂的命令『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我們來到了這裡。我們在這裡能與一個現代宣教事工的第一個初熟果子一起，他現在也是向他同胞傳福音的傳道人，我們一齊來到主的桌前，這是莫大的鼓舞。我們唱了幾首應景的詩歌，最後由梁發禱告來結束這禮拜。他用中文為他的國家回轉信主

與福音得以廣傳禱告。他熱切的聲調直截了當的告訴我們他在這時候的熱心代禱真是很熱情。」所以這位第一任維多利亞主教在坎特布里主教堂分派到中國工作之前，已經因梁發的禱告讓他就任聖職。

十天後，梁發帶著兒子去見四美。梁進德非常挑剔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特別是香港的警察怎樣虐待自己的同胞及英國在戰爭中的表現。他說除非他們有更友善的態度，否則基督教是不會被尊重的，這場戰爭令中國人比以前更不願意聽福音。梁進德的父親就顯得比較溫柔及平和。當四美向他表示希望能夠拯救許多人的靈魂時，梁發十分感動說：「外國的基督徒能夠這樣愛人類的靈魂，遠涉重洋，來向憎恨他們的華人宣傳福音，那麼，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應如何為我國的人悔改而努力呢？」問及甚麼是最大的攔阻，他認為是中國人剛硬的心最阻礙傳教的。當四美告訴這位老人說英國信徒對他的工作很關心，這樣的保證，使他不禁流下淚來，指著天說，他希望成為他應當做的人。

第十三章 出發——傳道——醫治

我怎能夠離開這些親愛尊貴的靈魂，因為很少人會關心他們的……幫助我們在這個異教的城市中打這場仗，直到這城市的大門為榮耀的王而開。弟兄們！為著上帝的道能有一條自由的路徑並得到榮耀而祈禱吧。

寫於廣州，一八五〇年

——賓威廉牧師 (Rev. William C. Burns)

梁發在廣州住了好幾個月後，倫敦會建議他回去香港傳道，而理雅各也給他預備了一個合適的房子。可是梁發婉拒了他，因為他有許多小病，身體有點虛弱，同時他也為了妻子的健康而擔心。他說香港的氣候並不適合他，他亦因一次不愉快的經驗而不願到香港來，有一次，有一些大概是喝醉了的英國人坐著馬車，要將他撞倒。此外，還有別的原因使他的良心不安，對住在香港有偏見，甚至有一段時間影響了他的貢獻及倫敦會的工作。那就是他跟多年好友屈昂形同陌路，但最後他在朋友的壓力下讓步，再度開始在香港的工作，很多人都悅納他的講道。

一八四五年一月，香港的倫敦會宣教士舉行一天的祈禱會，紀念該會成立五十年。與會者除了宣教士外，還有四位華人助手。理雅各寫道：「在我們聚會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好消息，就是屈昂與梁發同意冰釋前嫌，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彼此以弟兄致意。我們相信這個小團體中惡毒的根已經拔除了，應進而為我們的差會禱告，並盼望上帝降福於我們。」這兩位老朋友兼老同事為何會起爭論，那些宣教士都不知道，不過這兩位在華南曾為主耶穌基督的名而冒死的保羅和巴拿巴的復和，使他們非常歡喜。

無論在香港的工作是多重要和成功，倫敦會總是覺得她有責任向人口稠密的廣州城的人傳福音。實際上，好些計畫已在所有通商港口準備開始了。那年七月，紀里士卑牧師（William Gillespie）與梁發在廣州南郊沿岸的一個名叫新沙的地方租屋居住。在教會開始的首三、四個月，附近的鄰居都很安靜，平安無事，但是當理雅各患病回英國，紀里士卑不得已要在香港代替他的職務時，附近的居民開始生疑，謠言四起，揚言梁發是英國政府派來收買中國人的心，好來佔領中國。謠言也說教堂及這位宣教師都表現了敵人以更先進更難以察覺的方式來繼續進行侵略。暴徒認定梁發是漢奸，就攻擊他所住的那所屋子，把屋內的陳設盡行搗毀，並且乘機搶了許多東西去。梁發的生命危在旦夕，但他終於設法逃走了。他們也威脅屋主不得繼

續租屋給外國人，這樣一來，差會要在城中首次植根的嘗試，並不成功。

梁發後來卻找到了一個愜意的事奉環境，而且可以免受騷擾的。我們已提過他對伯駕的醫院感興趣，他被邀請擔任駐院傳道人，並於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廿九日開始上任。這醫院在一八三五年十一月成立，是遠東最早成立的醫院。最初叫做「眼科醫局」，早期的宗旨是讓眼睛受感染的人得到診治，但由於很多患其他病的人來求醫，所以之後不能單單醫一種病。創辦人是美國公理會的柏駕醫生。這醫院是在十三行的範圍內，面向著骯髒、人多的大道中的一間屋子。雖然周圍環境不衛生，儀器很簡陋，但這位醫生宣教士的醫術和仁慈的態度吸引了不論貧富的人來求醫。這機構在博濟醫院的名下，剛成立了一世紀，到了今天仍繼續它的事奉。在早年時人們認為公開講道及分發小冊子是不智的，所以靠著醫生的工作、他的性格和輕輕的話語，都能流利的說進懷著感激之情的病人或他們朋友的心中。當這間醫院日益聞名時，又因中國與英美兩國簽了約，醫院裡就能定期舉行主日崇拜。在梁發主持的第一個主日崇拜，出席者約有華人八十人及兩名宣教士；第二次出席者有一百八十人；第三次人數增加到二百；梁發覺得藉著這所醫院，為福音打開了寬大而有功效的門。根據梁發的出席記錄，在首三年半之中，先後去聚會的人共計有一萬五千人之多，可是在這許多人之中，真正有興趣研究真道的人只有三個，但是這三人

中，沒有一個人準備好要受洗，梁發因此感到悲哀。由此可見廣東人的心田實在太硬了，所以即使醫院的溫和感化，也不足以令他們對講道信息有甚麼反應。

我們從伯駕寫梁發的事可以知道這佈道看來好像失敗，並不是因宣教師缺乏熱忱或能力：「他講道時時，態度非常誠懇和富憐憫的心。他又常極其謙卑地對聽眾說，他已經做了三十年福音的僕人，但是對於福音所知仍很少。他全力以赴的告訴聽眾說，他從前也跟他們一樣，對基督教有極大的偏見，而對於死後的永生一樣懷疑。他說道是因為他未識福音的緣故，天上的光尚未照耀在他昏暗的心裡。他的祈禱是非常熱情的，而他對於基督教的見解也是福音性的。他解釋聖經，不但十分清楚，而且給予聽眾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在稍後的一份報告書中，伯駕說：「他用極其動聽的話詳說救主的生平及榜樣，並指掛在房間牆上的病愈的人的圖畫及插圖對他的聽眾說，那些病人之所以痊愈是由於上帝的賜福及能遵守耶穌的教訓及榜樣。」這些圖畫是伯駕醫好的眾多病人的畫像，圖中繪出他們的病狀和他們醫愈後的情形。那些圖畫是河南一個姓林的畫家所畫的，他在醫院開幕後不久送給伯駕的。一八三六年，一位由英國來訪的醫生指著這些畫說：「這些畫是否可看為本地畫師的技巧，我不敢亂說，但是畫中的男男女女，儘管除去了大腫瘤及別扭的疤痕，他們在手術前後都顯得一樣好。」後來，伯駕醫生將一部分的圖畫帶去英國，

現在那些圖畫仍可以在倫敦繼氏醫院 (Guy's Hospital) 裡面的戈登博物院 (Gordon Museum) 中見到。梁發除每星期日在醫院主持禮拜外，每逢星期一早上也到醫院裡向求醫的民眾講道。

或許靠著兒子的幫助，梁發在一八四六年在河南買了新屋，因為梁進德的薪金肯定比父親多很多。這條村叫龍尾導，這個名字可能與風水有關，猜想周圍的郊區的地理圖形會帶出吉利的風水作用，並由河南島的兩座高塔控制住。這新屋建在山腳，四周被墳墓蓋著，一般的中國人怕鬼，所以都不敢住在那兒。在屋旁連著的屋子，他建了一間可容約一百個座位的廳堂，這個廳堂在十月十八日的一個儀式上，奉獻為公眾禮拜之用。該日也施行聖餐聖禮，參加者有八人，其中兩人最近才受洗。堂內的家俬和牆上的聯匾都是在廣州城舊禮拜堂的暴動中被破壞的，但是這座建築物完全是梁發自資興建的。每個星期日他會先主持一個崇拜後，才渡河到醫院去。這間在他家的禮拜堂一直有固定的聚會，直到他逝世為止，每天也舉行禱告會。現在（一九三三年）這間屋還在，住著梁發不信主的親戚，後來到訪的信徒都感到祖宗的神主牌及偶像跟那兒的氣氛很不協調。

戰後的仇外意識已不那麼強烈了。合信醫生近來回國度假歸來，到了廣州找一個可以做醫療工作的地方，他也把妻子帶來，她是馬禮遜的長女。他最初租了一位

美國宣教士住的屋子的一部分，梁發同時也在廣州及河南找合適的中心，最後他在金利埠的河灘處找到了一個舊貨倉，租來並改建成會診室及藥房。那年四月初，醫院開始運作。那裡每逢星期一、三、五，病人來看醫生，梁發就會來告訴他們大醫生（即：耶穌）的福音。第一日到那醫院來看病的只有四人，第二日突然增至二十人，自此以後，如果在施藥日沒有一百人入院的話，門是不會打開的。伯駕醫生在十二年中的工作的好成績，實在為西方醫學做了很好的宣傳。合信醫生因看見那嘗試獲得這樣大的成功，就把整座建築物改成住所、禮拜堂和病房，合信醫生把他的全家都搬進去了。從開幕那天起直到他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為止，梁發一直是這間惠愛醫館的忠心傳道。他很自然就放棄他在伯駕那間醫院的職分。在搬進了這座建築物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這間小小的中國教會就順理成章的在小教堂裡聚集與舉行聖餐聖禮，共有四男六女參加，由梁發牧師主持禮拜。

第二個星期日舉行公開講道聚會時，有二百三十人來聽道，這些聽眾是很麻煩的。開始時，自出自入，以慣常熱情的方式呼朋喚友，議論譏笑這種看不見的神明、無祭司、無祭壇、無香燭、又無祭物的奇怪禮拜儀式，然而確有很多人是有留心聽道的。直到了一八四八年夏天，平均每天有二百五十個病人前來求醫。每天早上九時三十分，梁發向來求醫的病人及他們的朋友傳福音，同時又分給每個病人一本

有聖經信息的小冊子和一張簡單的禱文。當醫生在診療室忙著的時候，梁發則在候診處一樣忙碌。合信醫生談到他們在這雖然疲累，但很愉快的最初幾個月的經驗時說：「我對於親愛的梁老非常滿意。他以忠心、愛心、聰明及認真的態度來傳福音。他有天告訴我，自從醫院開幕後，他從來沒有像現在對他的工作那麼感興趣。他的演講，人人都注意傾聽，他對自己所講的道有很深的感觸。他在盡自己的責任時，也澆灌了自己，並因上帝的國的盼望而喜樂。他的祈禱就是一個基督徒的心在認真的呼吸著。當他這樣熱情和虔誠地祈禱獻上施恩的寶座時，凡是在場一同禱告的人，耳朵和靈魂都感到愉快。」

這過去一段是令人愉快的見證，在這傳道人身上融合了愛、智慧及誠懇，就好像本仁約翰（John Bunyan）的經驗：「我傳我所感受到的，所深刻地感受到的。」真誠而直接的禱告是這位能幹的傳道人的特徵。然而，忠心並不能保證不斷的成。功。第二年，每日來求醫的平均人數降至一百五十人。合信醫生分析人數減少的原因是由於一般人討厭聽所謂外國的道理。人們寧可到其他地方去求醫冒險，而不願來這裡被迫聽道。「大馬士革的河亞罷拿和法珥法豈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嗎？」（列王紀下五12）中國有本身的聖賢，他們對福音使人謙卑的真理感到討厭。根據梁發本人的經驗時，當他向他的同胞說各國的人都有拜獨一真神的天責

時，許多人欣然接納這話，但當他告訴他們必須信賴耶穌方能得救時，他們就不願接納了。梁發看見他的同胞對於福音真理麻木不仁，心中相當愁苦，他是很少這麼灰心絕望的。合信描述這些黯淡的日子時道：「今天早上，梁發無精打采，他說他無心再向病人傳道。我把他拉到一旁問他憂愁的原因。他說他的妻子患病；中國人惡貫滿盈；基督徒不能做到他們應有的合一等等。我對他說，外國宣教士不知要忍受中國人多少，但是他們仍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如果外國人尚且有這樣的感情、希望和原則，那麼，一個中國傳道人，特別是像梁發這樣富有經驗的人，對於勸勉同胞離棄偶像，崇拜唯一真神自然更不應該灰心喪志。我提醒他，我們的救主耶穌不知忍受了多少侮辱和輕視。這次談話的結果很有成效。這位老人決意重新努力，繼續向病人傳福音，講得比我以前所聽的更好、更誠懇。」

合信醫生跟梁發合作得非常緊密。這位傳道人描述合信是個有熱忱、誠懇、有愛心和仁慈的人；他日夜將自己獻給他人。當他和合信比較時，他覺得他不配稱為耶穌的信徒。合信的聖經知識對梁發有很大的幫助，他又能建議新的工作計畫，而梁發也願意接受。但合信覺得這些傳福音及牧養工作的主要責任，應由這位已經被任命的中國同工來擔當才對。

對於他倆的合作，以至於福音、醫療和文字工作聯合起來的影響，有著長遠的

結果，以下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值得記錄下來。合信的醫院有一個看門的叫羅廷善，他是一名基督徒。他空閒時常帶著一袋書及小冊子到城內。羅廷善有一個朋友在一間店裡，就去那兒派發小冊子。他將米憐所作的《兩友相論》送給住在那兒的周學。周學從小就對中國古典經籍有認識，但這本小書深深的吸引著他，他從來沒有像這樣的經歷的。這位年輕的讀書人當時二十四歲，他被人勸到醫院的禮拜堂參加主日崇拜。那位外籍醫生及夫人的熱情歡迎，使他感到既詫異又感動。梁老牧師認真傳道深深的觸動了他。整整一年他固定的到教會去，在他這些新朋友帶領下查經。在一個難忘的星期日，梁發牧師為他施洗，加入基督徒的團契，那兒也成了他屬靈的家。不久之後，合信正把一本有關生理的教科書翻譯成中文，希望有些圖表及圖片說明，就請周學幫助他。由於周學工作細心及手法出色，更加吸引了合信，於是就請他當梁發牧師的助理。梁發牧師在主日崇拜講道後，周學開始短講，他就在實習中訓練做福音工作。當他的基督教經驗及知識增多了，他的協助越發顯得有價值，他的公開講道及個人傳道都更有果效了。梁發年事漸高，精力漸衰而不得不減少活動，而周學就取代了他的工作。梁發逝世後周學就繼續在醫院裡傳講真理，直到一八五六年第二次中英戰爭爆發醫院關閉為止。

後來周學到澳門和英國循道會的宣教先驅俾士（George Piercy）牧師共事。戰

後他與俾士一同回到廣州，在循道會的差會服務了四十五年之久，擔任傳道、牧師及教師的工作，後來被分派去訓練慕道者。周學這位優秀的教會老兵在逝世（一九〇六年）前數年重申他的信心，他相信將來任何事都不能阻止耶穌基督的福音在中國傳開。他回顧他這生充滿驚喜的際遇時，他逝世時仍深信中國全地的人民跪在耶穌足前的時候已經近了。通過那些曾被周學奉基督的名感動過的男男女女及兒童的生命，通過他一手訓練的傳道人，又通過這些傳道人為救主贏來的人，梁發仍然活著。「上帝埋葬了他的工人，但仍然繼續他的工作。」

第十四章 最後的過渡

一名偉大的天才、傑出的聖人或先知的傳記，題為「末尾日子」的最後一章，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去找出、並學習在死亡臨近的陰影下，他們怎樣為人，或者說了些甚麼。

——狄泊 (S. A. Tiptle)

梁發的妻子在一八四九年逝世，梁發已為她擔心了好一段日子了。合信在她逝世的那年說：「她是個身體孱弱的好婦人。」在跟梁發多年的婚姻中，中間經過了丈夫遭到危險的試煉；為福音而長期分離；她因著自己的信仰，受到親戚和鄰居的譏笑及惡意對待，然而她還是對丈夫忠心，也真誠地跟隨救主。她如此誠懇，肯定是個好見證，使到她的母親以及一個守寡的姊姊後來成為基督徒，並住在家裡。她的媳婦也是教會會友，跟著她的孩子們也成為這個大家庭的成員。梁進德跟隨禪治文到了上海，所以在母親辭世時他很可能不在她身邊。

梁發在妻子死後數月就再婚了，他的親屬都希望這老人能得到適當的照顧，並

說服他幾個月後再結婚。可是那個婦人不久就不滿意他，離開他改嫁到別的地方。於是他們又為梁發安排另一個女人，這第三任妻子伴隨他到逝世。這梁發的家庭苦惱，不單單對梁發是一件傷心事，也對他的基督徒朋友們帶來焦慮。雖然第二次婚姻是絕對合法的，親朋的打算也是出於好意，可是沒有基督教一般的禮儀來聖化這段婚姻。由於梁發長久以來在廣州的小教會和基督徒世界裡有顯著的地位，所以他有任何小過失的話，都會成為很可怕的打擊。有一天，一名浸信會宣教士問合信是否仍舊信任梁發，那宣教士解釋說他並不是對梁發的誠信有了懷疑，他所以這樣問，是因為他本身的差會中，有幾個最有前途的（華人）助手已經陷入罪裡，將真道置之不理，使福音蒙羞。合信仔細的調查了整件事後，就胸有成竹回答說，他完全信任梁發的基督徒品格，但他不能用批評西方傳教士的標準去批評梁發和其他的中國信徒。

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五日，梁發去信倫敦會，這封信是由梁進德所譯，是現在所保存著梁發的書信中的最後一封。在這封信內，他總結他在這數年間所做的工作，特別是他與合信一同在醫院和教堂中的合作，使他在靈性上獲益良多，對聖經更加了解，他們也得到收割的喜樂。他結束說自己現在仍然相當健壯，耳目仍然很好，聲音仍然洪亮，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但傳道的工作這麼浩大，需要很多人來幫助。

他希望英國的基督徒以禱告跟捐款來支持。他最後祝福說：「願萬能之神、父、子、聖靈之祝福永與我所愛之兄弟姊妹同在。」中國使徒梁發就這樣在那封最後的書信中做了結語。

有一個到惠愛醫館訪問的英國人，在一八五四年寫了一篇文章給倫敦的報紙，講述那兒的崇拜。他說：「病人很早就召集到小教堂的座位上，十一點時，他們差不多坐滿了，分配給與醫院有關人士的地方也站滿了。那時候，那位老傳道人梁發坐到椅子上，禮拜的儀式跟在英國的公理會禮拜相似。但這位老人照著他國家的聖賢傳統坐下來教導。這一次他深入而有力的講解聖保羅向雅典人的陳說。」

這老傳道人在講道時坐下的習慣帶來了意外的啟示，到底他是到了晚年才這樣，還是從前就是這樣的？我們對這一無所知，再次提醒我們有許多關於這傳道人的生活及工作我們都置之度外。舉例說：在我們所參考的資料中，不知道他通常是微笑還是大笑。我們從他的書及言論可以判斷他有擅長解釋的恩賜。他像很多中國傳道人一樣，當譏笑人家拜偶像時，總是能令人發笑或生氣。在他而言，生活是件嚴肅的事情，不可輕率以待的，同樣我們也可以這樣說馬禮遜這個人。衛三畏提到這位宣教先驅說：「他並不是輕鬆愉快的人，而且性格孤僻，難以贏得懷疑論者和吹毛求疵的人的歡心。」梁發寫給倫敦會的秘書的其中一封信，由梁進德譯成英

文，內容是批評這差會總是送出中年的宣教士，他說他們舌頭太硬，難以調整語言，他們又趕著去寫書，以致出版的中文書都不能叫中國人明白。他也建議宣教士在七至八歲時就該送出來，因為那時他們的舌頭還靈活，還有時間去學習書面語。到底他這建議是表達了他的幽默感還是他缺乏幽默感，這個我們無法說得準。我們花了大半生在中國，真希望能在搖籃裡就開始學習中文；至少米憐認為要有馬士撒拉的壽命才有充分的時間學好中文。多數的中國朋友對我們的評價是非常寬容和仁慈的。

梁發知道自己已日漸衰弱，卻越來越關切親人的屬靈狀況，特別是對他的兒子。他常說自己快要回家，便勸他們要接受他的話，相信福音。他們就能準備好去跟隨他。梁進德這時已經到了南京和天津，協助英美全權特使做修訂條約的工作。他在一八五四年回家後發現父親身體越發轉壞，便敦促父親放棄醫院的佈道工作，但這位老人家說他被福音的真光照進心靈已有四十年了，他知道沒有其他途徑可以達到永生，他實在不能忍心看到自己鄉鄰仍舊在屬靈死亡的黑暗裡。他矢志為他們傳福音付上生命的最後一口氣。

這位勇敢的戰士一直奮鬥到底。在他逝世前的那個星期六的傍晚，他仍照著平日的習慣沐浴，準備第二天守安息日；他雖因著身體衰弱而著涼了，但這並不能阻

止他過河到差會的醫院主持主日崇拜。他從聖經經節，熱誠的講：「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到了星期一，他仍回到在醫院向聚集在那兒的病人最後一次傳福音。回家後他睡在床上，但一直堅持要起來在自己的小教堂裡晚禱，這樣一來他又著涼了。星期二，他的兒子去找合信，告訴他說梁發不舒服，因此第二天不能前來講道。合信吩咐梁進德把藥帶去給他的父親服用，並且叮囑他轉告他的父親，在未感到舒服一點前不可離家外出。這位老人家知道自己離世之期不遠了。他服的藥物也使他好一些，所以他就藉著這短暫的緩解時間跟所愛的兒子說了告別的話。

梁發回溯他最初把年幼的兒子交託馬禮遜和裨治文先生照顧及教導時，懷著盼望，預期兒子能預備好翻譯聖經的工作並傳福音，但現在看來這希望要破滅了。然而現在他的兒子成為中國和外國之間的調解人，這件事蒙受基督的祝福，建立起中外友誼。梁發最煩惱的是因梁進德受雇於官方，就意味著安息日要工作，為中國政府工作，更是如此。他催促他要接受能將安息日守為聖日的工作。他又囑咐兒子要常將聖經教導他的家人，並常與他們一同禱告。他希望他的孫輩中會出現翻譯聖經的人和傳道人。梁發說雖然他沒有財產留給他的兒子，但是他留給他聖經的知識，這遺產比世俗的東西都貴重。他這一生為子孫恆切祈禱，就是希望他們一代又一代

的成為基督徒。

在梁發離世前兩小時，感覺身體還好，就吃了一點東西，隨即睡去。醒後，他向家人要茶喝，喝完後，他將杯遞給他的兒子，並舉目望天，喃喃祈禱，然後向他圍繞在他床前的每個人望了一回，便忽然闔眼長逝；逝世時並無說一句話，也無一聲呻吟。梁發在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星期四凌晨三點鐘離世，與基督在一起，那是好得無比的。

梁發逝世後梁進德過河告訴合信醫生，合信便與剛到中國的循道會宣教士俾治(J. Beech) 牧師、郭修理(Josiah Cox) 牧師，和三個中國基督徒，渡河同往他家中。這時梁發家人及親友圍住躺著遺體的床，合信讀了一段哥林多前書十五章有關復活的經文，並用中文禱告。最後由郭修理作一個合宜的英文禱告而結束了儀式。梁發的遺體躺著很自然，面容安詳，好像睡著了一樣。

當這位在世的老寄居者勝利的過河到那永恆之城時，在房間還有梁進德八歲的女兒秋金，她跟她祖父感情非常好。梁秋金現在是一名老嫗，十年前（按：大概是一九二三年），她將當時發生的事告訴一名經驗豐富的宣教士，即已故的譚約瑟(J. C. Thomson)。譚約瑟對於保存梁發的記憶有非常強烈的興趣。她記得她的祖父執著她的手，告訴在場的人說天父要召他回天家。她有個不尋常的故事要說，就

是這老人家看見一個異象，有一台黃金的轎子要接他到萬王之王的皇宮裡去。梁發逝世時，面容是那麼平安與喜樂，以致那些宣教士朋友只能因上帝的慈愛讚美上帝。梁秋金當時悲痛到不願進食，幾經勸告，說她的祖父要她進食，才肯吃東西。後來梁秋金嫁到一個異教徒的家庭裡去，在迷信及拜偶像中生活，有半個世紀之久。但是她永遠不能揮掉那基督徒臨終的回憶。六十年後，她到廣西梧州的一間循道會去申請成為會友，她不僅成為熱心的信徒，她也勸她的甥姪將生命交給基督。這樣，梁發這位上帝的僕人的最後禱告，有一項得蒙應允了。

第二天，合信寫信給倫敦會向他的這位同工致意：「他與我緊密的合作已有七年，我很高興的說，在那些日子裡他除了偶然生病外，幾年以來從未在他的職守上缺勤，不敢不向他那冷淡和不信神的同胞，宣講他所知道的神旨。……他的基督徒生活，雖也攙有軟弱與不完全，但是他最終仍能堅守他在聖經中所學到的真理，至死不渝，他且公然在他的仇敵和朋友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並不以為恥。……他的地位，一時不容易找到人接替，也許我們要在許久之後才能再見到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他在世時，曾與我們尊貴的前輩有過很有意思的連繫：一個為他施洗，而另一個則將他分別出去做福音的工作。現在他已經離開了，在這廣大的工場，我們在那一代已經沒有留下一個人。……願教會的元首，讓我們看到這忠僕工作的結果，並

且栽培出更多虔誠的工人來接替他的位置，勇敢地去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合信也寫道，躺著梁發遺體的棺柩停在他屋旁的花園裡給蓋起來，免受日曬雨淋，直到安全的時候，才送到幾英里之外的祖墳去，他的父親及妻子都葬在那兒。數星期後合信寫信說葬禮已經舉行了，梁發的棺柩大清早就送走，只有數名親友參加。當代的歷史可以說明這不明朗和懼怕的原因。前一年那裡有很多無法無天的三合會興起。他們跟太平天國運動結盟，佔領了佛山大城，又佔領了廣州周圍的河口和山區。可是由於欠缺一個有力的領袖來統率行動，因此未能佔領廣州了。在廣州的官兵，因人們懼怕廣州的糧食供應被截斷，故能找到志願新兵來參加，因此反叛者就逐漸的散去了。廣州城裡有好幾千造反及同情太平天國的人都被捕及處決了。有一名廣州記者在梁發逝世的那個月寫信給香港的報紙說：「若稱廣州的四月為『饑餓月』，那麼五月就該定為『血腥月』，因為有許多人被處決了，是這個世紀前所未有的。在過去兩個星期中，廣州城每天就有超過二百人被處死。」梁進德因為與政府有關，一旦他被強盜劫掠，會被視為一個值錢的人質，當時的確是盜匪猖獗。

梁發去世的這一年，太平天國的亂兵常出沒於省城附近，此外，中國和英國的關係又日趨緊張。這對惠愛醫館的小教會而言是個很特別的試驗，然而教會雖失去

了他們的先驅領袖，前途暗淡，但這年教會的收獲也是空前的。受洗信主的有十五人之多，這十五人立志信主的決心經過長時間的試煉，始終堅定不移；他們受洗的時候，有許多人來看，都覺得是一件奇事；這實在是應驗了聖經所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第十五章 多年之後

教會本身……不是一群普通的建築師所造的。有時候這工程需進入深深的黑暗中，有時候需進入刺眼的光芒裡；現在在不能言喻的痛苦重擔下，進到如雷貫耳、英雄式的歡呼中。有時在晚上寂靜之中，聽到同志們在屋頂上輕輕錘打的聲音，他們已經比我們先攀前一步。

——孟森 (Manson)

培根 (Francis Bacon) 說：「歷史的真正責任，是去代表那些發生的事情，而讓每個人判斷時，能有自由及能力去觀察和總結。」像梁發這樣的傳記，過了這麼久才寫出來，是因為假使就在葬禮落幕鳴鐘，不可能完整。讀者自然希望知道在這動盪的歲月期間，他的一生到底造成了甚麼影響。

四美牧師在一八四四年寫了關於梁發的兒子梁進德的事：「他是個靈巧、聰明、受良好教育的青年。他的收入遠比父親還高（因他在中國人的大商行做英文翻譯）。雖然他在政府部門有影響力，但他在基督教宣教方面完全交白卷，我們對此

不能不感到遺憾。除非差會辦的中學刪去英文課程，否則我們的宣教事工在幾年間必定會暴露出梁進德的個案是一個困難和失望的樣本。」最後這句話會引起爭辯的，許多持不同看法的勇敢戰士，就因著這課題，打得落花流水。何進善這一位理雅各的助理和香港中國教會第一任牧師，就能證明那句話是恰恰相反的。梁進德事實上從未真正對基督教工作感興趣。在父親急切的哀求下才替他的教導和翻譯給予一點小幫助。但梁發逝世後他跟教會再沒有一點關係了。梁進德有好些宣教士朋友也離開了正常的工作，以官方身分代表他們的政府，這在某程度上可能會使他良心好過一點。合信醫生說儘管梁發禱告、在病臨終前哭泣、規勸，可是他的兒子一點也沒有表現出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也不參加公眾禮拜。他對兒子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梁進德拒絕讓基督管理他的一生，這件事成為梁發所負最重的十字架。

當中國海關開始組成時，梁進德在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總稅司那兒找到工作，負責在好些省份設立分卡事宜，然後在潮州分卡出任秘書長及代理卡長，先後有五年。當李泰國離職而赫德（Robert Hart）繼任為總稅務司時，梁進德仍繼續任職，直到四十二歲才因病離職，離職後回到廣州，在祖先的村子裡，中年早逝。他的墳墓是用花岡岩造的，安放在古勞村的防洪堤壩旁的小丘上。

梁進德共有八名兒女，有兩名早夭了。有一個兒子去了北方一省後便音訊渺然

了。其他兄弟也相繼去世，並無留下男性後裔，只有第五個兒子澤蘭活了下來。梁澤蘭住在祖父梁發的河南舊宅中。有數名女兒及一個兒子名叫達名。梁澤蘭是那兒的仕紳，地位等於太平紳士，他自稱是個虔誠跟隨儒家思想的人，完全與基督教無關。因此梁發在他孫子這家庭的影響完全消失，他的禱告未蒙應允。但是梁進德的女兒梁秋金年老時回到她童年的信仰，她回到有深刻印象的河南兄弟梁澤蘭的家，也說服了三個外甥女到梧州探望她，並在梧州的基督教學校上課，她們回廣州後就過一個完全改變的生活。可是她們的老父親一直對抗著她們的禱告和請求。到梁澤蘭生病時，他的女兒都堅持他一定要讓上帝的愛進入他的心，最後，他同意請她們參加的教會的傳道人來探訪他。當這姓李的傳道人一坐在床邊，梁澤蘭就向他坦誠地說他快離開世界，並很渴望能有確定的盼望可依靠，現在他相信耶穌是救主，準備單要相信祂。因此梁發最後留下的孫子，在他六十三歲的暮年，就在梁發生前常常傳福音而且也是他辭世的家裡受洗了。梁澤蘭受洗後，不久就去世，並葬於歷史性的三望岡基督教墳場，就是在白雲山到廣州的路旁。他的兒子梁達名是個好孩子，跟他的姐妹們一樣，接受了基督為救主。梁達名的親屬想把他送到嶺南學堂（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嶺南大學的前身）裡面去受教育，使他可以繼承曾祖的遺志，可惜他於十四歲那年（一九一八年）蒙召回天家，此後梁發再沒有男性的

後裔了。

梁發逝世後五十年，嶺南學堂由澳門遷到河南康樂。學校由於日漸發展，就需要更多的地來擴充校園。因這校園所在的社區，數代以來，將較高的地方當做墳場之用。校方需要發遷葬費給那些墳主，請他們將遺骸遷往別處安葬。在談判時，該校副監督鍾榮光接到馬來聯邦吉隆坡馮炎公的一封信，說他的妻子是中國第一位傳道人梁發的曾孫女，而梁發的墳墓是位於該校所購買的地中。馮炎公在美以美公會負責給新入教者傳授基本教義。他的說法後來被證實了。

一九一八年夏天，廣東省各地的宣教師來到嶺南學堂參加他們的常年會議。鍾榮光就帶他們到梁發位於鳳凰崗的墳墓之前，他們圍站在這被尊崇的地方，這是自梁發被埋葬以來，第一次有基督徒群體來這兒，於這一代的傳道人就有機會與這位被人完全忘了的前輩接觸。當該地的墳墓都遷移之後，梁發的遺骸就移葬到校園中央，這地點是保留建大學禮拜堂之用。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該校的創辦人日那天，這現在成為神聖的地段舉行了奉獻典禮。一九三〇年，第二屆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會議在廣州舉行，代表們來到墓前瞻仰。全國總會會長誠靜怡主持了紀念崇拜，並種下一棵名為「生命之樹」(arbor vitae)的樹。

由於梁發的中文傳記發行了，人們又重新對他感到興趣，有人開始在梁發高明

的家鄉調查，卻發現那兒被中華基督教會忽略了。鄰近高明的地方有很多教會和會友，這裡只有一間少於二十名會友的小教堂，但當地的人口估計有十萬。這第一位傳道人就這樣被遺忘了，我們能更悲哀地說些甚麼；還是更大聲地重新說出他在一個世紀前所立下的功勞，需要重新再來。一九三三年很多中華基督教會代表去拜訪古勞村，發現梁發在一八三三年洪水後所建的屋那時還在，但很快會變成頹垣敗瓦。在最後一次拜訪過後，這屋子變成收集蠶吃過的桑葉的垃圾場。這骯髒地板上的垃圾也可以是一個比方，就是經過這樣的骯髒程序，最漂亮和最昂貴的絲綢來到這世界，這也告訴我們，使徒就是「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當一個人站在亂木破牆中，他的思想會回到這本書所概述的生活故事，那些頹垣斷壁和垃圾堆就會被忘記了，在這個意義上他是站在聖地上。但對於梁發的鄉人，這破屋子說明了一個人放棄了祖宗的信仰而得到應得的荒涼結局。他惹來上天對他的忿怒以及官員對他無辜的族人的氣憤。

在這條村裡，因這第一位先知在本族本家並不受尊敬，所以除了偶爾拜訪及友善的接觸外，要開展直接的基督教工作實在少之又少。在河較遠的一邊，對岸一英里之外，跨立在寬闊的堤壩上的三洲長形墟市，就是小伙子梁發被派去市集時買家庭用品的地方，中華基督教會找到一個機會租了一座便宜的樓宇，讓宣教師及他

的家庭住在那裡。散居在市集的信徒，及外邊來的信徒會來這裡參加主日崇拜。其中一些人早就忘了公開禮拜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早已沒有有效的見證。有一位曾經當過宣教師的，一度因鴉片而對屬靈的事麻木了，但他現在是最活躍的志願工作人員，並把敵人踐踏在腳下。每星期有好幾晚，會眾聽眾多得擠滿了小教堂，連靜悄悄的街道都站滿了人。後來那兒加建了編織物造的屋頂，以防人們遭到日曬雨淋。那兒也有一間小小的閱覽室讓日漸增多的人來多學一點知識，稍稍放眼世界。病人來求醫的話，就用一些標準藥物和護理知識來幫助他們。這宣教師也嘗試幫助農夫解決一些困難的農業問題，如果太難的話他便去找城中的專家幫忙。這梁發紀念堂（註）的工程現在開始，但這位傳道人的太太和朋友們，已經開始讓這紀念堂能成為耶穌所帶來的更豐盛生命的事奉中心。

傳道人李金如有時遭取笑說梁發的老家沒有屋主，也沒有人在他的祖先的神主牌前點燈。他回答說這位宣教先驅有數不清的屬靈兒女，他所點起的火焰的溫暖、光明和力量，現在已傳遍全中國，並且影響著中國新生活的每部分。

就如孫中山先生的遺囑上寫著「革命尚未成功」，這只是一個開端。在梁發的老家、還有其他無數個類似的地方，充滿了貧窮、無知、迷信及罪惡，加上民國的建立完全的失敗：如果中國缺少氣節、智慧、團結及獨立性，她就不能進步到在萬

國中佔有一個光榮的地位，這些事對教會來說是衝鋒號聲。在過去一個世紀，以及在主後所有的世紀，歷史已經證明了耶穌就是那位世人的救主。中國教會對於這號角聲並非充耳不聞，她已站在正確的前鋒崗位上。但她很懇切並堅定的說，她覺得西方教會要卸下最初從馬禮遜和梁發合作而來的責任，時機尚未成熟。

註：日據時期，廣州淪陷，一九三八年十月梁發紀念堂被毀而成為廢墟。

附錄

下面所錄是偉烈亞力牧師 (Rev. Alex. Wylie) 在中國基督教新教的出版物中所列舉梁發著作的目錄：

- 一八一九年 在廣州著《救世錄撮要略解》，共三十七頁。這本書的序言中力言造物主上帝是我們所拜的對象。書中附有十誡，數段聖經、三首聖詩和數篇禱文。以一個領受福音真理為時不過六年的中國工人而作成這書，成績可算是很不錯了。梁發因著這本書而被捕受罰，這本書的印板亦被沒收焚毀。
- 一八二八年 在廣州著《熟學聖理略論》，共九頁。這書是作者宗教生活（悔改、受洗和後來所得的經驗）的自述。
- 一八二九年 在馬六甲著《真道問答淺解》，共十四頁。
- 一八三〇年 在高明著《真道尋源》、《靈魂篇》和《異端論》。
- 一八三一年 在廣州著《聖經日課初學使用》。這本書是由英國聖書公會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 所出的聖經課本的翻譯。初版由廣州的英美兩國人士和商行資助鑄版及印行。一八三二年再版則由英國及外地學校協

會出資印刷。

- 一八三二年 在廣州著《勸世良言》。這是包含九種小書的一個結集，由馬禮遜代為校訂付印。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最初認識基督教的真理，就是讀了這本結集。這些小書大部分是集聖經章節而成的。後來梁發在馬六甲那裡曾作修訂，且將九種小書分別印成單行本。其中四種後來在新加坡再版，改稱《揀選勸世良言》。後來梁發又編纂上面所說的九種小書而成一書，在新加坡出版，書名《求福免禍要論》。所以這些書名雖然不同，實際都是那九種小書。
- 一八三三年 在澳門著《祈禱文讚神詩》，共六十頁。這是英國聖公會的早禱文。禱文為梁發所譯，而聖詩則由馬禮遜及其他傳教士所譯。相傳馬禮遜特地為這本書而雕活版字來印刷。梁發在馬六甲時，曾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月刊上發表許多論文。

以上所列的表不能稱為完全無缺。

梁發從不用他的真姓名發表作品，他有時署名學善者，有時署名學善居士。

(此目錄曾列在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五五年版本)

先驅系列 1

梁發——中國最早的宣教師

作者：麥沾恩

主編：朱心然

翻譯：朱心然

編輯：陳潔心

發行人：蘇成溢

編印：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彌敦道 138 號五樓 A 座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門市部：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 10 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承印者：永達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Pioneer Series 1

China's First Preacher — Liang A-Fa 1789-1855

Author : G. H. McNeur

Chief Editor : Chu Sin-Jan

Translator : Chu Sin-Jan

Editor : Rachel K. S. Chan

Publisher : Eric S. Y. So

First Edition : December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Cat. No. 1645.1 2.5m45 ISBN 962-294-431-0

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242 號 9 樓（郵遞區號 111）

電話：(02)880-1647, 880-1648 傳真：(02)883-4621